



顾问委员会

总顾问 曾培炎

顾问 董建华 蒋正华 唐家璇 徐匡迪

资深专家委员会

中国专家（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春正 王洛林 厉以宁 冯国经 卢中原 许宪春 刘遵义
刘克崱 朱 民 李德水 李若谷 吴敬琏 张国宝 张晓强
张卓元 陈 元 林毅夫 周文重 海 闻 钱颖一 郭树清
楼继伟 聂振邦 樊 纲 戴相龙

国际专家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康睿哲/Richard Constant
傅强恩/John Frisbie 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
欧伦斯/Stephen A. Orlins 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
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 马克·乌赞/Marc Uzan
郑永年

编委会

主 任 魏礼群

副主任 郑新立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一鸣 王晓红 牛铁航 吕 政 谷源洋 朱晓明 李晓西
李向阳 陈永杰 张宇燕 张燕生 张蕴岭 杨圣明 冼国明
施子海 隆国强 常修泽 徐洪才 裴长洪 霍建国

主 编：郑新立

副主编：王晓红 牛铁航

• 高层论坛 •

加强基础设施合作 为亚洲繁荣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曾培炎 (004)

从科学发展高度看人口问题 蒋正华 (007)

• 宏观经济 •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高尚全 (015)

中国就业格局变化与挑战 蔡 昉 (024)

创建中国以内需为主导的对外开放新模式 杨圣明 赵 瑾 (032)

我国货币保持适度增长的理论思考 徐洪才 (042)

• 国际经济 •

我国中西部地区承接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若干对策
——基于对重庆市的调研分析 课题组 (053)

新时期中国企业加快“走出去”的途径与对策建议 李罗莎 (060)

• 产业发展 •

对第三次工业革命几个问题的认识 王昌林 (070)

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约束机制建设研究 程凤朝 胡 丹 王张葳 (078)

浅论当前的IT产业变革 吴 波 (088)

• 区域经济 •

设立二连浩特商务特区 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沈家文 赵长茂 (096)

• 理论前沿 •

海外引进高端人才科研绩效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基于科研环境的视角 张 瑾 (105)

• 名人观察 •

新中伙伴关系：稳固根基、开拓潜能
——专访新西兰前副总理、新中关系促进会主席麦金农爵士
本刊记者 牛铁航 (114)

推动新中合作关系迈上新台阶 约翰·基 (117)

• 英文提要 (ABSTRACTS) • (120)

国经中心将举办“第三届全球智库峰会” (124)

打造一流智库刊物
——《全球化》编委会召开第一次会议 (125)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理论与实践探索”论文征集暨优秀论文评选通知 (126)

欢迎订阅2013《全球化》杂志 (127)

《全球化》杂志征稿启事 (封三)

China Finance and Economic Review约稿启事 (封四)

主管/主办：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运营单位：国经环球控股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中国海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出版：《全球化》编辑部（北京市西城区西安门大街22号2号楼503室，邮编：100017；北京市西城区西什库大街31号1号楼506室，邮编：100034）

投稿邮箱：qqhtgx@126.com qqh@cciee.org.cn 联系电话：010-66169330

· 高层论坛 ·

加强基础设施合作 为亚洲繁荣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曾培炎

全球经济目前开始呈现启稳回升的态势。欧债危机总体趋于缓解，美国暂时躲开了“财政悬崖”，经济形势向好，亚洲经济保持继续发展，市场信心逐步恢复，所有这些因素，都预示今年世界经济增长的势头，将得到增强。但是，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这些积极态势，只是各国政府近年来采取的一系列反危机刺激措施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而造成这场危机的结构性因素还远未解决。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做法和其结果，必然会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不稳定性 and 不确定性。

亚洲新兴经济体已日益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据统计，亚洲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一半左右。但亚洲各国似乎也正面临着“保增长”与“调结构”的两难困境：一方面，我们必须加快进行结构性改革，否则经济复苏与增长将无法持续；但另一方面，没有稳健的经济增长做基础，结构改革则无法进行，因为在经济低迷时期，任何结构性改革都会带来巨大的经济与社会风险。换言之，结构改革的紧迫性与确保增长的必要性，交叉随行，互为前提，形成了所谓“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难题。

然而，面对这种两难困境，越来越多的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开始敏锐地抓住了结构性改革与确保增长这两大难题的交汇点，即扩大投资，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例如，泰国政府计划以港口、轨道系统和公路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来改变物流基础设施的

* 本文为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方首席代表曾培炎2013年4月8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全球复苏与亚洲的共同发展”分论坛上的演讲。

“短板”现象。印尼政府计划在2013年把公共支出提高到GDP的15%，菲律宾政府也计划把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入提高19%。2012年8月在柬埔寨举行的第44届东盟经济部长系列会议上，东盟国家还提出，2013年就互联互通问题到中国进行宣介，希望吸引更多中国企业参与建设。印尼总统苏西洛在会上表示，全球经济下行，亚洲经济的增长必须依靠基础设施推动，印尼将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优先事务。

中国的发展经验表明，经济要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要先行，而且，先行的基础设施建设，只有联网成片，才能实现效益和功能的最大化。世界上许多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也都表明，在经济腾飞或转型时期，大力投资开发基础设施，有助于经济的长远发展和结构的合理调整。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市场需求的放缓将会持续相当时间，高度依赖国际市场的亚洲经济必须尽快转型，而通过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使之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结构调整，催生新的产业门类，就成了加快结构调整、同时确保增长与就业的必然选择。根据相关研究，基础设施投资的“乘数效应”，使得每1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能够拉动3到4美元的其他产业投资需求，在基础设施领域每投资10亿美元，就能创造1.8万个就业机会。

而从亚洲的实际情况看，过去几十年来，亚洲经济主要依靠外向出口型发展，保持了快速增长，这使得原本就薄弱的地区基础设施同快速发展的经济与日益多元的经济社会结构越来越不相适应。据亚洲开发银行估计，2010年到2020年十年间，亚洲地区需要新投入8万亿美元基础设施资金，才能支撑目前的经济增长水平。可见，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需求巨大。不少亚洲新兴经济体财政状况相对良好，外汇储备规模较大，居民储蓄率较高，具备开发投资基础设施的实力。但也有一些发展中经济体，势单力薄，力不从心。

显然，市场有巨大需求，亚洲又具开发潜力，关键就看我们怎么去做。从中国以及亚洲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实际经验看，利用政府的主导力量，把整个社会，包括企业、私人调动起来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按照市场化原则投资运营，同时加强基础设施的公益性职能，这样做不仅现实可行，而且也应该是未来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方向。

为此，有必要提出“亚洲基础设施合作倡议”（Asia Infrastructure Cooperation Initiative, AICI），并从以下两方面着手开展工作：

一是开展各经济体之间基础设施规划的交流合作，把各自的基础设施开发规划，同推动地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目标紧密结合起来。

随着亚洲地区经济与人文联系日益紧密，我们应该主动把亚洲经济体各自进行的基础设施开发建设，作为一个大棋局、大规划来推进，各经济体之间有必要就跨国跨区域

跨流域基础设施的网络化，进行共同的愿景探讨与交流，可按各专业领域逐项形成共识或规划，并据此制定各经济体相应的中长期规划与安排，促进亚洲区域经济、文化、人员，在更开放更顺畅的基础设施网络自由流动。

二是为了解决亚洲各国基础设施开发的巨大融资缺口，有必要建立一个专门的多边金融机构或基金，作为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平台。

在这方面，亚洲开发银行长期以来为本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但是亚行并不是专门服务于基础设施投融资的金融机构，它有着更为广泛的发展目标和任务，特别是在消除地区贫困方面，亚行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鉴于今后一个时期，亚洲地区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是推进结构调整和实现经济增长的最佳时期，或者说是最佳选择，成立一个专门服务本地区基础设施投融资需要的多边金融机构，势在必行。这个多边金融机构应该是开放的，既对亚洲区域内的各国政府开放，也对区域内的私人资本开放；作为专门投资基础设施的投融资平台，这个金融机构应该是以商业化运作为主，在追求盈利性的同时，也应确保所投基础设施的公益性；该机构应该由独立的专业人士经营管理，专注于亚洲区域内最具全局性和重大民生利益的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融资业务，包括交通、能源、电信、市政项目、生态环保、农田水利等领域，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效而可靠的中长期金融支持。

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是博鳌亚洲论坛的宗旨；而推动本地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并使之互联互通，则是实现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必要条件。去年11月，博鳌亚洲论坛和印度工商联合会，在印度孟买联合主办了亚洲金融合作会议，会议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就是如何解决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瓶颈问题。与会者通过深入探讨交流，就开展多形式的多边和双边金融合作，推动基础设施开发问题，形成了务实和可操作的重要共识，也提出了不少建设性的观点和建议。希望“亚洲基础设施合作倡议”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同，这也是为了把印度会议上许多与会者就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问题所表达的远见卓识和共同呼声，进一步推动下去，落到实处。

“倡议”的落实是一项复杂的工作，不仅要有宗旨和原则，还应有切实可行的路线图，这显然需要大家共同的智慧。博鳌亚洲论坛应在这方面发挥交流平台的作用，为推进亚洲经济一体化、加快亚洲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提供有效的智力支持。

责任编辑：刘英奎

从科学发展高度看人口问题

蒋正华

摘要： 本文从科学发展的高度，分析了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因素与人口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阐述了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综合协调发展，实现中国人口均衡发展的目标，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人口问题 科学发展 协调发展 老龄化 生育率 平均寿命

作者简介： 蒋正华，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

人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也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古代人类生产力低下，资源供给丰富，生活环境艰苦，死亡率极高，需要高生育率以维持种群的存在。进入工业化时期，生产力空前提高，资源匮乏、生态失调、环境破坏等问题不断出现，迫使人们考虑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生态、环境等方面协调发展，使世界达到一个为大家普遍能接受的均衡状态。在人口领域由各种观点指导形成了最低人口、适度人口、最优人口、最大人口、均衡人口等概念，并构造了许多数学模型，获得了相应的全球和国家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数字结果。尽管受到社会问题的许多不确定因素影响，各种数字结果只是相对的，还可能受到外因、内因认识发展而改变，但其研究思路和时限性的定量分析结果对决策仍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四个方面加以阐述、分析，第五部分归纳出主要结论，目的是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定量情景分析。

半个世纪以前，人口的快速增长引起许多人的警惕，在1968年出版的《人口炸弹》

一书中，保罗·埃利希教授惊呼：“我们将会被我们自己的繁殖逐渐淹没”。他的话只对了一部分，20世纪世界人口从16亿增到61亿，成为历史上增长最快的100年。但从20世纪后期起，人口增长迅速减慢，现在又充斥着另一种呼声。日本厚生省报告：“日本的人口……到3000年大约为500人”，许多国家都出现这种人口末日的声音。同样，这也不会成为事实，人类社会将会在新的条件下采取明智的对策，发展将会持续。

一、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人口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也是经济成果的消费者。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既有体力和智力的贡献，也由消费需求而刺激了经济供给。经济增长则满足了人口消费，至少应当满足最低消费需求，低于这个水平则人类社会将发生动乱，在各要素适当配置条件下可以优化增长水平，达到一个最佳的经济人口结构。根据大量实证研究，当人口年增长率为1%时，为保持生活水平不下降，经济增长率应为2.5%左右；这个数字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生活条件变化、其他环境等因素的改变而有所调整，但总体趋势不变。为保持生活水平不下降而必须达到的投资率称为人口投资率，也是必须保持的最低增长率，其剩余部分才能用于进一步发展或提高生活水平。除了人口总量外，人口结构也对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劳动力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影响更是直接。在现实社会中，曾多次出现一些国家或地区劳动力是否过剩或人口是否过多的争论。一段时期某个国家或地区失业率高并不足以断定这个区域的劳动力过剩，经济结构失调可能引起结构性失业，政策失当也可能推高自愿失业水平。但是，相当长时期内边际劳动生产率下降则应看作劳动力过剩的征兆，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则是绝对的劳动力过剩了。

人口是经济发展的内部因素之一，不同发展时期充分发挥着内生因素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曾流行过人口陷阱论，认为人口增长快将使经济起步时受到拖累，经济增量为增加得很快的人口消耗殆尽，又落入发展乏力的陷阱中，只有外力的推动才能使这一地区跳出人口陷阱。另一种理论产生于亚洲发展经验的总结。除菲律宾等少数国家外，亚洲许多国家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起步，获得了初步的繁荣，在发展到一定时期优势消失，发展难以维持，必须增加劳力。这种现象被称为人口红利，这段发展时期被称为人口机会窗口时期。联合国人口基金委员会在1998年《世界人口现状报告》中使用了人口红利一词后，发展中国家广泛应用了这一概念。但是中国的发展经验既打破了人口陷阱论，也将打破人口红利论，无论在何种人口环境下，只要采取得当的政策，都可以利用好不同的内生因素助推经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贸易中曾出现过经济学家困惑的现象，美国技术水平高、劳动力少，在贸易中却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技术密集型产品。经研究发现，产生这种违背国际贸易基本规律现象的原因是：当时美国劳动密

集型产业中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是同类国家的四倍，在这些产业中占据了优势，这一现象在经济学中被称为列昂惕夫之谜。可见，劳动力数量庞大不可恃，技术进步、素质提高、数量适当才是发展之本；与时俱进，深化改革才能长保发展。在许多案例分析中，劳动力与经济发展关系不相一致，与经济结构、技术水平等关联更密切。总的说来，既不可片面强调廉价劳动力数量对经济增长的正关联作用，也不可完全忽视其影响。基于以上规律，不难根据投资、人口增长、资本折旧、技术进步、报酬递减等资料，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在投资与消费间适当分配的不同总目标下可以解出相应的最优值。就中国条件进行的定量计算说明，远期的最优人口总量约为7—8亿人。

除了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外，经济发展也会影响人口增长。在现代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总体上使生育率和死亡率都下降，一般的解释是这种情况下孩子的效用下降而养育成本提高。死亡率下降使孩子在成年之前夭折的风险减少，进一步压制了多生育的愿望。近代计划生育技术的进步和高效药具的发明使少生育的愿望更加容易实现，这些都是拜经济发展之赐。上述孩子成本效益理论只是实际现象的解释，不能用于定量的预测。要精确地算出孩子的成本、效益和多生一个孩子的边际效应、成本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何况若将孩子也当作一种消费品来定量分析，还必须研究对其他消费品的替代效应和孩子在感情上的价值，其定量计算更是困难。因此，现实的研究方法是根据已有各地区或一个地区的历年经济、人口统计数据，并利用各种数据处理技术进行相关分析，估计经济增长对生育行为的影响。这种研究方法虽然算不上准确，但是可以发现许多重要的趋势信息，对宏观决策而言是十分有用的。

二、人口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社会发展对人口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表现在死亡率和生育率。世界各国死亡率的差别主要由社会因素决定，营养水平、生活环境、医疗条件等都是些显而易见的原因。早在19世纪初，就有学者专题研究过富人和穷人、统治阶级和工人阶层物质和精神状态差别对寿命的影响；20世纪保险业的发达提供了更多的数字，细化了这些研究。近半个世纪以来，由于医疗技术提高、义务教育普及以及公共服务的加强，人类健康水平普遍提高，各国的平均寿命差距缩小，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寿命，远高于发达国家在相似或更高收入下的水平。有时一项针对性很强的措施的推行可以迅速降低死亡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在斯里兰卡引入DDT，蚊虫滋生受到强力遏止，疟疾病患者大幅减少，一年内该国人口死亡率下降了1/3。全球人口平均期望寿命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约为46.5岁，到80年代前期提高到59.5岁，此后平均每年约增加0.25至0.3岁。中国解放前人口平均寿命为35岁，建国后平均寿命迅速提高，不仅远高于发展中国家，也高于世界平

均水平。到本世纪中，中国人的健康将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平均寿命很可能达到并超过80岁。

社会因素对生育率的影响更加复杂，许多人文因素难以用数量化的技术研究。总的说来，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有利于生育率的下降。对生活水平提高的要求在一段时期内可替代多子女的生育需求，但长期历史中形成的生育文化很难在短期内彻底转变。社会复杂的阶层结构和多元文化，形成了多元的家庭生育需求，与社会整体利益不可能完全一致，这将在很长时期内需要经济、社会、法律、行政等各领域采取目标一致、协调有力的政策措施加以调节。

决定生育率的基础性社会因素是人类的生育能力，或生育力。对不采取任何避孕方法的地区观察表明，每名妇女一生可以生育约12名孩子，但个体化差异很大。约有5%—10%的妇女终生不育，也有个别妇女生育22—24个孩子，其中还不包括孪生子女。生育力是一个人群潜在的生殖能力，很难精确计算，但从大量观察案例发现，一名妇女的生育能力从初次排卵开始到18—20岁左右达到高峰，这个峰值可以保持到30岁左右；此后逐渐下降，至49岁左右降到零。实行计划生育最重要的年龄段在20—35岁。即使不实行计划生育，也有许多社会文化、风俗等因素，例如婚姻方式、生育禁忌等，使实际的生育率远低于潜在的生育力所能达到的生殖水平，大体上前者只能达到后者的1/3以下。全球生育率在20世纪50年代达到高峰，平均每名妇女生育5个孩子，32个国家每名妇女平均生育7个以上孩子，没有一个国家生育数低于2个孩子。20世纪中后期起，社会发展、国际推动、计划生育技术进步、死亡率下降、生活方式改变等多重因素作用下，生育水平迅速下降。1995—2000年期间，世界妇女人均生育孩子数降至2.79个，有49个国家平均生育孩子数低于2个，平均生育7个以上孩子的国家减少到7个。生育率下降的趋势仍在持续中。联合国根据各国资料综合分析，今后40年内最不发达国家人均生育孩子数将迅速减少，发达国家人均生育孩子数则将略有增加，到21世纪中，世界人均生育孩子数将降到接近2的水平。

人口发展态势同样影响了社会发展。高生育率、高死亡率的地区面临着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加卫生健康投入、加速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而低生育率、低死亡率地区则要应对人口老龄化、人口结构重新平衡、社会建设策略调整等新的挑战。中国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经历了全球人口发展模式最快的转变过程，这些问题尤其突出。中国许多地区承受过儿童快速增多，小学、中学设施不足到儿童数量剧减，大量学校闲置的压力。当前正承受着老龄人口迅速增加、养老服务设施不足、代际利益亟待协调等社会问题的冲击。处理好这些问题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加强计划生育工作时期，形成了大量独生子女户，这些家庭的老龄工作、独生子女死亡形成的特殊困难等问

题，尤其需要政府的高度关注和妥善安排，使计划生育工作在发挥支持经济发展作用的同时，促进逐步形成低生育家庭充分享受经济、社会发展的利益，从而形成互相配合的政策、法制、社会、人文环境，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促进社会和谐，推动经济增长，实现科学发展。

三、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各种可再生和不可再生的资源。在人类发展史上，随着生产能力的提高，产业形态的转变，可利用的资源也不断增加，可以供给人类生存的潜力也不断增加。一个最粗略的估计，狩猎采集时期，约需30平方公里陆地资源才能供养一个人，当时全球只能养活500万人；畜牧业时期，资源利用效率提高，0.5平方公里到2.7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就可养活一个人；到农业时代，生产能力大大提高，每平方公里陆地可养活40人；工业经济时期利用资源的能力更加提高，但许多资源储备已感稀缺，每平方公里陆地供养能力比农业时期大约只提高四倍，达到160人，全球最多只能支撑约200亿人。

地球对人类的支撑能力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其数值与支撑何种类型的生活有关，也与技术发展水平有关，各种资源稀缺程度不同，支撑能力也有很大差别。有的学者认为，从最严酷的资源条件和较优越的生活条件角度看，全球只能容纳24亿人；另一些学者认为，遗传工程等技术的不断发展，全球可以养活500亿人；更有人认为，如果人类都容忍像非洲沙漠中居民的生活，地球更可支撑数千亿人的生存。绝大多数人认为，按目前可见的发展速度，地球应当可以支撑100-150亿人在一个合理的生活条件下存在而不致发生严重的冲突。

粮食是人类生存最必要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人类直接消费的粮食减少，但需要消耗更多的粮食生产肉类。生产1公斤牛肉需要消耗7公斤粮食，1公斤猪肉消耗3公斤粮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人口迅猛增加，世界粮食储备已多次降到安全线以下。除了粮食之外，油、气、煤等能源储备也已看到尽头，即使可以开发出可燃冰等新能源，其代价也将十分昂贵。铁、铜等许多不可再生金属资源，大多只能供应100多年使用。在今后的50年内，全球经济还将增长4倍左右，资源危机已经明晰可见。转变生产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是一个全球性的紧迫要求。

当前世界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已经严重影响生态环境，消耗自然资源。全球表土储量约为35000亿吨，每年流失230亿吨，自然形成新的表土数量很少。地球上半数以上的可耕地耕种条件很差，勉强开发需要大量投入，得不偿失。目前全球自然资源的服务能力有2/3正在下降，我们在自然资产负债表上处在负债状态，人类活动消耗的资源大

大超过其再生能力，这种生产方式基于牺牲子孙的利益，是不可持续的。本世纪初，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及其他组织的支持下，启动了“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的国际合作研究项目，95个国家的1360位学者参与了该项研究，2005年研究成果公开发表。在研究报告中，既肯定了发展对人类社会带来的福祉，也按国别评估了许多国家自然财富的减少，其结果令人震惊，不少国家减少的自然财富为生产出来财富的3-5倍。对中国评估的结果，发展增加的财富约为减少的自然财富的9倍。这充分说明，中国的发展总体上是十分成功的，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其负面影响。

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人口多，土地少，资源相对缺乏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中国人均淡水资源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人均耕地只有世界水平的四成，油、气资源大量依靠进口，许多矿产资源也要依赖世界市场。制约中国发展而又无法进口的资源瓶颈是淡水。按照目前用水状况，中国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时，全国地表水必须全部用尽。更严重的是水资源的地区分布与需求不能匹配，为了满足发展需要，大量资金需花费在调水上。长江以南38%的耕地资源获得83%的水资源，黄、淮、海、辽河流域占有42%的耕地，都只有9%的水资源。蓄水、节水、调水等措施一直得到政府高度重视，但解决问题还需要更大的努力。

可以在一定的技术进步、资源替代、生活水平、结构调整以及资源供给约束等条件下，研究中国最大和可容忍的人口承载量。大体而言，16亿左右人口是中国社会尚可容忍的数量，总人口达到18亿左右，就可能产生严重的资源、环境危机，进而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破坏性的影响。就本世纪而言，应当坚持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调整人口结构、完善人口政策、优化人口分布，实现人口与资源、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四、通过综合协调发展，实现中国人口均衡

人口是一个周期很长的复杂系统，从生育率很高猛降至低生育水平，系统承受了强烈的扰动，要调整至一个稳定的状态需要70年以上时间。近年来，社会上就中国人口政策的完善，提出了许多建议。从经济发展角度出发，有的提出将提高人口质量放在优先位置，有的提出以增加劳动力供应作为直接的对策；从满足社会不同需求出发，有的建议立即全面实施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有的认为应当逐渐调整；从资源、环境观点，有的主张严格控制生育，将总人口逐渐调整至5亿人，也有的以为可以承载更多人口。

要做出正确决策，必须有明确的思路，并对各种建议的可行性进行全面分析。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们应对长远的人口总目标有一个前瞻性的设计。中国近年每年新增劳动岗位约为800—1000万，考虑到2020年后经济增长率将适当降低，每年新增劳动岗

位将逐步降至600万左右，与人口变化走向一致。至本世纪末人口稳定，每年出生与死亡数相等，大体上在1200万左右，经济增长率稳定在较高水平，为不断提高生活质量、增加公共服务、完善福利供给及其他方面需要提供足够支持。到2050年中国人口平均期望寿命可以达到80岁，至本世纪末更可接近90岁。每年出生1000万人，达到人口稳定时，总人口为8-9亿；每年出生1200-1300万人，总人口可达到10-11亿，人口结构达到均衡；在调整过程中，最大人口数为15亿左右。这样的人口发展过程比较平稳，为我们现在的社会管理水平所能承受。劳动力供求之间的平衡，可以采取逐步提高退休年龄等措施加以调节。随着经济结构调整、科学技术进步，更多资源可以用于提高劳动力素质、提升劳动生产率方面。这一方案的缺点是不能完全满足不同类型家庭对多生育子女的要求。

立刻全面实施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可满足部分家庭多生育的要求，但产生生育失控的可能性很大。有些学者以山西翼城县及甘肃酒泉市为例，认为一个家庭生育两个孩子可以得到控制，这是片面的。1984年开始的“二胎政策”试点，曾在40多个地、县(市)实施，1988年为使试点成功，调整为13个点，但大部分在工作中遇到很大困难，陆续退出，最后只剩下5个县、区、市，成功的只有两个。因此，从整体看，试点不能证明全面实施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可以立即推行。更现实的办法是根据不同地区情况，分类指导，分批逐步实施独生子女间结婚可以生育两孩、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者可生育二孩，直至全面放开二孩生育，特殊政情况可以生育多孩的方案。国家可以控制当每年生育数量降至1400-1200万时开始，由各地区逐步调整政策措施。在个别情况特殊的地区、单位，可以实施特殊政策。

将中国总人口降至5亿人的愿望很好，但难以实现。在短期内猛烈降低人口数量将产生许多经济、社会问题，风险很大，有可能影响国家稳定、安全。在下一世纪，根据当时新的情况，也并不是不可以考虑新的人口目标。制定政策和实施措施既要考虑其科学性，也要考虑其可行性，需要兼顾各个方面的需要。中国人口在本世纪末若能稳定至10—11亿，劳动力总量将超过6亿，完全可以满足发展经济的要求，老年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4弱，经过21世纪中期老龄化高峰的考验，这样的老年人比例将成为常态。也许，由于社会发展，人类健康水平提高，老年的定义也将随之改变。考虑到19世纪55岁就被认为是老年人，20世纪中老年的定义就提高到60岁，21世纪初、中期进一步提高老年的定义是完全可能的。

今后数十年内，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协调各领域政策，使低生育水平家庭受益，我们可以争取在远期完全取消对生育孩子数的规定，让计划生育回归至家庭计划的本来面目，通过经济、社会、文化、风俗等机制的作用，维持一个有利于国家、有利于社会、有利于家庭的低生育、高素质、低死亡、高寿命的人口，政策观念就将达

到一个新的高度。

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是最终达成一个优良的人口均衡状态的最好途径。各领域的发展和政策与人口发展政策互相关联、互相影响，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逐步整合、平稳过渡到最终目标，社会容易适应，政府容易把握，在发生意外情况时，也有充分的回旋余地。本世纪末最终达到的均衡人口状态是，平均寿命85—90岁，出生率和死亡率均为1.1%—1.2%，每年出生与死亡人数均为1200万左右，劳动力6亿多，60岁以上人口约占1/4，总人口为11亿左右。根据当时的全球和中国发展情况，这一目标可以进一步调整。

五、主要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得到以下五点主要结论：

1. 从各不同领域角度观察人口问题，有各自的要求。社会学强调人文背景，发展中及欠发达国家整体环境在家庭层次希望早生育、多子女，国家层次希望晚生育、少子女，需要折衷；经济学要求适当的劳动力数量，随整体发展水平提高增大对高素质劳力需求；资源环境要求控制人口数量，实现可持续的全面发展；人口学更重视人口数量、结构分布的适度、均衡，关心人口质量的提高。这些不同要求，需要通过综合、协调的政策及其实施，实现对国家、家庭整体最优的效果，实现经济增长、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国家富强。

2. 中国当前人口状况可以适应发展需要。从现在起到2025年止，都不会发生严重的人口问题。目前，生育水平约为每对夫妇生育1.5至1.6个孩子。劳动力仍有富余，为适应当前新的科技和产业革命形势，实现经济转型过程中不需要对劳动力数量提出更多要求，要把重点放在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劳动生产率上。广大民众普遍认同计划生育，有条件保持低生育水平，着力提高人口素质。

中国人口数量的最高峰将出现在2025年前后，总量略低于15亿。这一时期应当逐步实施生育政策的调整，可以由国家控制总量，各省、市、自治区依据当地情况分类制定实施方案，逐步实现城乡、民族统一政策，最终通过经济、社会发展，取消生育数量规定。

3. 中国人口平均寿命不断提高，至本世纪中可达80岁，本世纪末可接近90岁。百年以后，人口达到稳定。若每年出生1200万人，总人口将约为11亿，其中劳动力数量超过6亿，65岁以上老年人比例约为1/4，人口结构均衡，人口分布合理。随着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环境的形成，人口素质高，家庭结构好，人民生活幸福和谐。完善人口政策时机应在全国每年出生人口数下降到1200万之前后3年左右，使每年出生数长期稳定在1200

（下转第31页）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高尚全

摘要：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转变政府职能，打破行政垄断，必须弱化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保障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要认识到市场是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政府是创造环境的主体。为此，要推进政府从全能政府、管制型政府向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的转变，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

关键词：经济体制改革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转变政府职能 市场配置资源

作者简介：高尚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国虽然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运行市场化的基础已经确立，但计划经济的思维和管理方式仍然在现实中存在一定的“市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排斥政府必要的干预，这一点很容易成为复归或强化旧体制的根据。因此，改革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一、为什么说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计划经济的特点是通过计划等行政手段来配置资源，因此效率低下。例如，上世纪50年代，沈阳有两个相邻的工厂，一个叫沈阳变压器厂，一个叫沈阳冶炼厂，这两个都是政府行政主导的。变压器厂需要大量的铜，由主管的一机部从云南等地调到沈阳。冶炼厂生产的铜由冶金部从沈阳调往全国各地。一墙之隔的两个厂由于行政主导，没有市场，

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还有一个例子，上海的一家企业为了在夏天给车间工作的工人降温要申请买鼓风机，经过七个部门审批，待审批完毕，夏天都已经过去了。因此我写了《企业要有一定的自主权》这篇文章，发表在1956年12月6日《人民日报》上，编者还配发了《“必要”的手续》这样一幅漫画。当时说是一定的自主权，现在看来还是有点保守，企业应该拥有完全的自主权。如何调整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过去几十年来经济体制改革最核心的内容。

众所周知，30多年来的中国改革开放历程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无到有、逐步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经济发展逐渐摆脱行政计划控制的过程。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市场一步步扩大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而政府权力则逐渐淡化经济领域的资源配置作用。同时，现代市场经济显然已经不是政府只作为守夜人的原始商品经济，更加频现的市场风险和市场失灵都要求政府在保持市场经济与自然生态和社会和谐的平衡当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经验表明，什么时候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得好，经济就能够获得较快的发展，什么时候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得不好，经济发展速度就会有所减慢，经济发展质量和经济结构就出现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30多年来的建设和发展经验还表明，哪个行业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得妥当，哪个行业发展得就比较快，甚至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而哪个行业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得不好，哪个行业就问题突出，乃至拖累整个经济体的转型升级。经济体制改革要实现十八大确立的改革发展目标就必须要以捋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为核心。

从更深刻的理论角度讲，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内涵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成熟使得生产关系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的需求，因此有了近30年来经济的繁荣。作为生产关系之总和的经济基础出现的变革也同时要求上层建筑要进行相应的调整，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体现，经济体制的改革必然是以此为核心。与现代市场经济的经济基础相对应的上层建筑层面有着诸多的特点，最鲜明的服务型政府和法治政府两项（这里的政府是指广义的公权力机关，并非与狭义的政府）。服务型政府要求政府能够提供良好的市场运行的基础环境，能够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解决微观市场的不足，能够调和市场在优胜劣汰的资源配置过程产生的负面作用等等。言而总之，服务型政府就是强调政府要在市场经济当中发挥积极能动的正面作用，防止市场失灵对整个经济社会造成损害并为市场触及不到的地方提供协调保障。而法治政府则更多地是给政府划定了运用权力的界限，避免权力介入到市场中去产生权力寻租，防止行政垄断，保障市场主体的机会均等、交易自由、信息对称和权利公平。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是在新形势下如何坚持并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解决改革过程中产生的疑难问题的核心。在从计划经济

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经济社会发展也积累了很多问题，比如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导致的环境污染，社会分配缺乏有效调节导致的收入差距过大，公权力缺乏制约直接介入市场导致腐败现象严重、社会诚信缺失、阶层对立严重等等。因此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思路，就是要使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以及生态体制五个方面改革的协同推进，而一体不仅仅指的是这五方面的改革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还包括了这五方面的改革都要求解决好政府越位、缺位、错位的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问题，也就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问题。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好了，经济体制就捋顺了，政治体制就清明了，其他社会、文化、生态问题也都将迎刃而解。

二、如何发挥好市场的基础性作用

（一）如何正确理解宏观调控

正确理解宏观调控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关键。党的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基础作用”，这是十四大的表述。后来到了十四届三中全会，表述有所改动了，改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调控下发挥基础性作用”。到了十六届三中全会，我在参加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决定》时提出，“要从源头上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的建议。我提出，原来的表述并不科学，因为：一是宏观调控是资源配置的前提条件，还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内容？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五大支柱之一，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有健全的宏观调控体系。二是资源配置在市场配置的基础上发挥政府的作用，还是资源配置在政府的作用下发挥市场的作用？三是资源配置的主体是政府还是市场？是政府行政主导型还是市场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四是宏观调控的含义是什么？主要是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调节经济的运行。五是谁代表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国务院当然是代表国家，但省市也说自己代表国家，所以各地都争要宏观调控权。起草小组经过认真讨论研究并经中央同意，接受了我的建议，不再提“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只强调“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是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决定》的正确表述。应该说这个表述是科学的，与时俱进的。但在实践中还是强调国家宏观调控下，过多的强调政府的作用。目前各级政府和部门中过分强调自己的宏观调控职能，很大程度上是计划经济时期行政性控制的翻版。必须明确，政府宏观调控不是资源配置的前提，配置资源的主体是市场，而不是政府。十八大进一步明确提出：要“更大程度更大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

如何理解宏观调控，我感觉到有三点值得我们研究：一种说法，“目前进行的宏观

调控，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X次调控”，把宏观调控作为一种运动，好像除了这几次以外其他时间就没有什么宏观调控了；另一种看法，认为宏观调控就是砍项目，就是刹车；还有一种，把宏观调控跟改革对立起来的，好像要宏观调控就不要搞改革。我觉得以上三种都是对宏观调控的一种误解。首先，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我们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要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深层次矛盾必须通过改革来解决，因此不应该把它和改革对立起来。应该通过宏观调控来深化改革，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是一调控就不要改革了。其次，宏观调控是一项经常性的任务，要不断进行的，不能把它作为一种突击运动，靠行政手段为主的运动是不能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的。第三，宏观调控不能搞“一刀切”，经济运行中有投资过热的领域，也有不热的领域，因此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该抑制的就抑制，该发展的就发展，该紧的地方紧，该松的地方松，不搞急刹车，不搞“一刀切”，宏观调控的目的是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要从源头上改善政府宏观调控的水平。源头上就是我们原来讲的对市场经济的含义，应当与时俱进，原来的提法就是“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的作用”。这样，把国家宏观调控作为一个前提条件，好像配置资源的主体是政府而不是市场；好像资源配置在政府作用下发挥市场的作用，而不是资源在市场配置的基础上发挥政府的作用。因此，必须从源头上完善宏观调控。

宏观调控要更多地运用间接调控，尽可能少用行政手段。政府如何完善宏观调控，如何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是当前和今后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一是随着改革的深化，我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已经较高，传统的行政方式进行调控所起的作用不会很大。二是长期以来由于计划经济体制所产生的主要是总需求膨胀的倾向，现在已经让位给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所产生的供给过剩倾向。这就是说宏观调控的背景和基础发生了变化。因此，调控方式必应发生变化。三是依靠行政审批制度和管制来加强宏观调控，容易造成权钱交易，容易抬高企业的准入门槛，造成某些行业的人为垄断，提高某些行业的利润。管制越严，利润越高，地方的积极性就越高。四是行政手段容易加大改革和发展成本。因此，要尽量少用行政手段。

（二）打破行政垄断，保障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

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基本手段，利用价值规律推动市场竞争、促进生产发展和经济繁荣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成功的一个基本经验。对垄断行业进行改革，保障市场主体的自由竞争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改革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但是相对于其他领域的改革，垄断行业改革的推进较为缓慢。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中小企业发展困难、价格关系扭曲、结构调整进展缓慢、资源消耗过高等问题，都与行政性垄断范围过广、

程度过深导致市场机制作用发挥不充分有直接关系，垄断行业是深化改革的焦点和难点所在，改革攻坚必须打破垄断。

行政垄断已经严重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垄断行业在能源、电信、交通、金融等的垄断恶化了市场环境，影响了中小企业的发展。而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中小企业贡献了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50%以上的税收，并创造了80%的城镇就业。中小企业是缓解就业压力、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渠道，行政垄断对民生问题的解决造成不利影响。（2）行政性垄断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产生了负面影响，导致不同部门之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收入差距过大。在过去几年中，不同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其中尤以垄断性部门与竞争性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尤为明显。国民收入分配过度向企业倾斜，还为企业盲目扩大投资提供了资金来源，成为导致社会投资与消费关系失衡的一个重要因素。（3）与行政性垄断相伴生的是行政权力过多介入微观经济活动，由此衍生了经济转型时期的秩序混乱和腐败现象。近年来，腐败问题主要集中在土地批租、国企改革、金融市场等领域，而这些领域正是行政权力掌控的重要方面。行政力量对土地、能源、资本等要素市场的垄断为政府过度干预市场提供了便利条件，在短期政绩绩效的驱使下，政府为驱动市场主体进行投资，给予大量廉价的土地、资源等要素，市场失去了配置资源的基本功能，而政府投资决策体系的不健全往往造成很大浪费。（4）企业进行科技创新、服务管理创新源自于市场竞争，行政垄断排斥了潜在的竞争者，使民营企业失去参与竞争的机会，而垄断国企安于垄断利润现状，创新动力不足，这就使得旧的低端扩张模式难以改变，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在国际竞争中主要依赖价格、数量竞争，屡屡产生海外投资的重大亏损。

更大程度更大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必须深化垄断行业改革，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必须下决心在石油、电力、电信、金融、铁路等行业进一步深化改革，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完善机制，打破垄断，加快构造有效竞争格局，加快垄断行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步伐。

推进垄断企业股权多元化改革，允许非公有制经济进入垄断行业参与竞争。2005年和2010年，国务院先后发布两个非公经济“36条”，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对于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具有重要意义。两个非公经济“36条”都规定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和领域，允许进入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领域，允许进入社会事业领域，允许进入金融服务业，允许进入国防科技工业建设领域；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为打破垄断、引入竞争创造条件，为推进国有垄断企业股权多元化提供契机。

坚持公开、公正原则，保证垄断行业改革规范有序进行。不可否认，在以往的国有

企业改制重组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政企不分、监管不力为个别政府主管部门、企业经营者和出资人进行暗箱操作提供了可乘之机，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使国有产权制度改革受到质疑。国有垄断行业是特殊利益最为集中的领域之一，在股权多元化改革中势必会出现突出的利益博弈问题。对此，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方案公开、程序公正、社会参与、媒体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发挥市场的作用与转变政府职能密切相关，必须弱化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近年来，政府职能转变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受长期计划经济体制和思维惯性的影响，在不少地方和部门，政府的直接干预依然渗透在微观经济活动的诸多方面，不仅包括垄断行业的生产经营过程，甚至涉及已经市场化的竞争性行业。这种行政权力的滥用，为腐败行为提供了制度土壤，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公，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凡是市场主体有能力做好的事情都要交给市场主体去做，政府的主要职责是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

加强立法，提高反垄断法可操作性和执行透明度。应根据改革市场化的进程，修改我国的反垄断法。通过修改反垄断法，并制定行政法规、实施细则，不断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同时要强化反垄断执法，统一反垄断执法机构。通过积极开展反垄断法的实施，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

三、如何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

（一）政府职能的“缺位”、“错位”、“越位”

近些年来，尽管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政府职能已经发生了重要转变，但这种转变还仅仅是初步的，甚至在有些方面是滞后的。政府在不同程度上充当了市场中一个重要的竞争主体的角色。目前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无序竞争乃至恶性竞争现象，其背后或多或少有着政府竞争的影子。政府过多介入市场的微观层面，就难以站在全局的立场上实行全面统筹，就难免会削弱其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职能，甚至导致某些管理职能的扭曲。

在改革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是市场不足呢？还是市场失灵呢？我认为，主要还是市场不足，改革不到位。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没有摆正。主要表现在：一是“越位”。政府管了不少本来应由市场或企业管的事情，本来应该当“裁判员”的，它去当了“运动员”。二是“缺位”。政府主要应发挥服务功能，搞好公共服务，提供公共产品。服务是没有什么权，也没有什么利的，所以往往不愿意干。它愿意干审批，因为有权也有利。三是“错位”。扩大就业渠道，创造就业机会，理应是政府的职责，但有的政府部门却分片包干企业，直接管理企业的下岗分流，至于投资主体错位的现象

也不少。

出路是什么？出路就是“让位”。市场和企业能做而且政府不容易做好的事，政府应该让位于市场。总之，要牢固树立人民是创造财富的主体，政府是创造环境的主体的理念，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树立“非禁即入”的理念，即凡是法律不禁止，大家都可以干的理念。有了这样的理念，政府就容易转变职能，百姓就会有更大更多的创新空间。虽然部分审批还有必要，但大量的审批应撤除，让市场去调整，让群众去创业。而政府必须依法行政，不能有随意性，要成为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

（二）政府职能转变

政府职能转变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应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投资体制改革，消除地方政府投资扩张的冲动，增强其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功能。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积极推进政府从全能政府、管制型政府向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的转变，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创造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环境。

转变政府职能需要进一步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必须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必须认识到，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在市场，企业和老百姓才是创造财富的主体，政府应该是创造环境的主体。政府的职能要转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创造良好的环境上来，主要通过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激发社会成员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增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才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真正贯彻科学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转变政府职能还要求正确处理好集中与分散决策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传统体制高度集中的弊端虽然被认识，但集中体制“能办大事”的认识误区依然影响深远。而科学决策和执行存在多种约束条件，如信息对称与否、利益取向是否“一致”、决策目标是多重还是“单一”的、长期决策还是短期决策等等，不解决约束条件问题，很可能大事办不成，负面影响不小。市场经济客观上要求分散决策，但政府却存在很强的“集中偏好”，就难于根据走向市场经济的实际进程切实转变职能，反而会把不适当的决策“强加”给市场，甚至代替市场选择。这显然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转变政府职能的同时要充分认识到转轨时期政府的特殊性。政府与市场必须分野，但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相比，转轨国家的政府依然具有一些特殊的发展职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因此是不可避免的。对一个转型中的经济体来说，更需要论证的是：政府的哪些干预是现阶段必须但长远是要“退出”的，哪些干预无论现阶段还是长远都要“退出”，哪些干预是现阶段和长远都是必须的。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才能真正解释和处理好转轨经济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转轨国家的政府与市场关系，远不像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那样基本“定型”，而是一

个市场逐步发展与政府职能转变的互动过程。但只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就必须确立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地位，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在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这个历史背景下，市场经济发育不成熟是必然的。现实中的诸多矛盾更主要的是由于市场经济不成熟、市场机制作用不充分所致，并非所谓的市场机制“缺陷”。“权钱交易”和公共领域的“缺失”恰恰是市场经济不成熟的表现，是市场“边界”不清的结果，不能作为指责市场经济或市场机制的依据。问题的症结在于，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方面，究竟是强化政府职能转变，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更充分地发挥基础作用，还是强化政府对经济的直接控制力，这是根本方向问题。这个问题搞不清或方向反了，不仅无法最终完善市场经济新体制，而且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和稳定形成重大障碍。近年来尤其是金融危机以后我国的经济状况表明，只有加快政府职能转变，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更充分地发挥基础作用，才能促使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才能使经济社会获得持续健康发展。

（三）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政府要在市场经济当中发挥良性作用，成为创造市场环境的主体，就需要保证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体，即让资源通过价值规律的作用自由地在各个市场主体之间流动，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其前提是要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政府保障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必须深化对各类要素市场管理体制、财税体制的改革。从资源配置来看，我国生产要素市场还很不完善，市场机制还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获取各类生产要素的难易程度和成本高低存在显著区别。这不仅造成了市场主体的不平等，还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土地、能源、资本等要素市场发育滞后，与政府职能改革不到位有很大关联。土地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大部分掌握在政府手中。在当前的政绩考核制度和征地制度下，土地成为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和招商引资的手段，往往是一届政府就把几十年的土地都批出去了，结果就是鼓励企业扩张规模，使得我国这么一个土地资源稀缺的大国，还有大量的土地利用效率很低，浪费严重。此外，水、煤、电、油等能源的价格形成机制不健全。在我国目前的矿产资源开采体制下，获取开采权的成本很低，也使得价格和成本的严重脱离，这种扭曲的价格机制不能反映我国资源稀缺情况，造成了使用中的大量浪费。

政府保障各种所有制经济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必须打破行政垄断。以金融市场为例，对金融市场的各种干预和门槛限制不仅仅使利率市场化改革滞后，而且使各种民间资本难以公平地参与到金融市场的竞争中去，最终使得急需资金的中小企业难以获得资金支

持，只能求助于民间高利贷，而一些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通过金融市场获得资金后不是投资房地产就是放贷，以求高额利润，这样很不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

市场经济作为法治经济，政府还应当保障各类所有制市场主体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民营企业尤其是民营非上市公司的合法权利的法律保障程度还难以达到最基本的要求。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各类交易主体之间难免发生各种纠纷，而依据法律可预见的、公正的司法处理结果能够消除矛盾，恢复正常的市场秩序。我国司法实践当中企业之间的纠纷处理的干扰因素过多，导致市场主体的合法权利往往难以受到保障，这种现象在民营企业当中尤其显著。更有甚者，民营非上市公司各种财产权力还受到各种腐败势力的压榨，并难以受到法律的公正保护，其结果是企业创新积极性不足，资本大量外逃。政府要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就必须保障各类所有制市场主体的合法权利。

（四）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

建立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发挥政府积极职能，防范市场失灵的重要内容。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规律决定了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的同时也会产生许多失败的被淘汰者。而即使是市场竞争的优胜者有时也难免因为天灾人祸的影响而遭遇难以为继的危机。公平的保障体系能够为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免除后顾之忧，促进市场经济的和谐健康发展。

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也是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以人为本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重要的任务在于为广大社会成员提供有效的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公共就业服务、基本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使经济发展的成果充分体现为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积累日益强大的人力资本。

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的建设主体是政府。在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中，政府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这与其公共职能的定位高度相关。各级政府如果不能充分体现民意，顺利进行职能转变，则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很难建立和完善，为公众服务的积极性很可能为机构的私利所左右。建设服务型政府不仅包括政府自身机构和职能的演变，而且还涉及或包括政府的行政运行机制的变革、政府功能与市场功能的界定、政府行为的规范乃至行政权力来源与约束等更为丰富、广泛的领域。政府转型客观上要求相关领域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以及生态机制的协调配套推进。

责任编辑：晨乔

· 宏观经济 ·

中国就业格局变化与挑战

蔡 昉

摘要：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减少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导致从“十二五”时期开始，中国潜在GDP增长率显著下降。因此，只要实际增长率不低于潜在增长率，通常就不会产生周期性失业现象。根据这种变化了的情况，就业关注点应该从总量岗位问题转向结构性失业问题。本文从农民工和城镇就业人员这两个城镇就业主要群体，考察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的结构性失业风险，并相应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就业 周期性失业 结构性失业 劳动力市场

作者简介：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2012年中国GDP增长首次降到7.8%，比2011年低1.4个百分点，比“十一五”期间的平均水平低3.4个百分点。即便如此，仍然高于政府7.5%的预期目标。长期以来，中央政府始终把不低于8%的经济增长率作为保证就业的速度底线，然而，在2012年增长速度真实地低于这个基准时，却并没有产生对就业的冲击。在劳动者工资继续提高的情况下，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与2011年持平，求人倍率（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统计的岗位数与求职人数之比）为1.08，还高于上年水平。

这种现实与我们既往的经验不尽相同，要求在理论上做出一致性的解释，即以就业压力为基准，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现在可以接受较低的经济增长速度。同时，也需要回答下列政策问题：长期困扰中国的就业矛盾是否从此一去不复返。本文将分析相应的问题，同时指出目前已经初现端倪，并将在今后进一步显现出来的崭新就业挑战。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一、劳动力供求变化降低潜在增长率

作为长期处于低生育人口转变阶段的后果，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迅速且根本性的变化。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2010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已经达到峰值，此后开始绝对减少，预计在2010-2020年的10年间，这个年龄段的人口将减少2934万。我们可以将此看作是中国劳动力供给的下降。

在一般的情况下，人们把15-64岁人口定义为劳动年龄人口，那么，我们为什么在这里选择15-59岁人口作为劳动年龄人口呢？这是出于两点考虑。其一是从现行退休制度考虑。中国的法定退休年龄为男性60岁，女性50岁或者55岁。其二是由于中国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的特殊性。目前在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中，年龄越大受教育水平越低，受教育年限从20岁的9年下降到60岁的6年。鉴于这两点原因，超过60岁的普通劳动者很难找到就业岗位，难以作为有效的劳动力供给看待。

与此同时，经济增长继续保持对劳动力的强劲需求。例如，在2001-2011年的10年间，包括城市劳动者和农民工在内的城市就业，总共增加了约1.15亿。这个增量中，城市本地劳动者占37.9%，进城农民工占62.1%。我们可以把这个数量及其变化看作是劳动力的需求动态。从供求变化趋势来看，今后10年即使劳动力需求减半的话，也远远大于由劳动年龄人口决定的劳动力供给。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中，高速增长得益于劳动年龄结构优势带来的人口红利，即首先，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与比重的提高，保证了劳动力要素的充分供给；其次，人口抚养比持续下降有利于保持高储蓄率，为资本积累提供了保障；再次，劳动力无限供给确保不会出现资本报酬递减现象，使得投入型增长模式得以奏效；最后，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了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成为全要素生产率改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当人口因素发生根本性变化时，人口红利消失，上述经济增长源泉都会显著地减弱。

在劳动力供给负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有较大下降，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略微下降的设定下，我们可以估算出中国潜在增长率，在“十一五”时期平均10.5%的基础上，“十二五”期间将下降到7.2%，“十三五”期间则进一步下降到6.1%（图1）。值得注意的是，从“十一五”时期到“十二五”时期，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幅度和下降方式可谓相当陡峭，正是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从正到负，以及人口抚养比从下降到上升这个根本性转折造成的。简单地说，长期支撑中国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从此趋于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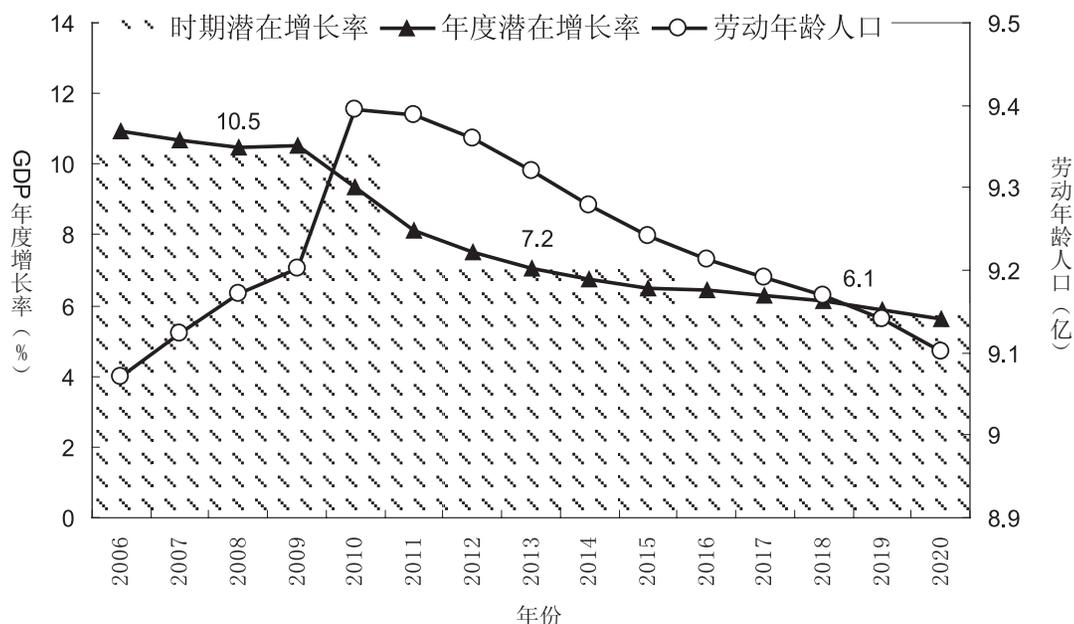


图1 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

资料来源：蔡昉、陆旸，《中国今后10年可以实现怎样的增长率？》，陈佳贵等主编《中国经济蓝皮书201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二、中国社会可以承受较低增长率

按照定义，潜在增长率就是在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充分就业前提下，所能实现的正常经济增长速度。因此，只要实际增长率没有降低到潜在增长率以下，就不会出现周期性失业现象。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低于8%，不仅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遭遇劳动力市场冲击，而且民工荒、招工难仍然是企业面对的主要挑战。

目前，中国处在中等偏上收入阶段，要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仍然有赖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因此，人们不禁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从更加主动的立场出发，是不是需要对经济增长施加一些影响呢？换句话说，更快的增长速度是不是更好呢？对此没有简单的答案。由于潜在增长率是供给方因素，一方面，如果可以通过改善生产要素供给条件，提高潜在增长率，从而取得可能的更快速度，无疑是求之不得的。实际上，我们也提出了通过改革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政策建议。另一方面，却不应该从需求方着手，用刺激的手段人为把增长速度拉到潜在增长率之上。

在经济增长自然减速发生时，经济学家和决策者都会有一种倾向，雄心勃勃地试图超越潜在增长率。对学者来说，往往会提出关于“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各种建议，例如经常听到的是，城市化和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带来的巨大需求。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也不乏能够抓住这些“新增长点”的政策手段，即可以引领大规模投资的产业

政策、区域政策和刺激性宏观经济政策。这些政策建议和手段都是着眼于扩大需求，然而，如果需求因素超越潜在增长率所需要的强度，则会造成各种扭曲，包括产能过剩、产业结构偏离比较优势、通货膨胀乃至经济泡沫。那样的话，中国经济只能愈加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

实际上，当前恰好具备利用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改变不平衡需求结构的条件。在2001-2011年期间，三大需求因素对GDP年增长率的平均贡献，最终消费支出为4.5个百分点，资本形成总额为5.4个百分点，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为0.56个百分点。我们来做一個粗略的假设，即让净出口贡献率为零（0.0个百分点），资本形成贡献率减半（2.7个百分点），最终消费贡献率保持平均水平（4.5个百分点），则全部需求因素为7.2个百分点，恰好可以支撑我们估算的“十二五”期间潜在增长率。既然潜在增长率是以充分就业为前提，意味着保持这个速度不会伤害就业，也不会减慢居民收入和支出的增长，因此，假设最终消费需求稳定是合理的。由此可见，人为制造需求刺激不仅容易导致扭曲，而且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正是由于潜在增长率固有的性质，以及根据国际经验可以预期的违背规律可能遭致的不良后果，2013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温家宝总理所做《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使用了潜在增长率这个经济学概念，并提出“必须使经济增长与潜在增长率相协调，与生产要素的供给能力和资源环境的承受能力相适应”的要求。

如果说劳动力供求从而就业形势的缓解是一个好消息的话，其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给了我们一个大好机遇，可以藉此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如果人为改变这个符合规律的经济减速趋势的话，不仅意味着丢掉这个向中国经济再平衡大幅度趋近的大好时机，还会因错误的政策取向而导致经济增长欲速不达。因此，利用这个劳动力市场的转变，把就业关注点从总量问题转换到结构性和摩擦性问题上，应该成为政策调整的方向。

三、未来的就业挑战依然严峻

中国经济在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丧失了人口红利之后，逐渐从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转变到新古典增长阶段。相应地，劳动力市场也开始经历一个从二元结构向新古典类型的加快过渡，面临的就业矛盾越来越不是总量性的，而是结构性和摩擦性的。我们来讨论未来中国就业将不可避免的两个严峻挑战及其应对之策。

（一）实现农民工劳动力供给的常态化

2011年，在由城镇户籍居民和农民工共同构成的全部城镇就业人员中，农民工所占比例已达35.2%，农民工进城就业对当年城镇就业增量的贡献率更高达65.4%。但是，由于制度性因素的制约，农民工这个决定性的劳动力供给却严重地缺乏稳定性。目前中国

城市化率达到 53%，但是，拥有非农业户口的人口比重仅为 36%。这之间的缺口就是那些进入城市 6 个月以上，被统计为城市常住人口，同时却没有取得城市户口的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农民工居住地与户籍身份的这种不对称，使得他们的就业是不稳定的，遇到各种制度性障碍，所接受的基本公共服务也是不充分的。因此，这个城市劳动力的重要来源的供给是不充分、不稳定的。

我们知道，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三种类型的失业现象，分别为周期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由于后两种失业现象主要是因劳动力市场上技能、岗位、时间等方面的供求不匹配造成的，与宏观经济波动无关，所以也被称作自然失业。据估算，当前中国城镇自然失业率水平大约为 4.0%-4.1%，与近年来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完全一致（图 2）。我们又知道，城镇登记失业的统计对象仅为具有本地户籍的城市居民，也就是说，本地劳动者仅仅承受结构性和摩擦性的自然失业。很显然，农民工成为周期性失业的惟一承受者。伴随着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农民工返乡与民工荒反复交替出现的现象，就可以证明这个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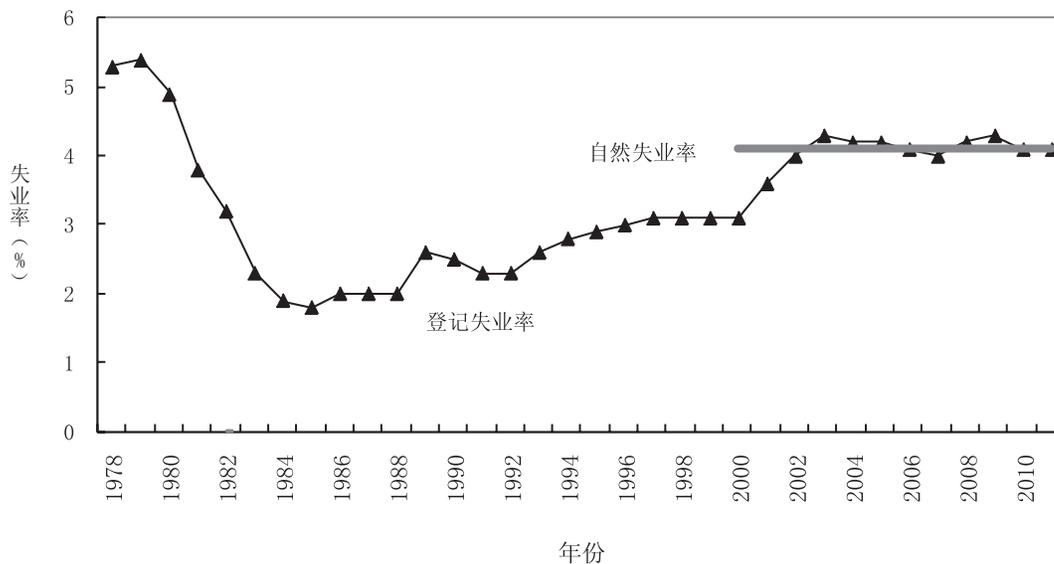


图 2 农民工承受着周期性失业风险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12》；都阳、陆旸，2011，《中国的自然失业率水平及其含义》，《世界经济》第 4 期。

不仅如此，农民工还面临着潜在的结构性失业风险。2011 年，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是 9.6 年。这个人力资本状况使他们恰好适应于第二产业的劳动密集型岗位（要求劳动者有 9.1 年的受教育年限），以及第三产业的劳动密集型岗位（要求 9.6 年的受教育年限）。但是，未来中国经济的趋势是，经济增长速度减慢而产业结构调整速度加快。显而易见，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尚不足以支撑他们转向这些新岗位，那时他们将不可避

免地遭遇结构性就业困难。

可见，防止未来农民工面对就业风险的根本办法，在于提高他们的人力资本。鉴于农民工是一个不断地被新成长劳动力所更新的群体，创造良好的制度条件和激励机制，使新成长劳动力在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尽可能多地接受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应该成为政策应对的关键点。

（二）应对城镇劳动者群体的结构性就业困难

在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过程中，产业结构调整将明显加速，并表现为就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换，以及从第二产业为主向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的调整。根据估算，劳动者从第二产业的劳动密集型就业转向第二产业的资本密集型就业，要求受教育水平提高 1.3 年；转向第三产业技术密集型就业，要求受教育水平提高 4.2 年；即便转向第三产业劳动密集型就业，也要求受教育水平提高 0.5 年。

与农民工的情况相反，具有城镇户籍的劳动者群体，已经出现一定程度的老龄化趋势。实际上，如果没有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入，城镇劳动力的年龄会比实际显示的要老化很多。例如，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010 年城镇常住的 15-59 岁劳动年龄人口中，20-29 岁组的比重，外地户籍人口为 35.0%，本地户籍人口为 21.6%；而 50-59 岁组的比重，外地户籍人口为 7.2%，本地户籍人口为 19.3%（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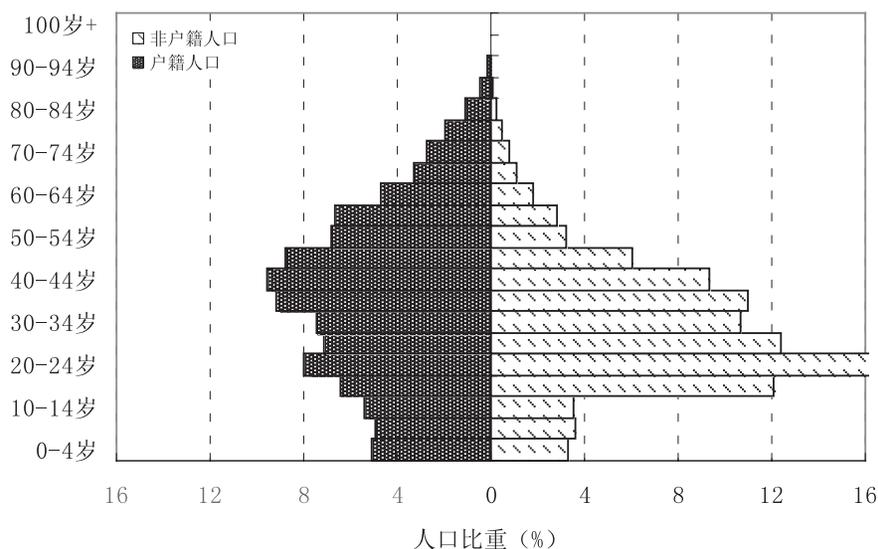


图 3 城市常住劳动年龄人口年龄构成

资料来源：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编，《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2 年版。

根据年龄与受教育年限之间关系的特点可知，具有城镇户口的劳动力中，有一个较大比例的人群，人力资本禀赋明显不足，表现在年龄偏大和受教育程度较低，难以适应

产业结构调整对技能的更高要求。这部分劳动者被政府识别为城镇就业困难人员，作为重点扶助的目标人群。城镇劳动者的这种人口构成，决定了总是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群体，经常处于结构性和摩擦性失业状态，构成劳动力市场上典型的自然失业人口。

人口受教育年限的提高需要长期的积累，而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例如，即使伴随着义务教育普及率的提高和高等教育的扩大招生，16岁以上人口的受教育年限，在1990-2000年期间仅仅从6.24年增加到7.56年，总共才增加1.32年。2010年人口受教育年限进一步提高到8.9年，10年中也只增加了1.34年。

因此，提高劳动者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是产业结构调整得以成功的关键之举，也是降低大学毕业生和青年就业群体免于未来自然失业冲击的人力资本屏障。在目前劳动力短缺、高技能与低技能劳动者之间工资趋同的条件下，对家庭特别是农村贫困家庭产生了一种受教育的负激励。虽然这些新生劳动力群体目前很容易找到工作，但是，在产业结构大幅度升级之后，他们的人力资本将不能适应新的技能要求，那时将成为就业困难群体，经常性地遭受结构性和摩擦性失业困扰。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在从二元经济发展到新古典增长的过渡时期，就业问题也要经历一系列政策关注点的转变，包括从依靠发展经济创造就业岗位，到依靠完善劳动市场和公共就业服务治理自然失业，乃至借助稳定和扩大劳动力供给，以保持经济增长源泉。在这个发展阶段上，就业比较充分，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劳动力市场条件。这时，需要充分利用难得的机遇，加快实现经济再平衡。与此同时，就业困难并没有消失，而只是转换了形态，即二元经济条件下的就业岗位不足转变为不匹配的结构性和摩擦性问题，需要更新认识、改变政策取向、采用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方式予以应对。

首先是实质性地加快包括户籍制度改革在内的相关改革，创造稳定的劳动力供给制度条件。劳动力短缺是新古典类型经济的典型特征，相应地诱致出资本密集型的技术结构和产业结构。但是，中国的特点是未富先老，在出现劳动力短缺的同时，并没有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上获得比较优势，因此，面临着传统比较优势丧失过快的危险。好在挖掘劳动力供给的制度性潜力仍然巨大，可以作为一种后发优势加以利用。

例如，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以及相关的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取向的改革，可以挖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潜力，大幅度提高农民工的劳动参与率，稳定和增强劳动力供给。同时，中国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在沿海地区大幅度提高的劳动力成本中，也包括了劳动者的流动成本，如果岗位能够转移到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成本可以得到降低。可见，在户籍制度改革的配合下，我们仍然有余地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从而最

大限度地延续人口红利。

其次是加大对教育和培训的公共投入，为产业结构调整积累必需的人力资本。在劳动力短缺乍现的一定时期中，劳动力市场表现为岗位充足，对技能要求降低的兴旺景象，对教育产生不利的激励效果。然而，在新古典类型的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经常遭遇的结构性和摩擦性的就业困难，也恰恰主要产生于劳动者人力资本与市场需求的不相适应。西班牙在这方面提供了沉重的教训。这个国家也一度出现就业形势好，从而相对降低了教育回报率的情形，受岗位增加及工资上涨吸引，西班牙年青人提前离开学校，大多进入建筑业找到工作。而当危机来临，该国的青年失业率持续高达 25%。

人力资本的短期激励因素与长期需求之间的这种矛盾，是一种典型的市场失灵现象，惟有政府出面，以改革教育体制和劳动力市场，以及加大公共投入的方式予以解决。教育体系中出现的供求关系失衡、教学质量降低，以及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不匹配等问题，都需要予以积极应对解决，但决不能得出教育发展速度，包括高等教育发展速度可以放缓的政策结论。相反，因应未来的需要，教育应该有更快的发展。在义务教育入学率已经很高的情况下，更快的教育发展则越来越倚仗高等教育的质量提升和数量扩张。

责任编辑：晨乔

（上接第 14 页）

万上下。具体的实施方案应选择一些地区在较大规模下试点，以了解社会实际反响，根据试点中发现问题准备对策。实施方案应经过职能部门、研究机构深入、细致研究、论证，并征求民众意见，向社会公开研究情况。

4. 老龄化是世界性的自然趋势，不足为怪。随着经济、社会、科技进步，老年的定义和概念也将不断改变，今天的老年观念在数十年后会有很大不同，应加强前瞻性研究，不必过分忧虑。但中国因上世纪 50、60 年代高生育的影响，老龄化势头特别迅猛，应当予以高度重视，采取相应措施。这方面国家已有专题的研究，提出了有力对策，在实施过程中还需随时观察情况发展，发动全社会参与。

5. 出生性别比偏高是许多重男轻女国家的特殊现象，中国这一现象相当严重，各地采取了许多措施，在一些省取得良好效果，但仍需要给予特别关注，采取综合性对策大力治理，尤其是在妇女权益保护、农村妇女出嫁后财产保障、弱势妇女群众关怀等方面下大力气。

总的说来，生育率低、平均寿命高是全球趋势，由此而来的正、负面影响客观存在，中国一定能处理好这些问题，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责任编辑：刘英奎

· 宏观经济 ·

创建中国以内需为主导的 对外开放新模式

杨圣明 赵瑾

摘要：一国选择什么样的对外开放模式，是由一国经济发展战略和目标决定的。中国要在未来10年确立内需主导型的发展战略，必须创建以内需为主导的对外开放新模式。即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开放原则的基础上，以服务业对外开放为重点，通过创建“国内区域经济协调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联动发展的新模式，实现“以开放促转型”的对外开放目标。

关键词：内需主导 对外开放新模式 服务业对外开放 以开放促转型

作者简介：杨圣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赵瑾，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创新开放模式、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任务。对外开放的实践表明，一国选择什么样的对外开放模式，是由一国经济发展战略和目标决定的。金融危机后，中央提出“大国经济发展主要是靠内需。只有立足扩大内需，才能使我们的发展立于不败之地”。^①为此，要在未来十年确立内需主导型的发展战略，必须创新对外开放模式，创立以内需为主导的对外开放新模式，即以服务业对外开放为重点，实现国内区域经济协调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联动发展，促进国内生产要素与国际生产要素大循环和大流动的新模式。

一、对外开放的原则和方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经济体。中国选择的对外开放道路，是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

^① 李克强，2012，《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求是》第2期。

主义，不是发展资本主义，更不是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不是私有化，也不是削弱国有企业的力量。因此，无论我们对外开放进入到什么阶段，发展到什么程度，自始至终不能放弃社会主义原则和方向。由于21世纪对外开放的重点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因而要确保对外开放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必须根据开放的不同内容和进程，确立和采取新的手段和方式。

第一，在是否开放以及何时开放的问题上，应该以国家利益为重。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经济体和影响世界经济发展与走向的重要力量。在国际上承担大国的责任、继续扩大市场开放的呼声中，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能否顶住外在压力，能否在开放中保持国家主权的完整和独立，考验着中国人民在经济全球化复杂环境下处理国际问题和国内问题的能力 and 智慧。

在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上，曾经出现了两种开放，一种是丧失国家主权的开放。如清朝的开放不仅丧失了国家主权，而且使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并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一种是维护国家主权的开放。必须注意到，在今天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中，丧失国家主权的开放已经与清朝时期的门户开放有本质不同。应警惕西方国家用经济而不是武力的手段诱引中国加快对外开放而使中国丧失主权。今后的对外开放必须考虑到国内经济发展的程度和承受能力，参与经济全球化不能以丧失自我主体性、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不能以牺牲社会主义制度为代价，必须按照自己的时间表，逐步推进，稳步进行，尤其不能放弃对关键的、战略性产业的适度保护。

第二，在开放过程中，应根据对外开放的不同内容和不同领域，采取不同的维护社会主义的手段。21世纪中国对外开放的产业将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对外开放的领域将由目前的经济领域拓展到文化领域。如果说在制造业对外开放中，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如军工、航天航空、石油石化、通信、电力、交通运输等行业保持国有经济的地位，提高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对于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至关重要的话，那么，在文化领域的开放中，要保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则必须重点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先进文化的建设，加快文化体制的改革，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第三，在开放的成果和绩效评价上，不仅要以是否增强一国综合经济实力为标准，更应以是否偏离社会主义方向，是否加强社会主义主导力和扩大社会主义的影响力为重要标准。改革开放的目的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因而在评价改革开放成果的问题上，不仅要看到对外开放的经济成果和经济效益，更要看到社会效益和政治影响力。如果改革开放的结果使我们步入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那么，即使我们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开放也是失败的，甚至是倒退的。

二、对外开放的战略：由以双边合作为主的 “平等互利”转向以多边和区域合作为主的“互利共赢”

中国对外开放一直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平等互利”侧重在双边合作中，通过贸易投资自由化给双方带来共同利益。在今天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多边、区域和次区域开放合作中，对外开放不仅要求在中双边经济合作对话中实现“平等互利”，甚至在双方的互惠互利中，给第三方或全球经济带来利益，而且要求在国际多边和国际区域经济合作中，找到利益的汇合点，通过经济的相互联系和彼此互动，实现“互利共赢”。

“互利共赢”是第三代领导人在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探索的对外开放战略。它反映了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一般规律，也适合中国国情，其主导思想是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让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一样共同享受经济全球化的成果。中国利用经济全球化发展自己，反过来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对世界做出独特的贡献。

第一，开展经济技术合作，遵循国际惯例和市场经济规则。对外贸易要遵守国际贸易规则，实行公平贸易，减少贸易摩擦和争端；对外投资要有利于东道国就业、产业的发展 and 环境保护，规避投资摩擦等。

第二，对外开放要重视本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利益。对外开放已经出现了成为世界的加工车间、关键产业和技术被垄断资本所控制等经济问题，以及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社会蔓延、腐败现象严重、贫富差距扩大等社会问题。如何处理好对外开放中的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国家民族利益与跨国公司利益，协调好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社会利益，是我们对外开放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

第三，以合作而不是对抗的方式实现共赢。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经济体，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不应与发达国家采取对立对抗的方式，而应通过与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企业的合作，使合作双方、第三方或者更多方获益。让世界因为中国的参与，而共享经济全球化的成果。

三、对外开放的动力：

“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促创新”与“以开放促转型”并重

对外开放是促进中国加快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手段。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面临的主要矛盾不同，对外开放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也不同。十六大提出“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十七大提出“实现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十二五”规划提出“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促创新”。十八大后，新时期对外开放的新目标应是“以开放促转型”与

“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促创新” 并重。

提出“以开放促转型”的新开放论，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第一，中国是一个转型经济体。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出现的受资源和环境约束的不可持续性，经济社会发展、城乡区域发展、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不均衡性，以及两种经济体制的不协调性等都是在转型变革中产生的，解决这些矛盾也需要在转型和变革中实现。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体制的两大转变，将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长期任务。

第二，中国是一个开放经济体。开放经济体的突出特点是国内问题国际化，国际问题国内化，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相互影响、彼此互动。融入全球经济中的中国经济发展和变化不仅影响世界经济的发展，世界经济的重大变化也影响着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进程，考验抵御风险的能力。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历史表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从资本和外汇短缺到资源和市场短缺的矛盾，不能仅仅在国内解决，必须在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循环中解决。而对外开放中凸显的外贸、外资、外汇、外债、外援五外不协调和不均衡发展，也不能仅仅依靠国内协调，必须在进一步对外开放中协调、均衡发展。

第三，转型与变革正在成为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谋求新的发展的主流。金融危机后美欧日发达经济体纷纷进行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美国提出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由过去债务推动型增长转向出口推动型增长和制造业增长；欧盟提出智慧、可持续与包容性增长，以创新为增长动力，建立资源节约型、高就业率、具有竞争力的社会；日本提出发挥“日本优势产业（环保、能源和健康）”和“开创新领域（亚洲合作、旅游和地方经济）”双轮驱动的新增长战略。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也正在寻求变革，如俄罗斯制定《面向2020年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规划》，改变以能源产业为支柱的经济结构，促进以创新拉动的经济多元化的经济转型。在变革的世界经济潮流中，中国必须与时俱进，在转型和变革中谋求新的发展。

四、对外开放的重点产业：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

改革开放30年来，制造业一直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点。入世前，制造业是中国吸引外资的主体，2001年第二产业吸引外资比重高达77.24%。入世以来，中国积极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到目前为止，已经开放了100个服务部门，其中54个允许外商独资，23个允许外资控股，基本没有设置地域限制、数量限制和歧视性待遇。2011年服务业吸收外资552亿美元，投资占比52.8%，首次超过了制造业。2012年，在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同比下降4.5%的情况下，虽然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仍继续超过制造业4.5个百分点，但由

于服务业部门分割、地区封锁和行业垄断，中国服务业发展仍较缓慢。2012年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仅为44.6%，不仅低于OECD成员国70%的水平，也低于同期的其他新兴经济体，如印度（65%）、巴西（67.2%）、南非（65.9%）和俄罗斯（58%）。与货物贸易顺差相比，服务贸易一直逆差。

实施扩大内需的经济发展战略，加快服务业发展将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的主攻方向和战略重点，并成为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根据“十二五”规划，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将由目前的43%提升到47%，服务业出口总额将达到6000亿美元。为此，未来10年，对外开放的重点将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不仅包括扩大金融保险、贸易、物流、信息服务、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对外开放，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推动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而且包括扩大医疗、教育、旅游、养老等生活服务业对外开放，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

金融危机后，服务全球化的最新变化是，跨国公司为了削减内部成本，把非核心经营业务外部化，并以非股权方式将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价值链，加快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①这为发展中国家参与服务业全球化创造了条件。应抓住有利于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服务全球化新机遇，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

第一，顺应生产性服务业已成为服务业跨国投资重心的新趋势，扩大通信、金融、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商贸服务等行业的“商业存在”这种服务贸易交易方式，鼓励外资参与软件开发、物流服务等。

第二，借鉴国际上国家投资促进机构目标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的经验，根据服务业发展的特点，出台专门针对服务业发展的促进政策。通过建立出口加工区、加强基础设施与技能开发、运用财政金融等多种激励措施，促进跨国公司对华服务业投资。

第三，建立服务外包产业园区，利用跨国公司非股权投资方式将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机会，积极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

第四，内地率先对港澳全面开放服务业，国家根据粤港澳服务业发达的独特优势和三地错位发展的定位，推动粤港澳共同制定服务业集群发展规划，将粤港澳地区建成亚洲地区服务业产业集聚地，加强对其他地区和城市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提高大珠三角的国际竞争力。

五、对外开放的重点国家（地区）：由发达国家扩展到新兴经济体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实施的是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但无论是对外贸易，还是引进外资，中国对外开放的重点区域都是发达国家。这种不平衡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已经

^① 《世界投资报告 2011：国际生产和发展的非股权形式》，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1 年版。

显现。目前全球经济发展和财富创造已经由OECD转向新兴经济体，南南合作将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据统计，1990—2008年，全球贸易仅仅扩大了4倍，但南南贸易却增加了20多倍。从国际直接投资来看，2010年，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首次超过了全球流入量的一半。

顺应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中比重扩大的新变化，中国在继续将发达国家作为开放重点的同时，应加强对新兴经济体的开放。新兴经济体的共同特点是，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劳动人口年轻化、实行开放的政策、中等收入消费群体逐步扩大等。向新兴经济体开放对扩大内需的意义，不仅在于有利于促进经济体制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解决未来中国工业化发展面临的资源和市场缺口问题，而且有助于在国际范围内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南北对话，改革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比较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六、对外开放的区域布局：由“国内区域开放”转向“国内区域协调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联动的发展模式

在以往以外需为主导的对外开放模式下，适应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地域开放，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产业开放。从统筹国内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目的出发，为了释放区域协调发展对扩大内需的潜力，应充分利用当代国际区域经济迅猛发展的重大机遇，将自贸区发展战略与国内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结合起来。加强环渤海经济圈与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长江三角洲与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泛珠江三角洲与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中西部地区与阿拉伯国家、上海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的合作，由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转向利用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新趋势，促进国内生产要素与国际生产要素大循环和大流动，实现“国内区域协调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联动发展。

第一，实施“亚洲战略”，发挥东部地区环渤海经济圈、长三角、珠三角对外开放的先行优势，参与亚太自贸区建设。为了争夺对亚太地区的领导权，美国正在积极推动“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谈判。日本也提出实行亚洲新战略，并把“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日中韩自贸协定”作为实现该战略的两大支柱^①，力争建成亚太自贸区。中国地处亚洲，地缘政治的重心在亚洲。在这场争夺世界经济重心——亚洲领导权的竞争中，中国应积极应对，实行亚洲战略，防止在美国推动的TPP谈判中被边缘化。

^① 由于三国经济总量占亚洲经济70%和全球经济的18.6%，消费人口为15亿，预计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一旦形成，将仅次于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区。

第二，追逐全球经济增长点的新变化，向西开放，将西部大开发与西部大开放结合起来。一项根据联合国对世界主要国家每5年年龄分布情况分析预测，人口老龄化将影响全球经济不同地区的繁荣和消费波段：日本首先在1990年开始老龄化；西欧、东欧、俄罗斯、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在2010年左右开始这一趋势；中国在2020—2035年间；东南亚在2040—2060年间；拉丁美洲在2050—2060年中间；最后是印度、其他南亚国家、中东，在2065—2070年间。北非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可能持续增长到2085—2100年间。中国应抓住时机，将西部大开发与西部大开放结合起来，拓展经济发展的新空间。

第三，积极推动实现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一体化。上海合作组织占欧亚大陆总面积的3/5，占世界总人口的1/4（约16亿）。成员国中，除了中国和俄罗斯外，其余四国均位于中亚地区，是新欧亚大陆桥的必经之路，也是连接东西方交通的走廊。该组织自2001年成立以来，成员国在安全、政治等领域的合作取得了重大进展。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美日欧加快区域和跨区域经济合作的新变化，增强了成员国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的意愿。中国应利用各成员国地域相连的地缘优势、良好的政治关系以及经济的互补性（中国在家电、日用消费品、资金和技术上的优势；其他成员国在能源和资源方面的优势），加快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对中国的意义，不仅有利于中国培育新的出口市场和境外投资市场，减少对欧美市场的依赖，而且有利于加快中国西部地区交通、物流和信息的发展。目前能源、交通、通讯、农业已经成为投资的重点。为消除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促进西部地区快速融入全球经济，中国应尽快启动自贸区谈判，以开放促进国内区域经济协调。

七、对外开放的流向：由“单向开放”转向“双向开放”

在以往的对外开放模式下，适应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中国对外开放的流向主要体现为“单向”开放，其表现为商品流动侧重扩大出口，寻求贸易顺差，其中2008年中国贸易顺差在GDP中的占比达到了6.7%；资本流动侧重引进外资。

创立以内需为主导的对外开放新模式，意味着要“以开放促转型”，在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宽领域对外开放中实现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良性互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此，中国对外开放由单向到双向的转变，应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生产要素的双向开放，即国际商品流动由“积极扩大出口”转向“积极扩大进口”（特别是先进技术装备、关键零部件和重要能源原材料进口）；国际资本流动由“引进来”转向“走出去”；国际技术转移由“引进关键设备和技术”转向

“扩大技术出口”。二是市场的双向开放，即由“对外开放”转向“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并重”，由开拓国际市场转向挖掘国内市场，实行内需主导型发展战略。最终通过“单向开放”向“双向开放”的转变，达到商品、资本、技术和市场的良性循环和互动，促进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

八、对外开放的手段：由“政策开放”转向“政策协调”

一国对外开放阶段不同、开放的内容不同，决定采取的对外开放手段方式也不同。在商品市场开放阶段，影响对外开放的主要是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因而对外开放的手段主要是政策性开放，即通过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对外资实行优惠政策等，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在服务市场开放阶段，影响服务业对外开放的是法律和制度，因而对外开放的手段不仅要求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扩大市场准入、完善各项法律规章制度，而且要求在与全球经济融合的过程中，建立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机制。

建立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机制是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提高，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加深的必然选择。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GDP中的占比已经超过了10%），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全球第二大贸易国（在全球贸易总量中的占比超过了10%）、全球第五大资本输出国的大国地位，决定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政策选择难以在当代相互联系的国际经济中独善其身。进一步对外开放将超越战后建立的国际三大经济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的内在要求。一是作为G20的重要成员，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要根据每年G20峰会的议程，适时调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进行相关领域的改革和开放。二是作为亚太地区的重要国家，在区域和跨区域谈判中，如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东盟中日韩澳新印等谈判中将进一步做出开放承诺，实行经济政策协调。三是作为美欧日大国经济体的重要伙伴，其双边层面的战略与经济对话，也要求中国从产业政策、科技政策到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和调整。

九、对外开放的利益：由单纯追求“经济效益”扩展到追求包括“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在内的实现多元平衡的综合效益

以往的对外开放，我们的目标是千方百计扩大出口，获取贸易顺差，片面追求外资数量的快速增长，轻视了对科技、文化、环境、生态的影响。创新内需主导的对外开放模式，将超越“经济效益”，更加重视“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如外资引进应注重对的环境保护，对外投资应注重提高当地的就业水平和环境保护等。同时，实现“经济效益”，也将由以往追求GDP的数量增长，转向以开放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的提高。

十、对外开放的风险防范：由WTO框架保护下的被动应对 转向建立国家经济安全体系的主动防范

近年来，中国对外开放是在严格履行WTO规则下逐步推进的。WTO的五年过渡期安排，使中国在融入国际经济的过程中实现了平稳过渡。过渡期的结束，预示着中国已经脱离了WTO的特殊框架保护。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不仅使中国宏观调控的难度加大，防范贸易风险、投资风险、金融风险的任务加重，而且中国也将面临经济、政治和文化风险的新挑战。对外开放的风险防范将由以往的在开放中依靠WTO规则的特殊保护，转向全面建立国家经济安全体系，迎接经济全球化冲击的主动防范。

在对外开放中保护国家经济安全，增强承受和抵御风险能力的关键是建立国内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但面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我们首先应借鉴国际经验，作出中国抵御风险的制度安排。

第一，成立外国投资的专门监管机构。对于外国投资并购本国企业，发达国家大都设有专门针对并购行为的行业损害和经济安全问题进行审查的机构，如美国的外国投资委员会、日本的公正交易委员会和澳大利亚的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继外国直接投资管辖权由欧盟成员国转向欧盟后，欧盟也开始酝酿成立类似美国的外国投资委员会，标准化各成员国的外资审批机制，以保护知识产权和国家经济安全。据统计，到2005年底，在中国已经开放的产业中，前5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公司控制，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近10年来，随着外资并购规模不断扩大，外资在华并购金额占同期外商直接投资额的比重已经由1999年的5.94%上升到了2008年的14.03%，预计未来将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由于并购企业主要集中在中国行业龙头企业和国内知名品牌，借鉴国际经验，为维护国家产业安全，中国应尽快成立外国投资委员会。

第二，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美国具有严格的审查外国投资的法律政策，并根据国家经济安全重点不断完善。《国际投资政策》（1983）、《综合贸易和竞争法》（1988）、《2007年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案》（2007）都是对外国公司投资美国资产的审查和限制制度。2003年美国国土部出台《保护重要基础设施和资产的国家战略》，确定了包括农业、水资源、公共卫生、应急服务、国防工业、电信、能源、运输、银行金融、化工、邮电、信息技术等12个重点保护部门，几乎覆盖了整个国民经济。日本的《禁止垄断法》、《外国投资法》和《外汇管理法》对外资并购也都有相应的规定。针对金融安全、产业安全和信息安全等问题，中国应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如《金融监管法》、《期货法》、《信息和通讯服务规范法》等，以保护国家经济安全。

第三，建立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防范机制。如在产业安全上，完善产业预警机制，

灵活运用WTO规则和贸易救济措施，防止国内产业受到冲击；在金融安全上，考虑承受能力适度开放资本项目，并加强金融监管；在资源能源安全上，建立重要战略资源的国家储备体系，确保石油的稳定供应。

第四，建立海外投资安全保障机制，确保海外投资安全。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加大了在非洲、中东等自然资源丰富地区的投资，投资涉及资源开发、工程承包、基础设施建设等多个领域。而近年来中东北非政局动荡不仅造成海外投资损失，而且威胁了人身安全。仅以利比亚动荡造成的损失为例，中国在利比亚有75家企业（其中，央企13家），50个项目的工程承包，涉及金额188亿美元，人员3.6万余人，直接经济损失达15亿元人民币。预计“十二五”期间，中国海外投资额将大幅提高。如何保护海外经济利益，确保中国海外资产和人员安全将是对外开放面临的新课题。今后中国应通过签署双边投资协定、建立海外投资安全保障机制等，确保海外投资安全。

责任编辑：刘英奎

（上接第 69 页）

参考文献

1. 商务部，2013，《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报告 2011-2012》。
2. 商务部，2011，《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报告 2010》。
3. 中国 WTO 研究会，2011，《基于产业价值链分析的贸易摩擦对策研究》。
4. 中国 WTO 研究会，2011，《我国企业通过香港“走出去”研究》。
5. 张燕生，2013，《加快推进“走出去”战略》，《经济问题》第 1 期。
6. 邢厚媛，2012，《政府应在集群式“走出去”中发挥更大作用》，《外经贸动态》第 1 期。
7. 林宏宇，2012，《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国际关系学院学报》第 3 期。
8. 李志群，2011，《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快建设现代化强国》，人民网 5 月 17 日。
9. 陈经纬，2011，《香港应当在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中发挥更大作用》，中国日报网 9 月 16 日。
10. 杜人淮，2011，《政府定位：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关键》，《经济研究参考》第 22 期。
11. 孙玉才，2011，《“走出去”战略下的行业协会的定位》，《中国电力企业管理》第 9 期。
12. 金灿荣，2011，《“走出去”战略十年回顾：成就与挑战》，《现代国际关系》第 8 期。
13. 江涌，2011，《有关“走出去”的几个突出问题》，《现代国际关系》第 8 期。
14. 陶坚，2011，《从积极稳妥到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现代国际关系》第 8 期。
15. 张建红、周朝鸿，2010，《中国企业走出去制度障碍研究—以海外收购为例》，《经济研究》第 6 期。

责任编辑：刘英奎

· 宏观经济 ·

我国货币保持适度增长的理论思考

徐洪才

摘要：我国货币“超发”的说法缺乏科学依据。国际经验表明，世界各国货币与收入的比率总体上趋于上升。近期，我国货币政策应该将广义货币（M2）增速维持在13%—14%，真正回归稳健；利率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应谨慎使用，公开市场操作继续担纲主角；同时加快“金融三化”等改革，推动货币政策从“数量型”调控向“价格型”调控转型。

关键词：货币供给 货币政策 经济增长 通货膨胀

作者简介：徐洪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研究员。

一、货币“超发”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社会上广泛流传着货币“超发”的说法，引起了激烈争议。温家宝同志在全国人大十二届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2013年我国广义货币（M2）增速将控制在13%左右。这是我国政府从目前国内外经济发展实际出发，维持稳健货币政策基调，从而为宏观经济稳定运行提供稳健货币保证的理性选择。过多货币投放将导致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而过少货币供给又会导致通货紧缩、经济严重下滑等棘手问题。

然而，相对《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201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7.5%的目标，M2增速超过了GDP增速5.5个百分点。按照大家通常理解的“货币增长等于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和”，这是否意味着我国政府对通货膨胀有了较高容忍度？是否又与今年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控制在不高于3.5%的政策目标相冲突？我国适度货币供应量究竟应该保持多少？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进行科学分析。

M2与GDP的比率通常作为衡量一国中央银行货币发行过剩程度的指标，该比率越高，货币过剩程度就越严重。1990年，我国M2/GDP之比为0.82倍，此后一路高歌猛进。2009年，我国M2绝对值首次超过了美国。2012年，我国新增M2几乎占到全球新增货币一半。截至2012年12月底，我国M2达到97.41万亿元人民币，GDP为51.93万亿元人民币，M2与GDP比率也创下了历史新高1.88倍。相比之下，2012年底美国M2为10.4万亿美元，GDP为15.7万亿美元，两者比率只有0.67倍。因此，有人大声疾呼：我国货币严重“超发”了，已经变成“堰塞湖”了。于是乎，近年来我国物价和房价上涨似乎都能从这里找到答案。

必须指出，这种观点是不科学的，它不仅可能误导我国未来货币政策取向，还可能误导市场对通货膨胀预期，对宏观调控和经济发展产生不良影响。

二、中美两国货币构成比较分析

将中美两国货币构成做一比较，有助于澄清对我国货币发行的某些模糊认识。

首先，中美两国M2统计口径不一样，不好简单直接比较。美国货币供应量包括四个层次：一是流通中现金M0，即联邦储备系统和存款机构之外通货；二是狭义货币M1， $M1=M0+$ 可交易用存款（支票存款、转账信用卡存款、各种与活期存款性质相近的存款），不含存款机构、美国政府、外国银行和官方机构在商业银行存款；三是广义货币M2， $M2=M1+$ 非交易用存款（隔夜回购协议、隔夜欧洲美元、货币市场存款账户、货币市场共同基金、储蓄和小额定期存款等）；四是广义货币M3， $M3=M2+$ 其他货币性短期流动资产（大额定期存款、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长于隔夜的回购协议和欧洲美元等）。从2006年3月开始，美联储停止对外公布M3数据。

我国货币供应量也有三个层次：一是流通中现金M0，即在银行体系之外流通的现金；二是狭义货币M1， $M1=M0+$ 企业活期存款+机关团体部队存款+农村存款+个人持有信用卡类存款；三是广义货币M2， $M2=M1+$ 企事业单位定期存款+居民储蓄存款+其他存款（财政存款除外）。随着金融市场发展和金融工具创新，中国人民银行多次修订货币供应量统计口径。2001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将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计入M2。修订后的 $M2=M1+$ 居民储蓄存款+单位定期存款+单位其他存款+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2011年10月起，中国人民银行将非存款类金融机构在存款类金融机构存款和住房公积金存款纳入M2的统计范围。

仔细分析中美两国货币体系，不难发现其中的巨大差异。其一，我国M1中不包括居民活期存款，因此，我国M1范围比美国M1范围窄。其二，美国将大额定期存款划到M3，因此，我国M2范围比美国M2范围宽。其三，我国支票不能直接兑换成现钞，当两国

M1数值相同时，在美国有实际经济意义的现钞是M1，而我国有实际经济意义的现钞则小于M1。这个差别使得我国经济主体缺乏足够的流通货币，而美国则有较充裕的货币。其四，在M2项下，当M2数值相同时，则我国居民储蓄存款金额很大，但流通的、有实际经济意义的货币却很少，因为我国M2被高额储蓄占了，而美国几乎全部是M1。而且，美国金融市场发达，金融工具品种繁多，规模巨大，持有这些资产可以非常便捷地转变成货币，居民无需保有很多银行存款。因此，教条主义地将两国M2直接比较，将不会得出科学结论。

其次，美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早已不是M2或M3。通常情况下，美联储把联邦基金市场利率作为调控目标。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该利率一直处在接近于零的水平，出现了所谓的“流动性陷阱”，因此，美联储政策也被几轮“量化宽松（QE）”所取代。在实施这种“超常规”货币政策过程中，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呈现一种“超常规”扩张趋势。2008年9月以前，美联储总资产长期保持在大约0.90万亿美元的稳定规模，总负债保持在0.86万亿美元左右。2008年9月10日，美联储总资产为0.93万亿美元，到2012年12月12日推出QE4，美联储总资产达到近2.92万亿美元，总资产规模惊人地扩张了2.14倍。但是，从2008年底到2012年底，四年间美国累计M2上涨22.8%，GDP增长9.9%，而CPI涨幅只有6.3%。原因也许可归结为市场信心不足，导致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意愿下降，进而导致货币流通速度下降；还有，就是美国货币政策产生了“溢出效应”，向世界其他地区转移了风险。但是一个基本事实是，美国货币增长并非简单地等于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相加。

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的时期，我国并没有将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其间金融主管部门调控经济主要指标是现金投放量和银行信贷规模。改革开放之后，我国重视使用信贷规模调控。1985—1997年，中国人民银行实行“统一计划、划分资金、实存实贷、相互融通”的信贷资金管理政策，宏观金融调控体现为对信贷规模和相应再贷款数量直接性、计划性和行政性调控。1998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转而实行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以公开市场操作为主要政策工具的间接性货币政策调控体系。1994年第三季度，我国正式推出货币供应量监测指标，1996年1月开始公开发布月度货币供应量数据。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融资结构逐渐发生变化。目前，传统的以银行为主导、资金多源于存款、主要提供低风险和固定收益的间接融资模式，已经难以满足较高风险的创新产业融资需求，能够提供多层次直接融资服务的资本市场体系正在形成，银行信贷资金在各种融资中占比越来越小了。顺应这一变化，2002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开始按月公布社会融资总量。目前，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实际是一个包含M2、银行信贷规模和社会融资总量的多重目标体系。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居民活期存款属于居民储蓄存款，不属于M1，而是包含在M2里面，因此M1中缺少了很大一块活期存款，这在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对M1数据分析就会严重失真。而在M2里面，居民定期存款占了很大比重，在一定程度上我国居民定期存款是对其他金融资产（如：债券和股票）的“替代”，这部分货币“活性”程度很低，这是我国M2规模较大的一个重要现实原因。因此，应该及时调整我国M1和M2构成，把M2中的居民活期存款划归到M1，这将有利于弥补现有M1的缺陷，有助于对货币供给做出科学分析。实际上，包括欧盟和日本在内的主要发达经济体广义货币包括M2和M3两个部分，通常是指M3。如果计算M3/GDP，一定比M2/GDP大一些。

三、中美两国 M2/GDP 比率比较分析

首先，中美两国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我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目前仍处在农村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对中央银行货币投放存在较大现实需求。1990—2012年，我国名义GDP累计增长了27.8倍，而M2增长了63.7倍，货币增速高出经济增速1倍多。这是我国经济逐渐“市场化”和生产要素逐渐“货币化”的具体表现，在一定程度上，M2/GDP比率阶段性升高也是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发挥作用的结果。在经济起飞阶段，由于资产形成增速超过了名义GDP增速，1992—2012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平均累计同比增长了23.5%，超过了GDP增速一倍以上，导致经济体内资本存量与GDP之比上升，促使全社会资本周转速度下降，导致货币周转速度下降，迫使中央银行增加投放货币，最终导致M2/GDP比率上升。可以说，只要我国资本形成增速继续高于GDP名义增速，M2/GDP比率就会继续保持较高水平。

其次，中美两国资本市场发达程度不同。我国资本市场不发达，老百姓在一定程度上只能被迫把钱存进银行；而美国拥有发达的资本市场，老百姓有多样性的金融投资选择，拥有货币的各种“替代”手段。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与金融资产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了，两者转换起来十分容易。考虑到美国现有金融资产大约67万亿美元，包括银行存款、股票、债券等基础金融资产（为避免重复计算，把共同基金和金融衍生产品除外），这个数字约为美国GDP的4.2倍；这意味着，在美国1块钱产出需要4.2块钱金融资产与之匹配，但其中货币占比却很少。我国目前大约有160万亿元的金融资产，约为GDP的3倍；就是说，在我国1块钱产出需要3块钱金融资产匹配，但其中货币占比却很高。

再次，美国金融创新加快了货币流通速度，减少了货币需求。一般而言，货币用于债权债务支付活动，并要满足经济活动主体对货币的各种需求，包括交易、投机和预防需求等。同时，市场流通中货币经过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已经远大于中央银行

投放的基础货币。货币主要体现为银行存款，也是一种金融资产，与债券、股票等并无二致，储户把钱存在银行也要追求投资回报。银行存款的回报就是银行支付给储户的利息，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实际利率低于名义利率，有时还为负值，严重侵蚀了储户利益。因此，货币“逃离”银行体系是个趋势。这一趋势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初花旗银行发明的大额可转让存单（CDs），是银行融资证券化的开始。70年代中期，美林投资银行发明了按揭贷款证券化（MBS），首开资产证券化的先河。进入21世纪以后，资产证券化浪潮迅猛发展，虽然经受了2008年金融危机重创，现在美国金融体系中仍然有着重要地位。

过去10多年间，随着资产证券化蓬勃发展，美国商业银行业务运营模式发生了巨大转型，由过去的“购买—持有”模式转变为“发起—分销”模式。银行在贷款发放后，不在资产负债表上持有到期，而是采取出售、证券化、购买信用衍生产品等方式，把贷款信用风险由“表内”转移到“表外”。通过这一操作，美国商业银行在6至9个月内就可以实现贷款销售，为发放新贷款提供资金来源，因此加快了资金周转。在该模式下，商业银行大量收入来自贷款服务费、预支利息、托管交易费、提前还贷罚款等贷款服务收入和手续费收入。因此，银行的非利息收入上升，利息收入相对下降。这种新的业务模式在理论和实践中都被认为能够扩大银行收入来源，为银行节约资本，帮助银行分散风险。然而，美国次贷危机也暴露了这种新模式在激励、透明度、风险管理等方面的缺陷。无论如何，这种模式事实上显著减少了美国银行体系中的货币存量，这些金融创新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替代”银行创造货币的作用。

四、国际社会 M/GDP 比率的变动趋势

比较分析美国、欧盟、日本、韩国和我国M/GDP比率变动的历史数据，不难发现有以下特点。

第一，世界各国的M/GDP比率总体呈现上升趋势。1990年美国的M2/GDP为0.57倍，2012年为0.67倍。1995年欧盟的M3/GDP为0.72倍，2012年为1.03倍。2003年日本的M3/GDP为2.06倍，2012年为2.41倍。1990年韩国的M2/GDP为0.77倍，2012年为1.44倍。1990年我国的M2/GDP为0.82倍，2012年为1.88倍（见图1）。

第二，美国和欧盟的M/GDP比率总体保持在较低水平，近年来随着持续实施宽松货币政策，该比率也出现了较快上升势头。2007年，美国的M2/GDP为0.53倍。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该比率加快上升，到2012年底上升了26.4%。2007年，欧盟的M3/GDP为0.97倍。2008年金融危机特别是欧债危机之后，素以稳健著称的欧洲央行（ECB）被迫放松货币，致使该比率上升了6.2%。

第三，M/GDP比率持续上升是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本形成或资本存量快速增长时期的普遍现象，欧美和亚太地区国家都曾经历这一历史阶段。除了中国，目前世界上货币与收入比率较高的国家还有德国、奥地利、荷兰、日本，该比率分别为1.8、1.86、2.32、2.41。日本是大国中比率最高的国家。最近10年，日本M3/GDP快速上升，却出现了长期的通货紧缩。类似国家还有韩国，在M2/GDP比率上升过程中，韩国CPI反而震荡下行。事实上，很多国家进入工业化过程后都经历了货币与收入比率迅速增长时期，即使工业化基本完成以后，该比率仍然居高不下。韩国在1970年该比率仅为0.27，2009年则高达1.47。近年来有所回落，但仍然保持在1.44倍的高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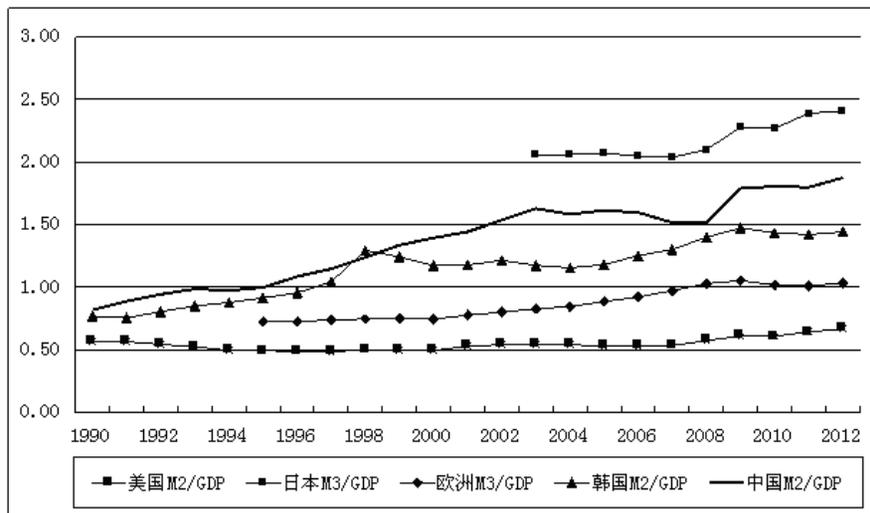


图1 1990年以来美国、日本、欧洲、韩国和中国 M/GDP 的比率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由上可知：目前我国货币“超发”的说法依据不足。各国经济处在不同发展阶段，金融体系发达程度参差不齐，货币与收入之比自然会有很大差异。加之，各国衡量货币指标不一，有的用M2，有的用M3，而且具体内涵也有较大差别。因此，将该指标做静态横向比较，其合理性就大打了折扣。理论上讲，货币供应量是全社会的货币“存量”，是某一时点承担流通和支付手段功能的金融工具总和。相比之下，GDP是“流量”或“增量”，将货币“存量”与收入或财富“增量”做比较，科学性似乎也不够。因为，一是，货币不仅要满足全社会当期“新增”财富的交易需求，也要满足“存量”财富的交易需求。二是，“存量”财富中到底有多少要进入市场交易，恐怕也难以精确计量。三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金融资产转换为现金难易程度不同。比如，现金可转换程度可视为100%，即1；那么，定期存款转换程度也许只有0.9，而普通股股票转换程度可能只有0.8。因此，对货币的科学计量就应综合考虑不同金融资产可转换成现金的难易程度。

$$\text{即: } M_d = \sum_{i=1}^n W_i A_i = W_1 A_1 + W_2 A_2 + \dots + W_n A_n$$

其中， M_d 为货币需求， W_i 为资产 A_i 的“转换系数”，反映该资产可转换成现金难易程度， $W_i \in [0, 1]$ ， n 为正整数。但是，有关 W_i 的设定，目前国际学术界并没有统一标准。这方面，也许我们可以借鉴历次《巴塞尔协议》对风险资产设置权重的做法。但是，依据过去有限经验对不同国家不同金融资产设置统一“转换系数”的做法，可能是一次科学上的冒险。这里，货币 M_d 是一个“合成”值。它不仅忽略了利率影响，还忽略了微观主体对不同金融资产风险与收益偏好等因素影响^①，因此，这个货币方程式只是理论上的抽象，仍然难以精确地计量经济活动对货币的真实需求。只有科学界定货币的复杂结构，才能对货币供应量是否合理做出科学判断，显然这是本文难以完成的任务。

也许正是基于货币供应量难以准确计量这个原因，现在发达国家中央银行基本都放弃了将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而是通过调控金融市场“价格”信号，即利率水平，进而影响微观市场主体的投资和融资行为，来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当然，目前我国利率市场化尚处于初期阶段，在较长时间里广义货币供应量可能仍然是货币政策关注的重要中介指标。

五、近期我国 M2 增速应该维持在 13% — 14%

在西方经济学中，货币需求理论主要有费雪交易方程、剑桥数量方程、凯恩斯的货币需求函数和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函数。为了简化讨论，本文选择剑桥方程： $M = KPY$ 。

其中： M 为货币需求量； K 为以货币形式保有的财富占名义总收入的比例； P 为价格水平，用CPI表示； Y 为总收入，用GDP表示。

对剑桥方程两边取自然对数： $\ln M = \ln K + \ln P + \ln Y$ ，然后对两边进行偏微分：

$$\frac{\partial M}{M} = \frac{\partial K}{K} + \frac{\partial P}{P} + \frac{\partial Y}{Y}$$

当时间段足够小的时候，上述公式可以近似写成：

$$\frac{\Delta M}{M} = \frac{\Delta K}{K} + \frac{\Delta P}{P} + \frac{\Delta Y}{Y}$$

从增量角度看，就是： $M\% = K\% + \text{CPI}\% + \text{GDP}\%$

短期内， K 可视为常数， K 项变化为零，因此得到人们通常认知的公式：

①凯恩斯主义在剑桥数量方程基础上引进利率变量，进而从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均衡角度探讨了货币与收入的关系，代表性理论就是IS—LM模型。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方程为： $M_d/P = f(Y_p, W; r_m, r_b, r_e, 1/P \cdot dp/dt; \mu)$ ，公式左边 M_d/P ，表示货币实际需求量，右边是决定货币需求的各种因素：一是恒久性收入 Y_p 和财富结构 W ；二是各种资产预期收益： $r_m, r_b, r_e, 1/P \cdot dp/dt$ ，其中： r_m 代表存款利率， r_b 代表债券利率， r_e 代表股权收益率；三是随机变量 μ ，包括社会富裕程度，取得信贷难易程度，社会支付体系状况等。

$M\% = CPI\% + GDP\%$ ，即：货币增长等于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和。但是，历史数据证明这个等式通常并不成立，原因是K项变化并不为零，在经济制度变动较大和受到外部干扰因素冲击的情况下尤其如此。例如：最近30多年我国经济制度处在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美国经济，K项的影响就不能忽略不计。

1990-2012年，我国M2年均同比增长了21.25%，GDP为10.13%，CPI为4.68%，M2增速超出GDP增速与CPI增速之和的差额部分高达6.44个百分点，但总体趋势为逐渐收窄：1990-1999年，超出部分均值为8.35个百分点；2000-2009年下降到了5.25个百分点；2010-2012年又下了一个台阶，进一步下降到3.02个百分点。这部分大体包括两个方面的影响因素：一是经济体制转轨，例如：土地、资源和工资等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以房地产市场为例，2012年我国房地产业销售额为6.4万亿元，银行房贷余额12万亿元，政府土地收入和税收3.9万亿元，中央银行要为这些交易活动提供必要的货币保证。二是金融深化，以股票市场为例，2012年底国内上市公司流通市值18.2万亿元，日均成交金额1510.6亿元。此外，债券市场、基金市场、期货市场、外汇市场、信托市场、保险市场等交易也都需要货币作为媒介才能完成，未来这方面货币需求将进一步增加，这些都构成了M2增速超出CPI增速与GDP增速之和的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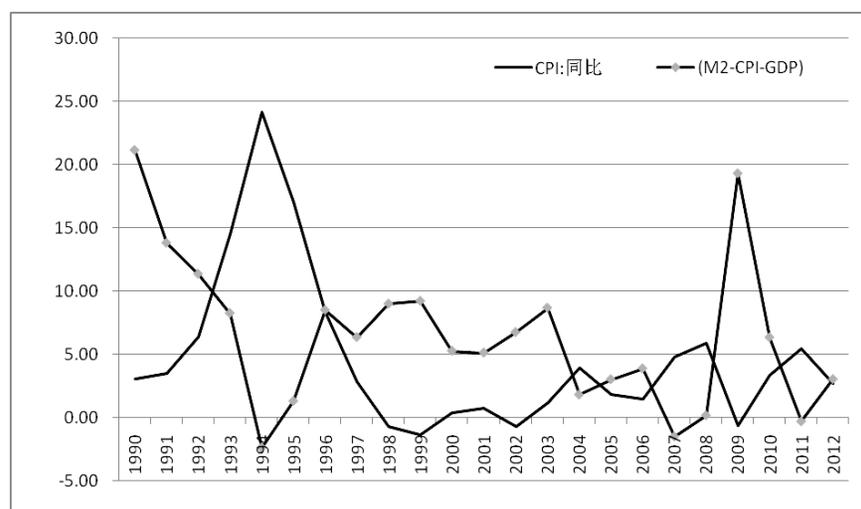


图2 我国CPI与(M2 - CPI - GDP)差额的走势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可以直观地发现，我国“M2-CPI-GDP”差额变动大体呈现与CPI“负相关”走势（见图2），而且在CPI“上升”时该差额“收窄幅度”要小于当CPI“走低”时的“扩大幅度”。这个“规律”颇有点耐人寻味。这意味着：当经济处于下行周期，中央银行往往偏向选择“多增加”投入货币，以促进经济增长；而当经济处于上行周期，中央银行通常选择“减少”货币投入，但减少的“幅度”似乎要小很多。因此，总的来说，中

央银行似乎更倾向于选择放松货币。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经说过：中央银行控制货币好比驾驭马的缰绳，当马跑得过快时，轻微收紧一下缰绳便会立刻奏效；而当马停下来时，放松缰绳，马要么原地不动，要么加快前行。可见“搞死”经济较容易，而“搞活”经济却很难。

那么，我国合理的货币增速应该是多少呢？一般来讲，一国货币供应增速不应该低于其经济增速。如果低于经济增速，将会导致通货紧缩，这就意味着我国货币增速应该至少有7.5%。同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通货膨胀率也不应该为零，维持3.5%左右的CPI增长是合理的。如果采取CPI为零的政策，由于我国市场机制不完善，金融效率还比较低，实体经济必然受到伤害。考虑这些因素，我国M2增速应该保持在11%左右。

但是，我国是一个正在向现代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在生产要素市场化过程中，生产要素需要货币化和资本化；特别是在生产要素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接轨过程中，土地、工资和资源等价格都将上涨，这是合理的，都需要一定的货币投放。而且，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快速发展，日益扩大的金融交易活动也必然要求新增一定数量的货币投放。这两个方面的货币需求姑且称之为“转轨需求”，大约在2%—3%。因此，我国合理的货币增速应该=GDP增速（7.5%）+CPI增长（3.5%）+转轨需求（2%—3%）=13%—14%。

如果目前我国M2增速达不到13%，设想只有10%，甚至更低，必然引起通货紧缩，导致经济增速急剧下滑、失业率快速增加和社会不稳定。2012年第三季度，我国宏观经济成功实现了软着陆，第四季度开始回升向好，2013年以来延续这一温和向好势头，但是基础并不牢靠，如果政策调控力度拿捏失当，经济增长则可能出现反复。但是，货币增速也不能高于14%，否则，通胀可能要卷土重来了。总之，我国货币政策要为经济增长、价格改革和金融深化提供必要保证，既要“保增长”，又要“防通胀”，要掌握好平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快速增长，中央银行提供了稳健的货币保证。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的“换挡期”，潜在经济增速将逐步下降，经济增长“重心”将逐步下移，M2增速也将逐步减少。但是，随着我国资本存量规模进一步扩大，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也要发挥作用，货币需求还将进一步上升；而随着我国金融深化和直接融资加快发展，货币在我国金融资产中比重又将下降。综合考虑这些影响因素，展望未来，我国仍然需要继续保持货币适度增长。

六、近期货币政策取向及未来金融改革重点

2013年我国CPI涨幅将控制在3.5%左右，但从近期物价走势看，实现这一宏观调控政策目标确有难度。数据显示，前三个月，广义货币M2增速分别达到了15.9%、15.2%和

15.7%，超过了全年M2增长目标2个多百分点；金融机构新增人民币贷款分别为1.07万亿元、0.62万亿元和1.06万亿元，社会融资总量分别为2.54万亿元、1.07万亿元和2.55万亿元。从相关数据看，2月底以来我国货币与信贷政策已对1月份货币宽松表现做出校正，但与全年货币与信贷政策目标相比，校正力度似乎不够。3月份我国CPI受食品价格下降的影响同比上涨了2.1%，但是2月份CPI上涨了3.2%，未来物价走势充满不确定性。

需要关注的是，推高物价上涨的中长期因素开始显现：一是主要发达经济体普遍实行宽松货币政策，可能会引发新兴经济体的输入性通货膨胀；二是国内房地产市场回暖与房地产调控新政出台致使房屋租金上涨；三是以原油、天然气为代表的资源品价格改革整装待发；四是物流成本长期居高不下，使得食品类消费价格涨幅较高；五是工资成本仍然有继续上涨的要求。因此，我国CPI可能要承受中长期上行的压力。从全年趋势看，我国CPI整体表现为“前高后低”，因此下半年CPI可能会在基数效应下一路走高。

2013年是我国政府换届之年，新一届地方政府不同程度存在追求GDP增速和投融资的冲动，特别是新一轮“城镇化”建设浪潮方兴未艾，预计2季度以后社会资金需求将逐渐增强。外部环境也不容忽视。最近3个月，我国外贸形势出现了好转，预计今年我国外贸出口可能略好于去年，中央银行外汇占款也将进一步增加，近期人民币汇率开始走强，这些都对今年货币政策能否守得住“稳健”基调提出了严峻挑战。

目前，我国货币供应总体属于中性，略微偏向宽松。虽然2月份中央银行有意识收紧了一下，但是相对全年M2增长13%的政策目标和眼下出现的温和通胀苗头，下一步货币政策应该真正回归稳健，将M2增速调回到13%—14%的中性增长区间。

首先，严格控制社会信用总量。逐步收紧货币供应，将M2增速由现在的15%逐渐向中性区间靠拢。全年银行信贷投放控制在9万亿元左右，把握好投放节奏，全年各季度大致保持“3：3：2：2”的投放比例；加强对影子银行的监管，社会融资规模保持在15—16万亿元。

其次，谨慎使用利率工具。从目前及未来几个月发展趋势看，保持实际利率为“正”的可能性很大，再考虑到近期我国经济呈现“微弱复苏”态势，去年4季度以来的经济反转基础并不牢靠，“稳增长”任务还十分艰巨，因此暂时不必提高银行存贷款基准利率。当然，也无必要下调基准利率。

第三，谨慎使用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工具。近期里，受到发达经济体普遍采取宽松货币政策和我国外贸形势温和好转的积极影响，我国外汇占款规模上升较快，但是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回旋余地仍然很大，暂时也不必提高金融机构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当然，也不必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第四，公开市场操作继续担当货币政策主角。公开市场操作具有“灵活性”的特

点。针对目前流动性较为宽裕的实际，应充分发挥“正回购”等政策工具的作用，必要时可考虑恢复发行央行票据。与此同时，进一步发挥金融监管政策作用，配合产业政策实施，调整信贷资金结构，积极引导银行信贷资金投放。

第五，扩大国家外汇储备的创新使用。国家外汇管理局已经成立了专门的外汇储备委托贷款办公室，应该进一步创新相关政策工具，鼓励商业银行申请外汇贷款，用于支持境内企业“走出去”，扩大企业海外投资与并购。此举可以间接减轻中央银行投放的外汇占款。

以上为短期对策。长期看，我国货币政策则应逐渐减少“数量型”工具使用，逐步发挥“价格型”工具作用。为了实现货币政策这一转型，就必须加快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等金融改革，这是宏观层面。此外，也不应该忽视中观层面的金融市场结构优化和微观层面的金融机构内部改革，也就是建立一个完善的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大力发展区域性中小金融机构，打破金融垄断，促进市场竞争，加快国有金融机构改革。

总之，2013年采取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搭配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近期中，货币政策应该真正回归“稳健”，要特别关注新一届地方政府融资和投资冲动，防止经济剧烈波动，为实现全年宏观调控目标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 Devereux, Michael B. and Alan Sutherland. 2008.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and Monetary Policy.”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55, 1363-1375.
2. Greenspan, Alan. 2007. “The Age of Turbulence: Adventures in a New World.” the Penguin Press, New York.
3. 张晓朴，2013，《金融体系的动态演进与风险管理：对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十大反思》，《证券时报》3月29日。
4. 周小川，2012，《国际金融危机：观察、分析与应对》，中国金融出版社。
5. 陈元、钱颖一，2012，《大碰撞：CF40 - PIIE 纵论全球经济变局》，中国金融出版社。
6. 徐洪才，2013，《货币政策：是延续，还是转调》，《现代商业银行》第2期。
7. 徐洪才，2012，《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8. 徐洪才，2010，《2010年我国货币政策的挑战与对策》，《中国发展观察》第2期。
9. 徐洪才，2009，《大国金融方略：中国金融强国的战略和方向》，机械工业出版社。
10. 徐洪才，2009，《全球金融危机对完善我国“最后贷款人制度”的启示》，《中国金融》第7期。

责任编辑：晨乔

我国中西部地区承接加工贸易 转型升级的若干对策

——基于对重庆市的调研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课题组

摘要：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仍是未来一定时期我国贸易领域的一项重大课题。中西部地区在承接东部沿海地区加工贸易的过程中表现出一定优势，但在如何实现转型升级上仍需进一步提升。基于对重庆市的调研分析，本文建议加工贸易领域应实现企业主体的多元化以及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的合理化，引导加工贸易企业从贴牌生产向自主品牌发展，从单一外贸型向内外贸一体型转变。同时，应注重改善金融发展环境，提升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明确财税优惠政策，确保相关政策的制度化和可持续性。

关键词：加工贸易 转型升级 区域金融中心 财税政策

作者简介：王迎新，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王朝阳，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范建镛，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杨锦权，中粮集团，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硕士。

改革开放以来，加工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由于贸易额大而一直占据“半壁江山”，并为经济增长做出了较大贡献。自2003年以来，为继续发展加工贸易并克服加工贸易的负面效应，引导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已成为我国贸易经济、产业经济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党的“十八大”报告又一次提出了“强化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协

* 本文系2012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研重点课题的成果之一，课题主持人为王迎新研究员。作者感谢重庆市外经贸委、统计局、口岸管理办公室等单位对调研活动的支持；感谢李媛同学在收集资料和整理数据方面为本课题做出的贡献。

调,形成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出口竞争优势,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重大课题。

2012年5月,课题组赴重庆对我国中西部地区承接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情况进行了调研。调研发现,重庆市已基本形成了开展加工贸易的操作平台,发展势头较好。我们认为,重庆具有便利的交通物流、宽松的政策环境、相对低廉的成本要素以及比较完善的产业配套等四大优势;在发展加工贸易方面表现出四个特点,即活跃的经济现状、齐备的开放平台、初见成效的金融结算中心以及趋近完善的人才资源保障。可以说,重庆在加工贸易发展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我国中西部地区承接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做出了示范。但是,重庆在开展加工贸易中也有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妥善解决这些问题对我国中西部地区承接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一、全面提升中西部地区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水平

我国中西部地区承接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与东部沿海发展加工贸易的特点不同。东部沿海除了国家政策支持外,还具有得天独厚的运输条件,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东部沿海经济发展日新月异,吸引全国范围内的劳动力向东部沿海聚集,由此形成了加工贸易的发展基础。相比之下,重庆更多的是依靠政策来发展加工贸易,属于后天培育。随着政策优势的逐渐消失以及劳动力成本的逐步上涨,发展加工贸易的基础将会相当脆弱,继续夯实发展加工贸易的基础迫在眉睫。重庆应注重引导企业结构、产业结构、劳动力结构合理化,全面提升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水平。

1. 引导加工贸易企业主体从以外资企业为主向不同所有制企业发展,特别是要重视民营企业的发展。企业结构的合理化需要避免外资独大,鼓励其他类型的企业开展加工贸易。调研发现,与全国加工贸易发展的特征相似,重庆加工贸易企业的主体也是以外资企业为主,且出口比重呈日渐上升态势,目前已经达到了90%以上;与此对应的是,国有企业的比重快速下降,已经接近2%,集体、民营及其他所有制企业所占比重微乎其微。加工贸易的主体是外资企业,意味着重庆加工贸易的主体基础比较脆弱。一旦经济环境和政策环境有所变化,外资企业势必会到其他地区或国家寻找投资机会。近些年,在东南沿海地区随处可以看到类似的例子,改革开放初期在那里开展加工贸易的外资企业已经陆续到越南、印度等国家寻找更廉价的劳动力和更优惠的政策环境。因此,重庆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过程中应有意识地均衡不同性质企业的比重,特别是要重视民营企业的发展。这对于我国中西部地区承接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可持续发展,夯实加工贸易发展的基础,均具有重要意义。

2. 引导加工贸易从单一产业向多种产业发展。产业结构合理化要求加工贸易企业

不应集中在某一类行业（如机电类或IT类），而是要因地制宜地进入更多行业，避免因某一行业不景气导致加工贸易发展出现大起大落。在进行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过程中，重庆也在尽量避免走东南沿海城市的发展路径。从加工贸易产业结构来看，重庆从几年前就开始布局电子产业，包括软件和电子产品的制造，最终选定笔记本电脑作为核心产业，并以此带动整个产业链的发展，打造笔记本产业基地，引进品牌厂商，吸引代工厂商，并形成配套的产业链。重庆希望通过这些举措达到两方面目的：一是通过制造业基地的建设承接东西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创造就业岗位；二是外销和内销并重。在此基础上，重庆希望将加工贸易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过渡，因为笔记本电脑制造不仅包括生产环节，还包括研发。但调研中发现，实际上研发环节并没有真正“引进来”，在当地还没有看到像苏州等地的科技研发中心。从重庆海关进出口的商品结构中也可以发现，虽然集成电路、蓄电池和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等机电产品是加工贸易的主要产品，但仍是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机电产品。也就是说，虽然统计中这些商品可以算作高新技术出口，但实际中仍是以组装为主。因此，我国中西部地区在承接和实现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过程中，要引导加工贸易从单一产业向多种产业发展，避免产业（行业）结构的单一性，并推动产品从劳动密集型为主向技术密集型为主过渡。

3. 引导加工贸易企业劳动力从数量多向素质高转变。劳动力结构合理化是稳定加工贸易企业的基础。加工贸易企业从沿海地区转移到重庆等西部地区，主要看中的是重庆的劳动力低成本，这就需要有大量的一线劳动工人以满足加工贸易企业发展的需要。与重庆相似，我国其他中西部地区也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理论和实践均表明，人力资源是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我们认为，实现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不仅依靠大量低成本的劳动力，更重要的是依靠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在我国中西部地区承接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之时，要培育一支业务精良的技术工人队伍，政府应在企业管理培训和技术培训方面给予指导与资金支持，社会组织、研发机构和高校也应与企业联合培训，以形成就业、培训的良性机制，引导劳动力从数量多向素质高转变。

4. 引导加工贸易企业从贴牌生产向自主品牌发展。调研发现，重庆市承接的加工贸易还处于贴牌生产阶段，这在我国中西部地区承接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具有共性。我们认为，实现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应认真总结东部沿海发展加工贸易的经验，切实认识到培育自主品牌的重要性，避免走东部沿海的老路。东部沿海地区在经济发展之初，加工贸易异军突起，对当地经济乃至全国经济发展都做出了重要贡献。随着东部沿海地区经济水平的总体提升，加工贸易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发展基础，尤其表现为政策支持丧失和劳动力成本的高企。加工贸易多属于制造业，销售市场基础薄弱，如果不能形成自主品牌，就难以形成溢价能力以对冲高企的劳动力成本。因此，我国中西部地区

承接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要有意识地对企业自主品牌上予以引导和支持。对当地政府而言，应鼓励企业创立自主品牌，切实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必要时可以设立奖项对自主品牌企业进行奖励。

5. 引导加工贸易企业从单一外贸型向内外贸一体型转变。重庆发展加工贸易受到约束较多的是物流问题。尽管重庆采取了各种举措来解决这一问题，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随着我国经济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将有更多货物流向东部沿海地区及其他国家，这必然会使物流通道变得相对狭窄。此外，受各种因素影响，能源价格将逐渐升高，势必会增加物流成本。这一切都将构成我国中西部承接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不利因素。因此，中西部地区要立足自身，努力扩大当地加工贸易企业内采的比重，并不断扩大内销的比重，以缓解物流的制约。也就是说，从市场需求看，加工贸易企业应从单一外贸型向内外贸一体型转变，即按照内外需的市场导向发展加工贸易，其产品既可满足外需，又可销往内地，使企业真正以市场需求调节产品的内外贸走向。当然，这有赖于加工企业和当地政府的共同努力。

二、不断提升金融服务于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能力

按照相关说法，重庆金融业的定位是以结算为主体的金融中心，即在银行、证券、保险等主流金融业务、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区域性要素市场建设的基础上，在体现西部区域性金融中心功能的同时，构建结算型金融中心。确定这一定位的基础是对金融中心的分类。有观点认为，金融中心有三种分类：一是行政总部集中的金融中心，如北京；二是要素市场集聚的金融中心，如上海；三是结算类金融中心，如新加坡。我们认为，重庆市要参照的对象，是新加坡式的金融中心。

新加坡在国际金融、贸易融资、海事金融、保险、财务运作方面具有国际领先地位，在资产及财富管理方面属于佼佼者，同时还是全球排名靠前的外汇交易中心。新加坡是亚洲地区第一个设立金融期货市场的金融中心，还拥有活跃的短期资金市场。来自金融业的增加值占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由20世纪70年代的5%提升至12%以上。另据统计，新加坡现在有各类金融机构600余家，其中，银行近120家、投资银行50多家、保险公司130多家、保险中介公司60多家、基金管理公司100家、证券行60多家、期货公司30多家、财务顾问50多家。在面积仅为71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汇集了如此众多的金融机构，其密集度和多样化足以覆盖经济发展对金融的巨大需求。新加坡区域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有三大支撑因素，即政府鼎力支持、创新提升地位和符合国情的监管。

要学习新加坡，重庆尚有很长的道路要走。从实践来看，重庆市目前围绕结算的实践还多以单一项目试水为主，依赖政策特批和先行试点得以成行。新加坡的经验表明，

要建成一个“中心”的规模，必须先有数量的积累。这一点，不论是从政策法规、还是从重庆金融企业数量和规模来看，都还不完全具备。即便横向比较的话，重庆上市融资的企业也还不够多。比如从A股上市公司数量来看，在西部12省市中，重庆还排在四川、陕西、新疆之后。从上市公司数量和证券化率等指标来看，重庆在西部地区并无明显优势，要实现100%证券化率的目标还任重道远。

建立结算中心的基础来自于银、证、保主流金融机构、非银行类金融机构以及区域要素市场三方面的协同发展。目前，重庆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发展层次与金融中心的要求仍存在一定差距。除了人才的挑战之外，重庆还面临三重挑战：一是西部地区经济一体化的程度不高，金融中心建设缺乏金融驻地的强力支撑，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容易造成金融发展结构失衡；二是目前的金融产业发育程度不高，开放度不够；三是金融创新能力较弱，投入有待提高。

同时，重庆市金融业自身运行中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包括：融资结构不均衡，过度依靠银行融资，资本市场融资能力不强；部分区县和企业贷款期限和使用期限不匹配，存在流动性问题；对外辐射力不强，还缺乏有较大影响力的金融机构和交易平台；政策环境、人才环境还有待进一步改善。针对这些问题，为配合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提升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能力，建议在以下方面进行努力：

1. 推进银行、证券、保险三类主要金融行业的均衡发展。进一步推动银行、保险稳健运行，提高银行融资能力，做大信贷总量；提升保险社会管理能力，加快推进保险创新试验区建设。重点提高资本市场融资能力，积极发展券商、投行及各类证券中介机构；依托股份转让中心，推动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在境内外上市；加强与银行间交易商协会合作，利用银行间债券市场融资。

2. 稳步发展创新型金融机构。大力发展股权投资类企业，以境外人民币设立股权投资基金为抓手，积极引进外资股权投资基金，探索设立股权引导基金。提高小额贷款公司运行质量，吸引更多民间资本参与，做好小微企业的融资服务。完善担保征信体系，更好地发挥担保服务功能。鼓励信托、金融租赁、汽车金融公司、财务公司等机构为企业提供多层次的融资服务。

3. 加快建设金融要素市场体系。按照国务院清理整顿交易所的要求，提升现有交易所的运行质量和规范性。充分发挥现有市场在聚集要素、发现价格、配置资源、服务中小企业等方面的作用，提高市场交易功能和定价能力。

4. 做大做强地方金融机构。推动地方金融机构通过上市和引进战略投资者，增强实力、壮大规模，加快推进重庆银行、重庆三峡银行上市，适时开展重庆农商行回归A股工作，支持西南证券通过对外兼并收购打造千亿市值的全国一流券商，鼓励法人保险公司

增资扩股。推动地方金融机构走出去，在全国拓展业务，增强对外辐射力；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提升金融服务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能力。

5. 进一步优化金融发展环境。进一步完善现有税收政策、补助政策和奖励政策，优化政策环境，促进金融机构更好地为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坚决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优化法治环境，维护金融稳定。进一步加大人才培养、引进和使用力度，优化人才环境，培养高素质的金融人才队伍。

三、明确财税优惠政策的制度化保障和可持续性

从调研情况来看，在承接沿海产业转移和发展加工贸易方面，目前重庆政策优惠预期不稳，特别是在财税政策和相关扶持措施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

第一，税收政策的制定权主要在国家层面，如全国人大、财政部等，中央并不提倡地方搞规范性文件，地方权限很有限。

第二，税收政策的好坏影响加工贸易的发展。目前主要有两种加工贸易的税收政策：一是进料加工，生产企业实行年底退税，一般来说是按增值税征收，对进口部分免税或者实行抵扣；二是来料加工，进口的原材料实行免税，只是最后增值部分免税而不是出口退税（国内的部分不退税），这一政策20多年来没有变动，这对于采购国内原料较多的企业不公平，导致许多原本可以从国内采购的原料转而从国外进口，降低了国内相关产业的配套能力。加工贸易的税收政策如不修改，重庆乃至全国的加工贸易就可能向别的地区或国家转移。因此，应对来料加工也实行年底退税而不是免税。重庆现有的加工贸易发展模式是“一头在内”，其优势就是充分利用当地或周边辐射地区的人力资源、自然资源以及加工行业所需的原材料。但由于受税收政策规定所限，未来在重庆加工贸易大发展阶段，这一矛盾对行业发展的制约将凸显出来。如果税收政策的优惠消失或相应的税收规定不及时修订，重庆又没有制定地方规范性文件的相应权限，那么，当地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必将受到制约。

第三，加工贸易有其行业特殊性，税收优惠政策不能取消。一旦这些优惠政策取消或做出重大变更，相关产业就可能向其他地区或国家转移。重庆作为承接沿海地区加工贸易行业转型升级的第二梯队，在区位优势上不如沿海交通运输条件便利的城市，只有周边地区充裕的劳动力资源可以弥补这一缺陷。但重庆同样也存在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制约。重庆发展加工贸易需要产业链支撑，需要集群式发展，需要大企业引领。在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消失之后，政策措施的优惠就显得尤其重要。因此，在引进产业所需高端人才方面，针对人力资本的相关税收优惠，如个人所得税的减免优惠措施，就具有特殊意义。

第四，税收优惠措施的可持续性问题。目前，两江新区对于投资制造业项目的外资

有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除了对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有较大幅度优惠外，管理团队个人所得税地方部分40%返还，这一幅度也是比较大的，对稳定大企业在重庆持续发展具有吸引力。这类措施会影响到企业的长远布局，其可持续性究竟如何值得关注。

第五，重庆地处内陆，与沿海地区相比，加工贸易起步晚、规模小、发展慢。但从2005年以来，重庆加工贸易发展迅猛，这与中央政策的倾斜和中央财政资金的支持不无关系。目前，重庆集国家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政策、国务院2009年3号文件政策、内陆保税港区政策等于一体，中央政府批给重庆两路寸滩保税港区和西永综合保税港区，使之成为内陆惟一拥有两个保税区的城市 and 全国政策最优惠的地区，这是吸引外商进入的主要原因之一。除了政策扶持，中央对重庆还有直接的财政资金转移支付。公开披露的数据显示，2009年和2010年，重庆共获得中央财政直接支持超过1500亿元，2011年再获中央财政直接支持1100亿元。这些资金的落实，也为重庆推进公租房建设和户籍改革创造了条件，而这二者正是重庆加工贸易获取廉价劳动力的充分保证。从未来看，这些政策与扶持措施能否维系较长时期，并不是一个确定数。如果对这些优惠政策善加运用并继续努力争取，应该会有更好的前景。

总体上，重庆的加工贸易发展模式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带动效应。在中央政策的支持下，如果能逐步调整其发展路径，克服约束条件，发挥已有优势，其前景应较为乐观。针对上述问题，可以从政策或制度创新入手，寻求突破之策，以推动加工贸易更好更快发展。

1. 借助直辖市这一优势，努力争取中央在重庆先行试点一些政策性改革措施。当前，“营改增”扩大试点正如火如荼进行，如果能够借助这一时机争取税收领域较长时期的政策优惠，无疑可为我国中西部地区承接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企业注入新的活力。

2. 着眼于建设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重点承接地，努力完善加工贸易管理工作部门协调机制。尤其是对当地税务部门来说，应尽可能争取上级主管部门对来料加工、进料加工采取同等税收政策；在增值税征收和出口退税环节加强协调，便利税务与商务、海关、外汇等部门在加工贸易审批、备案、联网核查等方面的数据传输和信息资源共享。

3. 对一些重点扶持的内资企业，努力争取在税收政策方面给予和外资企业同等的优惠待遇。一些试验区当前对内外资企业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以及增值税减免部分，仍实施差别税率的做法，应根据实际情况尽快调整，以营造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

4. 通过向中央申请更大力度的专项财政资金支持，或加大专项转移支付力度，使财政资金更好地为重庆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服务。目前，中央对我国中西部地区承接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既有政策优惠，又有新区试点，如果重庆等地能够较好地选准加工贸易新的增长点，加大培育力度，并向中央有关部门提出政策扶助申请并获得批准，将为其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带来新的动力。

责任编辑：刘英奎

· 国际经济 ·

新时期中国企业加快“走出去” 的途径与对策建议

李罗莎

摘要： 本文对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现状、趋势和问题，以及新时期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挑战和机遇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新时期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不仅要强化“走出去”的传统途径，更要推动产业集群式“走出去”，提倡企业跟随国家FTA战略“走出去”。本文建议，要发挥央企实施加快“走出去”的主体作用，要调整“走出去”的战略，同时要构建加快“走出去”的新战略，更要对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的职能进行顶层设计。

关键词： 企业“走出去” 产业集群式“走出去” 对外投资 对外劳务输出
对外承包工程

作者简介： 李罗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商务部产业损害调查局原副局长。

一、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现状、特点与问题

（一）现状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同年，党中央在关于“十五”规划纲要《建议》中，首次把“走出去”战略与西部大开发战略、城镇化战略、人才战略一起作为国家四大战略提了出来。

2010年：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深刻阐述了“走出去”战略的重大意义，明确指出，“走出去”战略已进入向加快实施转变的新时期。

2001-2010年：正值“十五”、“十一五”期间，中国宏观经济环境总体对实施“走

出去”战略十分有利：中国成为贸易大国；对外投资快速增长；特别是中国有效应对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使宏观经济形势保持了稳中有进。

“十五”时期（2001-2005）：中国企业开始了“走出去”的实践探索。这一时期，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杰出代表——家电行业的海尔集团公司，率先向国际家电市场大举进军，成功进入美、日、欧主流品牌及名牌市场；其后是通信行业的华为和中兴两大集团公司，从发展中国家中低端通信市场起步，成功进入发达国家中高端市场；之后，在中国加入WTO整体对外开放效应的带动下，汽车、重化、装备和矿业等产业进入高速增长阶段，直接推动了中国企业“走出去”实践活动进入快速发展期。

“十一五”时期（2006-2010）：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带来了世界经济大调整，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整合和开发全球资源，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直接对外投资，在全球布局或在海外并购成为“十一五”时期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最主要途径。仅2010年，中国企业就创下“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668.1亿美元的历史最高值。

总结2001-2010年这10年，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形式特征：一是以建设长期稳定海外市场实施需求源形式“走出去”，在境外设立从事贸易、物流与分销服务型公司；二是以建立加工贸易企业的形式“走出去”，在境外新建（绿地）投资，从征地、七通一平、盖厂房、安装设备、招聘工人和管理人员，到产供销一体化的模式；三是以跨国并购品牌形式“走出去”，直接投资并购境外品牌产品的股权；四是以资源开发形式“走出去”，收购国外矿山和矿业公司股份；五是以建立研发中心形式“走出去”，在国外建立新的研发中心。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行业分布特征是：国有大企业一般分布在资源能源、基础设施、大型装备项目中；而民营中小企业一般分布在边境贸易、旅游服务、咨询服务、货代服务、餐饮服务、会展服务和传统医疗服务等领域。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资本特征是：对外投资2001-2010年（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流量）年均增速达到50%左右，2001年对外直接投资净额（流量）为7.8亿美元，2010年激增为668.1亿美元(表1)，实现了从“外汇短缺”和“资本短缺”到“外汇丰裕”和“资本丰裕”的转变。

表1 2001-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 单位：亿美元

| 年份 | 流量（亿美元） | 存量（亿美元） |
|------|---------|---------|
| 2001 | 7.8 | 272.0 |
| 2002 | 27.0 | 299.0 |
| 2003 | 28.5 | 332.0 |
| 2004 | 55.0 | 448.0 |
| 2005 | 122.6 | 572.0 |
| 2006 | 211.6 | 906.3 |

| 年份 | 流量(亿美元) | 存量(亿美元) |
|------|---------|---------|
| 2007 | 265.1 | 1179.1 |
| 2008 | 559.1 | 1839.7 |
| 2009 | 565.3 | 2457.5 |
| 2010 | 668.1 | 3172.1 |
| 2011 | 746.5 | 4247.8 |

数据来源：商务部。

(二) 特点

1. 对外直接投资持续高速增长。据商务部《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报告 2011-2012》，2001年中国境外企业只有3091家，截至2011年底，在全球177个国家（地区）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1.8万家，对外直接投资存量4247.8亿美元，其中股本投资1418.4亿美元，占33.4%；利润再投资1706.5亿美元，占40.2%；其他投资1122.9亿美元，占26.4%；年末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近2万亿美元。2011年境外企业向投资所在国缴纳的各种税金超过220亿美元，年末境外企业就业人数达122万人，其中雇用外方员工88.8万人。

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2012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出流量首次超过日本（562.6亿美元）、英国（110.2亿美元）等传统对外投资大国。2002-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增长速度为49.9%。

2011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1.69万亿美元，年末存量为21.17万亿美元，按此计算，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别占全球当年流量、存量的4.4%和2%，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名列全球国家（地区）排名的第六位，存量位居第13位。截至2011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已达3823亿美元。

中国对各主要经济体投资增长很快，2011年对欧盟直接投资75.61亿美元，同比增长26.8%；对东盟直接投资59.05亿美元，同比增长34.1%；对澳大利亚投资31.65亿美元，同比增长86%；对美国直接投资18.11亿美元，同比增长38.5%；对俄罗斯联邦直接投资7.16亿美元，同比增长26.1%，均大幅高于当年8.5%的增速。

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对外直接投资流向前10位的国家（地区）是，中国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法国、新加坡、美国、英国、卢森堡、苏丹等，占中国同期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83.2%。与此同时，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集中分布于石油（31%）、矿业（21%）、金融（18%）、交运（7%）和公用事业（4%）等（见表2）。

表2 有影响的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交易

| 时间 | 并购出资企业 | 被并购企业 | 行业 | 协议金额 |
|-------|--------|-----------|-----|---------|
| 2005年 | 联想 | IBM（PC业务） | 高科技 | 12.5亿美元 |
| 2008年 | 中国铝业 | 力拓矿业公司 | 采矿 | 195亿美元 |

| 时间 | 并购出资企业 | 被并购企业 | 行业 | 协议金额 |
|-------|--------|-------------------|-----|----------|
| 2008年 | 华能国际电力 | 新加坡Tuas Power电力公司 | 电力 | 42.35亿新元 |
| 2008年 | 中钢集团 | 澳大利亚MIDWEST公司 | 钢铁 | 13.6亿澳元 |
| 2008年 | 招商银行 | 香港永隆银行 | 银行业 | 193亿港元 |
| 2009年 | 中石油 | 哈萨克斯坦曼格什套油气公司 | 石油 | 26亿美元 |
| 2009年 | 兖州煤业 | 澳大利亚菲利克斯资源公司 | 采矿 | 33.3澳元 |

资料来源：根据网易新闻等公开资料收集整理。

2. 市场多元化布局基本完成。截至2010年，中国已与231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伙伴关系，在全球市场的覆盖率达72.7%，开拓新兴市场成效明显。欧盟、美国、东盟为我前三大贸易伙伴。2011年，对欧美日港四个传统市场进出口比重由2002年的58.2%降至45.1%；对新兴市场进出口快速增长，相比2002年，与东盟贸易比重由8.8%提高到10.0%，与金砖国家由3.9%提高到7.8%，与拉丁美洲由2.9%提高到6.6%，与非洲由2.0%提高到4.6%。

3. 对外投资行业优势逐步凸显。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几乎覆盖国民经济所有行业类别，其中传统制造业的纺织、家电、冶炼、化工、中低端电子和食品加工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优势凸显；同时海外并购从传统制造业向信息产业、商业分销、采矿资源等领域快速扩展，并向能源资源、汽车、金融和电信四大领域集中，这四大领域占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88.3%。

4. 企业国际化水平日益提高。在对外投资存量中，国有企业比例占69.2%；有限责任公司占22%；股份有限公司占5.6%；私营企业占1%；外商投资企业占0.5%。2012年《财富》发布的世界500强中，中国企业共73家榜上有名，其中国家电网、中石化和中石油已跻身前10强。上榜公司数量仅次于美国，排名世界第二。同时，52家中国企业入选2012年度全球最大225家国际承包商，其中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排名首次跻身世界前10。

5. 对外劳务合作稳步发展。2011年，对外劳务合作派出各类劳务人员45.2万人，较上年同期增加4.1万人，同比增加10%。其中对外承包工程项下外派人员24.3万人，占全部派出人员总数的53.8%，年末在外各类劳务人员81.2万人。截至2011年底，对外劳务合作累计签订合同额760亿美元，完成营业额736亿美元，年均增长率13.2%；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588万人，其中包括建筑、纺织等普通劳务人员，以及海员、空乘、工程师等高级技术劳务人员。

6. 对外承包工程迈上新台阶。2011年，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1034.2亿美元，同比增加12.2%；新签合同额1423.3亿美元，同比增加5.9%。新签合同额在5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498个（上年同期488个），合计1123.7亿美元，其中上亿美元的项目266

个，较上年同期增加5个。截至2011年底，对外承包工程累计签订合同额8416亿美元，累计完成营业额5390亿美元，其中石化、轨道交通、电力和电子通讯项目占总营业额的55%（表3）。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主要市场为伊朗、委内瑞拉、印度、沙特、利比亚、越南、苏丹、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安哥拉等国，同时新开拓的美、澳发达国家市场也取得很大进展。

表3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超过10亿美元的大项目（单位：万美元）

| 排序 | 国家 | 项目名称 | 合同额 | 承揽单位 |
|----|-------|-------------------|-------|--------------|
| 1 | 委内瑞拉 | 第纳科-阿纳科铁路项目 | 75 |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
| 2 | 伊朗 | Hormuz炼厂EPC项目 | 73.12 | 中国石化工程建设公司 |
| 3 | 印度 | 印度WCPL6*600MW燃煤电站 | 27.08 | 山东电力基本建设总公司 |
| 4 | 博茨瓦纳 | 玛玛布拉2*660MW项目 | 19.56 |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 5 | 沙特阿拉伯 | 沙特麦加轻轨项目 | 17.7 |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
| 6 | 菲律宾 | 菲律宾输电网投资建设项目 | 15.8 | 国家电网公司 |
| 7 | 沙特阿拉伯 | 沙特拉比格2*660MW电站 | 13.73 | 山东电力建设第三工程公司 |
| 8 | 越南 | 越南永新2*622MW项目二期 | 12.6 |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 9 | 印度 | 印度电信 | 11.8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
| 10 | 利比亚 | 班加西苏卢格5000套住房 | 10.5 |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

资料来源：商务部《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劳务合作和设计咨询业务统计年报》。

（三）问题

1. 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偏小。对外投资规模与现阶段中国整体经济实力及在国际经济中地位不相匹配。2010年中国GDP达到39.8万亿人民币，折合6.04万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但对外投资规模占GDP比重5%，远落后于26.1%的全球平均水平，也低于13.9%的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

2. 对外直接投资绩效指数较低。对外直接投资绩效指数由两种优势决定，所有权优势（品牌、创新力、管理与组织能力、信息、融资、资源获取以及规模和网络等方面的优势）和区位优势（母国或东道国有利于不同商品生产和服务的各种经济条件，包括相对市场规模、生产运输成本、技术支持、基础设施和供应链等方面的优势）。对外直接投资绩效指数较低反映了中国企业缺乏核心技术与自主品牌，大多数产业在国际分工格局中处于低端的现状。

3. 企业国际化程度仍很低。海外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超过30%才能说一个企业具有国际化经营能力，跨国公司全球国际化水平为40%，中国企业只有16.3%。

4. 企业只能被动适应既有国际标准。当前国际标准基本是欧美标准，中国企业只能在国际市场上被动适应既有的国际标准，大大增加了成本，压缩了利润，制约了在国际市场上的发展空间。

5. 企业缺乏全球市场经营人才。缺乏全球化经营人才，是造成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困难与日俱增的根本原因。

6. 对海外投资政治风险应对不力。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重组常遭遇巨大政治阻力，对政治风险估计不足和应对不力，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投资并购最主要的障碍。

二、新时期中国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机遇和挑战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新时期中国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面临诸多机遇和有利条件，同时也面临许多困难与挑战。世界经济受发达国家主权债务危机、国际金融市场跌宕起伏等因素的影响，复苏进程明显趋缓，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如何充分认识新时期企业“走出去”的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加强战略谋划，有效整合和利用各种资源，实现“走出去”对外投资合作的互利共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总体而言，今后10年里，国际国内挑战与机遇同在，但机遇大于挑战，中国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合作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一）挑战

1. 新时期国际挑战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世界经济脆弱复苏及不确定因素。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美国短期出口倍增计划和量化宽松，长期回归高端制造和回归创新结构调整，都在对外转嫁危机；新兴经济体增长持续下行，都增加了全球经济不确定因素。二是世界安全形势更加复杂。企业“走出去”可能面临更大的社会和政治风险，中外之间文化、利益矛盾增多，国际安全形势复杂，对外投资合作境外安全风险加剧。三是国际投资壁垒有增无减。全球投资保护主义升温，部分国家对外资项目的要求和审核日趋严格，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对外投资阻力和经营困难加大，增加了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和对外投资并购的障碍。

2. 新时期国内也面临着严峻挑战。国内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处在了一个换档期，向强国经济转型和过渡，体制和机制性障碍形成了诸多的挑战，现行对外投资合作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仍需完善；金融机构相关产品和服务尚未满足企业需求；中介服务机构相对缺乏；企业人才矛盾突出，市场研判和风险防范能力有限，社会责任意识有待提高。

（二）机遇

1. 国际机遇。

一是世界经济复苏缓慢，但经济全球化仍在发展，加强投资合作仍是国际主流。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正在加快，这为中国企业主动布局、打造全球自主生产体系创造了重大国际机遇。

二是受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双重影响，发达国家对外来资本需求意愿上升。目前发

达国家受金融危机影响，将在较长时间内处于低速增长，特别是欧洲一些国家深陷主权债务危机，财政紧缩、企业投资乏力，形成了对外来资本的增长点。这在短期、中期内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三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目前，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已成为全球需求增长的主导力量。目前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总人口近50亿，不算中国还有35亿人口，正处于经济和消费需求高速增长阶段，这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广阔发展空间。有机构预计，未来20年的全球产出将有61万亿美元的增长来自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不仅有利于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而且将为中国再保持20年快速增长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

四是全球资产价格将在一个时期内保持较低水平。资产价值处于估值洼地，西方的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势头减缓，这给中国有实力的企业跨国并购欧美发达国家计算机、软件、精密仪器等技术领先企业的股权、抢占国际市场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近期一些大型并购活动说明，中国企业正抓住难得机遇，获取美欧国家先进的制造技术、营销网络和知名品牌，这对于中国企业提高自身竞争力，拓展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国内机遇。

一是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6000美元。根据邓宁理论研究表明（表4），只要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就将进入对外投资的快速发展阶段，中国目前已具备大规模“走出去”开展对外投资的条件。

表4 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周期

| 序号 | 判断标准 | 特 征 | 可否对外投资？ |
|-----|-------------------|---------------|---------|
| 阶段1 | 人均GDP小于400美元 | 吸引外资=0；对外投资=0 | NO |
| 阶段2 | 人均GDP 400~2000美元 | 吸引外资>0；对外投资=0 | NO |
| 阶段3 | 人均GDP2000 ~4750美元 | 吸引外资>对外投资>0 | YES |
| 阶段4 | 人均GDP大于4750美元 | 对外投资>吸引外资>0 | YES |

资料来源：中国 WTO 研究会《基于产业价值链分析的贸易摩擦对策研究》课题组。

二是中国大量外汇储备为大批企业“走出去”提供了重要的资本基础。中国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规模庞大，带来了国际上要求中国货币升值和国内增发货币引发通胀的双重问题，企业大批“走出去”为外汇储备有效使用提供了途径。

三是企业“走出去”内生动力不断增强。随着国内土地、资源、人工、能耗等成本的不断上升，将会有更多技术含量低的低端制造业向其他低收入经济体转移，而国内企业和资源将向更高端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集中，这是客观规律也是发展的必经阶段。此

外，开拓市场和平衡国际收支也需要企业“走出去”，通过扩大对外投资规模，以减少外汇流入压力，减少因贸易盈余大幅增加带来的通胀、金融压力以及双边经贸摩擦。

四是中央大型国有企业（央企）重组已基本完成，企业“走出去”的实力不断增强。国内重组提高了央企的实力，为央企“走出去”跨国并购、获取国际领先核心技术、专利技术和国际知名品牌的国际重组奠定了基础。此外，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国际市场竞争的洗礼，一些中国民营企业已具备了跨国经营的能力和水平。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实力不断增强，有的在海外实施投资贸易多元化；有的从事项目承包规划、建设、服务一体化；有的进行资本运作，与跨国公司合作搞工程项目带资源开发。这些充分说明，中国企业“走出去”整体实力已经上了一个新台阶。

三、新时期中国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途径和政策建议

（一）新时期加快“走出去”的途径

1. 强化“走出去”的传统途径。中国企业“走出去”有三大传统途径，新时期要强化这些成功“走出去”的传统途径：其一，对外直接投资。通过股权并购实现全球强强联合，是新时期国际投资主流趋势。其二，对外劳务输出。新时期对外劳务输出要加入新内容，即必须进入服务贸易领域。其三，对外承包工程。新时期对外承包工程要以咨询服务为先导，要与对外投资相结合。

以上传统“走出去”途径中，新时期要特别强化对外承包工程以“工程换资源”战略思路，在扩大非洲传统市场份额的同时，关注中东、欧洲、亚洲等新兴市场。要由央企、地方企业合作共同推动与周边国家基础设施领域的互联互通。由于全球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已成为新时期拉动世界经济复苏、增长和解决就业问题的有效手段，将会成为新时期全球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旋律。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必须要抓住当前不可多得、大有作为的发展机遇，实现中国对外承包工程的跨越式发展。一是跟踪、把握世界经济对于基础设施需求的变化。以基础设施改造升级、采用新技术、新材料建设高效节能型基础设施为重点，发挥中国企业在公路、桥梁、隧道、电站、铁路、通信等领域的技术和经验优势，积极探索工程承包与投资相结合的模式，在全球范围跟踪推动大项目。二是加强与国内金融机构合作。积极探索银团贷款或银行-企业联合体共担风险、共享利益的方式；与此同时，探索把买美国债券变成对美基础设施的投资。三是加强国际基础设施项目属地化管理。80%的跨国公司都是以属地化管理方式实现其全球性经营的，中国企业也应将履行东道国社会责任贯穿于承包工程项目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以确保公司业务与东道国利益融合。

2. 产业集群式“走出去”。目前全球正进行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国际产业转移形成

了集群式发展模式，产业集群及其所形成的工业园区、产业带、经济带已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新增长极。中国依靠“引进来”为主体的开放战略，通过经济特区、技术开发区和出口加工区等模式承接了制造业的国际转移，已成功形成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三大经济带以产业内分工为基础的产业集群。实施中国企业集群式“走出去”的发展战略是新时期中国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已具备大力实施企业集群式“走出去”发展战略的良好基础和条件，而境外经贸合作区应是中国实施企业集群式“走出去”的新战略举措。中国政府应对境外经贸合作区提供更加系统的配套政策支持，制定出中国产业集群式“走出去”的国家整体规划，包括如何依托国内优势产业，选择东道国或地区，形成境外中国产业集聚的工业园区、技术开发园区和经贸合作园区，实现园区内配套齐全的产业链，以提升中国产业整体国际竞争力。

3. 跟随国家FTA战略“走出去”。“十八大”提出要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FTA）战略，企业要抓住这个机遇，跟随国家双边或区域FTA走出国门。国家FTA战略已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全球布局（近期、中期、长期）的区位战略，企业跟随国家FTA战略“走出去”是最好的途径之一。中国政府FTA战略基本包括四个圈层：第一圈层是大陆、港澳和台湾的两岸四地自贸区，或称为大中华自贸区；第二圈层是依托周边国家，推动东亚及亚洲经济一体化，即东盟-中国自贸区（10+1 FTA）、东盟-中日韩自贸区（10+3 FTA）；东盟-中日韩印澳新自贸区（10+6 FTA）；第三圈层是推动亚太地区成立自贸区；第四圈层是与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建立自贸区。目前中国的FTA战略仍只在国家层面上，企业并没有很好跟进，新时期必须要实现政府搭台企业唱戏，使大批企业以兵团方式跟进国家FTA“走出去”，创造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

（二）政策建议

1. 发挥央企加快“走出去”主体作用。2006年以来，中国海外并购74%是由央企发起的。央企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领域集中度达80%。要充分发挥央企加快“走出去”的主体作用：一是在“走出去”的产业联盟中发挥支撑作用；二是在“走出去”战略投资中发挥主导作用；三是在“走出去”产业转型中发挥引领作用。

2. 加快“走出去”战略调整。为实现新时期中国企业加快“走出去”，必须进行相应战略调整：一是从“以市场换技术、换资金”为主，向“以投资换资源、换市场”的战略进行调整；二是从以对外贸易为主，向以对外贸易和投资并重的战略进行调整；三是从对外单一基础设施合作为主，向基础设施合作与金融合作相结合的战略进行调整；四是从以对外货物贸易为主，向以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并重的战略进行调整；五是从“代工”为主，向建立全球自主生产产业链的战略进行调整；六是从“模仿”制造为主，向自主创新发展的战略进行调整；七是从低端低价竞争为主，向中高端和差异化

竞争（寻找不可替代方案）的战略进行调整；八是从“引进来”为主，向“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战略进行调整。

3. 构建加快“走出去”新战略。加快“走出去”新战略包括：一是投资保护协定战略；二是资源优先投资战略；三是外汇流量资产转换为战略性资源存量资产战略；四是工业与资本结合的工业财团战略；五是国际贸易大通道建设战略；六是区域化和全球化布局战略；七是全球化人才战略；八是跨国公司战略；九是产业航空母舰战略；第十是利用香港“走出去”战略。

4. 对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的职能进行顶层设计。

首先，在政府职能方面：一是健全法律法规体系。要尽快制定“海外投资法”、“海外投资保护协定”，健全“走出去”国家法律法规体系；二是健全政策扶持体系。通过财政政策（设立专项资金、直接补助、贷款贴息等给予资金方面的扶持）、信贷政策（商业性和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商业性信贷和优惠信贷等给予融资方面的扶持）、税收政策（在营业税、出口退税等给予税收方面的扶持）、外汇政策（在持汇、购汇及汇款放宽额度和允许境外投资利润作为投资使用给予外汇方面的扶持），扶持企业加快“走出去”；同时制定“走出去”国家政策扶持导向目录；三是健全服务促进体系。包括“走出去”信息服务促进体系，“走出去”金融服务促进体系，“走出去”风险保障促进体系，“走出去”外交斡旋和军事保驾护航体系。

其次，在行业协会职能方面：一是建立行业协调机制，各行业协会助推本行业企业“走出去”；二是推进国内标准国际化。目前，标准竞争成为继产品竞争、品牌竞争之后的层次更深、水平更高、影响更大的竞争形式。各行业协会应积极组织，克服中国标准国际化的瓶颈，推进中国标准在国外的推广实施力度，增强中国企业竞争优势；三是行业自律和规范行业内竞争秩序。针对部分中国企业在海外无序竞争，各行业协会应完善规则，规范行业准入和行业自律制度，坚决制止在海外市场自相竞争的短期行为，促成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的互利共赢。

最后，在企业职能方面：一是加强学习与创新。企业应培养全球化战略思维和国际化视野，着力培育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加快走出去步伐，着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二是加快国际化人才队伍建设。企业要加强对外投资合作人才队伍建设和外派劳务管理，为国际化经营提供人才支撑。三是做好走出去实施国际化经营整体经营规划。企业要着力提升国际化经营水平，完善组织架构，夯实基础，理顺走出去实施国际化经营的体制机制；建立健全境外经营风险评估体系、风险防范机制和境外风险应急体系；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树立中国企业负责任的形象，赢得所在国政府和民众的尊重。

（下转第 41 页）

· 产业发展 ·

对第三次工业革命几个问题的认识

王昌林

摘要：当前，以绿色、低碳、健康为主题，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由新能源、生物、纳米等领域的群体性科学技术突破引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全球范围内兴起，为我国推进经济社会跨越发展提供了“百年一遇”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了严峻挑战。要以改革创新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着力营造有利于新技术产业化和新兴企业成长壮大的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

关键词：工业革命 科技革命 产业革命

作者简介：王昌林，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最近，美国著名趋势学家杰里米·里夫金出版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引起了全球范围特别是我国有关领导和学者的极大关注。如何认识第三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究竟有没有？我国如何应对第三次工业革命？这些问题迫切需要研究。

一、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不同认识

里夫金提出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反映了世界经济科技发展的重要趋势，但也存在争议，称之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更合适。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进入深度调整转型期。为促进经济复苏，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制定新的发展战略，大力培育新兴产业，但新的增长动力究竟在何处，目前还看不清楚，大家陷入了迷茫。在此背景下，各种观点和判断层出不穷，比较典型的有：一是美国提出的“清洁能源革命”战略。2009年12月，美国颁布了《美国创新战略：促

进可持续增长和提供优良的工作机会》，明确提出要发动一场清洁能源革命，加速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和先进制造技术发展，推动空间技术研发突破和应用。二是欧盟提出并积极推动的“低碳经济”战略。近年来，欧盟积极推动建立碳交易制度，并率先通过立法，提出到2020年相比1990年减排20%的目标。三是2008年11月IBM公司提出的“智慧地球”战略，很快引起了我国乃至全球的广泛关注。目前，国内有100多个城市都在大力推进“智慧城市”建设。

此外，还有其他许多著名的报告和观点。比如，2006年美国兰德公司发布的《2020年的全球技术革命》研究报告，提出了未来16个应用最广泛的科技领域，包括太阳能电池、无线通信技术、转基因植物、水净化技术、低成本住宅、工业环保生产、混合型汽车、精确治疗药物、人造器官等。2010年3月美国发布的《美国国家宽带计划》，2009年6月欧盟发布的《欧洲物联网计划》，都认为宽带网络是21世纪重要的基础设施。2009年5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面向2030年的生物经济施政纲领》，提出人类将在2030年前后迈进生物经济时代。2012年4月美国发布的《美国生物经济蓝图》提出，由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和创新推动的经济活动，即“生物经济”，是世界经济中增长快速、比重很大的一部分，等等。

最近，美国趋势学家里夫金和英国《经济学人》编辑麦基里又提出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设想，再一次引发了我国有关各界的关注。前者认为，新能源和互联网的结合将推动形成第三次工业革命。后者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是制造业数字化，标志性产业是3D打印。

应该说，上述战略和观点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世界科技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和潮流，我们应给予高度关注。但也要看到，发达国家提出的战略是根据其自身的优劣势并结合其国情制定的，我们不能完全照搬，特别是要注意一些利益相关者断章取义，借发达国家的提法达到自己的目的。以第三次工业革命为例，里夫金提出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反映了世界可持续发展的紧迫要求，新能源和互联网的融合是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重要方向，但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如大家普遍认为，“工业革命”一词应译为“产业革命”，“第三次产业革命”应称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更为准确。因此，我们认为，对目前各种观点，应持理性的态度，既不能熟视无睹，也不能盲目跟风。应更多关注OECD、兰德公司等研究报告提出的观点，因为这些报告比较具有权威性和研究性。既要把握世界科技经济发展趋势，也要立足我国国情，制定符合实际的经济科技发展战略。实际上，为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机遇和挑战，目前我国已做出了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大部署，其范围已基本囊括上述所有方向和领域。当前的主要工作是，应切实采取措施，进一步突出重点，明确发展时序，扎实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健康发展。

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内涵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将是以绿色、低碳、健康为主题，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由新能源、生物、纳米等领域的群体性科学技术突破引发经济社会深刻变革的过程。

从历史上看，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发展一般应具备以下标志：一是要有科学技术的革命性突破为基础和先导。二是要有紧迫和现实的重大需求。三是应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包括引发生产方式、产业结构和组织等方面的变革，对人们生活方式带来革命性变化，等等。根据上述标准，我们认为，新一轮产业革命将是以绿色、低碳、健康为主题，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由新能源、生物、纳米等领域的群体性科学技术突破引发农业、工业、能源等领域深刻变革的过程。

首先，从科学技术的基础看，当今生命科学、生物技术发展正在孕育重大突破，有可能引发新的产业革命。而信息技术的发展，如集成电路发展，再取得革命性突破的难度很大。3D打印、个性化制造将进一步促进智能制造发展，但要完全取代现有大规模、标准化的制造（如飞机、汽车等制造）也是不现实的。不过，信息技术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无论是新能源还是生物产业的发展都需要信息技术作为支撑。同样，新能源革命也缺乏重大的科学技术革命作为基础和先导。

其次，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看，信息技术的发展将会继续深刻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但难以像蒸汽机、电力、个人计算机、互联网等出现那样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同样，光伏、风电等分布式能源发展将会引发能源工业的变革，但对人们生活不会像电的发明和广泛应用那样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同时，其主要产品光伏电池、风机装备，也不会像信息技术那样具有广泛的渗透性、带动性。而生物技术革命将揭示生命的本质和奥秘，将引发医疗、农业等领域的深刻变革。如果说过去几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大幅度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话，那么生物技术革命是对“生命”的变革，将引发生产力的飞跃。

第三，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看，目前提高信息化水平具有很大的需求，但不是非常紧迫的重大需求。而新能源和生物产业的发展，将为解决近200多年工业化以来日趋紧迫的资源环境等全球性问题提供新的手段，具有紧迫和强大的需求。也要看到，生物技术的发展就如原子能技术那样，在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巨大进步的同时，如果管理不善，也会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颠覆性的破坏，因此生物产业发展的市场需求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第四，从各国科研投资和风险投资的重点看，能源与环境、生物是各国的优先领域。比如，2011年11月欧盟委员会公布了《地平线2020》科研规划中，生物、清洁高效能源等领域研究经费约占总预算经费800亿欧元的40%以上。在美国科研经费中，清洁能

源、生物等领域投资约占50%以上。另外，风险投资是判断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风向标”。根据统计，目前全球风险投资的重点主要集中在软件、生物技术、互联网、清洁能源等领域，表明信息网络技术仍是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发展方向，同时生物技术、清洁能源是未来发展的重点。

三、未来产业革命的发展趋势

未来10-20年仍然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延续，主要是信息网络技术的深化应用，真正的产业革命可能在2030年前后到来。

当前，大家普遍认为，世界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孕育重大突破，但距离产业革命爆发还有一定时间。总的看，信息技术革命还没有结束，人类正处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前夜。

第一，信息技术仍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20世纪5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发展取得了一系列革命性突破，先后发生了几波大的创新浪潮，主要是集成电路的大规模商业化应用、个人电脑进入家庭和互联网的出现和广泛应用。但近年来信息技术进步的速度变慢。不过，大家普遍认为，信息技术仍具有较大发展空间，随着云计算、物联网、数字制造以及信息技术与其他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信息技术将进一步深刻改变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专家估计，信息技术的发展至少还有10年以上。正如2002年美国《时代》周刊指出的那样，“我们现在正处在信息经济时代的中期，从开始到完成，它大约将持续75-80年，到21世纪20年代晚期结束。接着人们将迎来下一个经济时代：生物经济时代”。

第二，新能源技术的大规模产业化在2020年以后。近年来，在各国政府的大力推动下，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2011年全球风电累计装机容量达到230GW，光伏太阳能累计装机超过67.4GW。专家估计，风电的成本2020年为0.4-0.8元/千瓦时，2030年为0.3-0.6元/千瓦时。2020年太阳能发电成本将低于1元/千瓦时。同时，到2020年纤维素乙醇等生物燃料、新能源汽车将进入产业化阶段。因此，2020年前后新能源技术可能进入规模化发展阶段。但专家普遍认为，今后10—15年，新能源要大规模取代化石能源、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取代现有汽车也是不现实的。国际上有关机构预测普遍认为，到2020年新能源占能源消费的比重为20%左右，到2030年将超过30%，2050年超过50%。

第三，生物技术的大规模产业化则需要更长的过程，估计在2030年后。近年来，基因测序、蛋白质组学、再生医学等生命科学和技术发展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2010年，全球生物技术药物销售额1600亿美元，占全球医药工业的比例由1996年的不足4%提高到16%。全球销售额前十位药物中，有6个是生物技术药物。1996-2011年，全球转基因农作物种植面积增长了94倍，2011年达到1.6亿公顷，占全球耕地面积的10%。同时，生

物农药、生物肥料、生物制造产业化快速发展。但是，要破解生命的奥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比想象的难度要大。总的看，生物技术产业发展还没有出现像蒸汽机、电、个人电脑、互联网等那样能够大规模应用于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标志性产品。同时，生物技术的发展将会带来生物安全、伦理等一系列问题，给人类自身发展带来重大挑战。因此，生物技术的大规模产业化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正如OECD《面向2030年的生物经济》报告指出的那样，人类可能在2030年后进入生物经济时代。

四、我国面临“百年一遇”的机遇

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爆发一次。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处在孕育和突破阶段，各国基本都处在同一起跑线上，这为我国后来居上、实现跨越发展提供了“百年一遇”的机遇。一是有利于推进我国农业现代化。在人均耕地、淡水等自然资源数量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条件下，我国农业受到的自然资源制约日益凸显。同时，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兽药等投入品，导致农业面源污染严重。要打破日益严峻的资源约束，实现农业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根本出路在于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当前，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兴起，特别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发展，为我国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比如，生物育种技术的发展，将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产量和质量，有利于保障我国食品安全。生物农药、生物肥料等绿色农用生物产品的发展，有利于我国解决日趋严重的农业面源污染问题。二是有利于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新一轮产业革命催生的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生物、新材料等产业，兼具知识经济和循环经济特征，主要利用可再生资源为原料。积极推动新一轮产业革命对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具有重大作用。比如，云计算、物联网、3D打印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深入应用，有利于促进我国制造业“智能化”，进一步提高国民经济信息化水平，为我国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道路提供了更为有力的技术支撑。风电、光伏、生物质能源发展有利于减少我国对石油、煤炭等不可再生能源的依赖和环境污染。生物基材料发展，不仅可减少化石资源的依赖，而且可以减少因高分子材料不可降解而造成的白色污染。三是有利于保障和提高我国人民的健康水平。人口与健康问题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今后一段时期，随着我国人口增长达到峰值和快速进入老龄社会，这方面的问题将会越来越突出。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发展特别是生物科技的突破和产业化发展，将为人类社会提供新的治疗方法、新的药物，推动医疗、医药工业的变革，使人们生活得更长久、更健康，也为我国抓住机遇，加快医疗、医药产业发展提供了机遇。

同时，也要看到，新一轮产业革命的迅速发展有可能使我国低成本制造优势弱化，

改变现行国际分工格局，使我国在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综合判断，在新能源领域我国面临的机遇较大，而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等领域面临的挑战大于机遇。

首先，从新能源看，近年来我国风电、太阳能等产业快速发展。2010年我国风电新增装机容量1890万千瓦，居世界第一位。多晶硅实际产量达45000吨，自给率提高到50%。太阳能电池产量达8.7GW，占世界总产量的50%，新增光伏装机500MW，累计装机达到800MW。同时，涌现出金风科技、常州天合等一批高速成长的龙头企业。虽然当前光伏、风电产业存在比较严重的产能阶段性过剩问题，在部分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与世界先进水平还存在较大差距。但从长期看，能源转型是必然的趋势，通过激烈的市场竞争，我国完全有可能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跨国经营大企业。

其次，从新一代信息技术看，随着云计算、物联网、移动物联网等新技术、新商业模式发展以及集成电路、显示技术等产业的换代演进，给我国信息产业提升核心竞争力带来一定机会，特别是在互联网应用等信息技术服务领域面临较大的机遇。但总体上看，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存在的差距较大，且面临跨国公司知识产权壁垒和技术封锁，要在操作系统、大规模集成电路等核心基础领域打破现有垄断格局，从根本上改变信息产业“缺芯少肺”的局面，实现突破性发展的难度很大。

第三，从生物产业看，我国生物资源、生物科技人力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生物产品国内市场需求潜力巨大，具备发展生物产业的诸多优势。但也要看到，生物产品管制性强，生物产业发展高度依赖创新，目前我国生物产业管理体制、投融资体制、科技创新体制等还不适应生物产业快速发展的要求。虽然近年来我国生物科技论文、发明数量大幅上升，生命科学研究的差距缩短了，但在产业化发展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迅速拉大。总的看，我国生物产业面临重大历史机遇，但必须解决一系列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包括完善生物产品监管体制、流通体制、科技创新体制等。

五、以改革创新迎接新一轮产业革命

历史经验表明，重大技术的发明和突破是很难预测的，也存在很大的风险，关键是要营造有利于新技术发明与产业化和新兴企业成长壮大的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实际上，只要具备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新的技术、新的企业就会不断涌现出来，我国深圳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上世纪80年代，国家给予深圳“先行先试”的体制和政策，吸引了内地成千上万的创业者，经过近30多年的发展，涌现出华为、中兴、比亚迪、腾讯、迈瑞等一大批创新型企业。

另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也说明这一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

全球信息技术产业快速发展，这一时期正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时期。面对当时世界新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迅猛发展浪潮，党中央、国务院及时作出了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重大战略部署，有力地促进了我国信息产业的发展。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电子信息产品的重要生产制造基地，产值规模跃居世界第二。同时，在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竞争中，涌现出华为、中兴等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企业，在部分技术领域取得重要突破。实践充分证明，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完全可以在世界新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中占有一席之地。

总体上看，当前我国具备抓住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机遇的诸多有利条件，比如，对新能源、节能环保、生物、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拥有紧迫和巨大的需求；我国科技人力资源丰富，积累了比较雄厚的财力，资金供给充裕，等等。但从发展科技生产力的要求看，也存在一些体制机制和政策制约因素，主要表现在，科技与经济脱节，天使投资、创业投资等不发达，科技创新管理体制不完善，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没有真正确立，等等。这些问题造成我国许多新兴产业起步时与发达国家差距不大，但到了产业化阶段后差距迅速拉大。为此，迎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必须以改革创新为动力，着力营造有利于新技术发明、产业化和新兴企业成长壮大的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

一是大力推进节能环保、新能源、生物等重点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攻坚。当前，资源要素价格扭曲，新药审批周期长，风电、光伏发电并网难等问题，严重制约我国节能环保、生物医药、新能源等产业发展，必须大力推进相关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应大力推进资源要素价格改革，大幅度提高能效的市场准入和行业准入门槛，完善排污收费征收和使用办法，建立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加快建设适应风电、光伏太阳能发展的电网及运行体系建设，制定对电网公司实施可再生能源电量配额制的政策，切实解决风电、光伏太阳能发电的并网问题。加快完善药品注册管理、价格管理、集中招标采购等体制机制，切实改变目前新药审批周期过长、创新药物定价不合理、新药难以进入医保目录等问题。要完善生物安全评价与监督管理机制，制定有利于生物育种发展的农业基因知识产权、专利注册、市场推广和服务体系建设等政策措施。建立下一代信息网络组织领导协调机制，深化三网融合体制机制改革，完善政府公共信息资源开发激励机制，促进行业应用服务的外部化，建立普遍服务制度，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

二是建立科技创新有效支撑新能源、生物、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要强化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让企业成为技术需求选择、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应用的主体。支持企业建设技术研发机构，牵头实施产业目标明确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大力推进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加强统筹协调和科技资源整合，切实改变目前

科技投入“撒胡椒面”的问题。应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技术转移的经验，建立重大科技专项、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技术转移和产业化情况发布制度，发展各类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加强技术工程化平台、产业化示范基地和中间试验基地建设，鼓励和支持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通过技术许可等方式转化和推广科技成果，切实改变目前科技与经济脱节的状况。要面向新一轮产业革命方向，加强基础研究。瞄准生命科学、新能源、信息等领域发展前沿与趋势，在新兴前沿交叉领域和具有我国特色与优势的领域，依托国家科研院所和研究型大学，建立对基础研究和战略高技术研究的稳定投入机制，加大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力度，建设若干队伍强、水平高、学科综合交叉的国家实验室和科学研究实验基地，努力冲击世界难题，力争取得系列突破。

三是推进教育体制和人才机制改革创新。从几次产业革命的变迁历程看，英国能够抓住蒸汽机革命的机遇成为全球第一工业强国，与其历史悠久的学徒教育、最早建立职业教育体系、及时更新基础教育学科、强调教育实用性等先进的教育理念和体制密切相关。美国能够成为电力革命、信息技术革命的引领者，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完备严密的职业教育法律保障体系、注重校企合作和工学结合以及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等。为建立完善适应第三次工业革命发展的教育体制和人才培养环境，首先要改变传统应试教育体制下重视分数、忽视能力的观念和做法，强化以知识为本、弱化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和人才培养方式。要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从义务教育抓起，立足于学生的接受能力和需求，以启发式、讨论式、互动式的灵活教育方式为主。促进教学内容从知识结构单一、脱离现实、内容陈旧、以专业为主向多学科交叉、实用性强、科学人文结合为主转变。力争教育考核方式从考察记忆力、认知力向考察求知欲、创造性、创新性、理解力和分析力转变。要在学科设置上进一步对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发展趋势和需求。鼓励高等教育机构加快发展信息、生物、新能源等专业，支持有条件的高等院校有重点、有选择地开设新学科、新专业，加大上述领域教育投入和师资力量培养。进一步下放专业设置权，简化高校新增专业审批流程。促进新设学科专业充分面向就业市场和产业发展需求，建立健全紧缺人才和专业的统计、公示和更新机制。要更加重视培养实用型人才，加快发展职业教育和终身教育。促进高等院校人才培养密切对接企业发展需求，鼓励高校在企业设立实训基地，支持企业人力资源部门定期与在校师生开展交流宣讲。加快提升职业教育质量，加大对就业率高、品牌口碑好的职业教育机构支持力度，鼓励发展在职培训和成人继续教育。要完善人才的评价使用机制。建立有利于创造型、创新型人才脱颖而出的人才选拔机制。强化新兴领域的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加快形成支持创新创业的社会氛围和宽容失败的评价体系。放宽移民和户籍管理条件，加大对复合型、领军型人才的引进力度。

责任编辑：刘英奎

· 产业发展 ·

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约束机制建设研究

程凤朝 胡 丹 王张葳

摘要：2013年《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正式实施。资本监管新规强化了资本监管要求，推动商业银行建立资本节约型的业务增长方式。伴随着资本监管理念和风险计量技术的演进，国际领先银行逐步发展和应用了以经济资本为核心的资本管理体系，国内银行经济资本管理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但相比国际领先银行在理念、组织架构、计量技术和工具应用方面仍存在一些有待改进的方面。为适应资本监管新规的要求，国内银行应加强资本约束理念传导，充分发挥董事会的关键作用，制定实施中长期资本规划，并进一步强化经济资本配置与考核。

关键词：商业银行 资本约束机制 经济资本管理

作者简介：程凤朝，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权董事；
胡 丹，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负债部资本管理处副处长；
王张葳，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银行一部经理。

经国务院批准，中国银监会颁发了《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于2013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其核心在于强化资本约束，要求商业银行从过去规模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提高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始终保持稳健经营。对于我国商业银行来说，如何适应这些要求，特别是如何使资本约束落地生根，成为今后发展的硬要求，是摆在各家银行面前必须回答和采取行动的迫切课题。为此，本文从资本约束的含义出发，简要介绍发达国家商业银行资本约束状况，深入分析我国商业银行实施资本约束面临的挑战和应对措施。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在全球金融监管日趋严格的国际背景之下，中国银监会坚持国际标准与中国国情相

结合、巴塞尔II和巴塞尔III统筹推进、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有机统一的总体思路，制定颁发了《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下称《办法》），《办法》全面引入巴塞尔III的资本监管要求，整合2004年《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及13个新资本协议实施监管指引，形成的一份系统、完整的资本监管档。核心内容包括但不限于：（1）建立统一配套的资本充足率监管体系。明确最低资本要求，即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分别不低于5%、6%和8%；储备资本要求和逆周期资本要求，分别为2.5%和0-2.5%；国内系统性重要银行资本要求再增加1%；监管当局可根据风险判断，针对部分资产组合提出特定资本要求，或根据监督检查结果，针对单家银行提出特定资本要求。以此计算，大型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至少为8.5%、9.5%和11.5%，中小银行则分别为7.5%、8.5%和10.5%。（2）严格明确资本定义。明确了各类资本工具的合格标准和资本调整项目，特别是强化了对各类资本工具的损失吸收能力的要求；对国内银行已发行的不合格资本工具给予10年过渡期；同时适度放松了现行规则中比巴塞尔III严格的资本扣除规定。（3）扩大资本覆盖风险范围。将操作风险纳入资本监管框架；所有银行都应计提市场风险资本要求；明确了银行账户和交易账户中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的资本计量方法；严格资产证券化、场外衍生品等复杂交易业务的资本监管规则，引导商业银行审慎开展金融创新。（4）重新设计各类资产风险权重。境外主权和银行债权的风险权重，以债务人的外部主权评级为基础；取消对境外和国内公共企业的优惠风险权重；区分不同性质的工商企业股权给予不同的风险权重；小幅上调国内银行债权的风险权重；下调小微企业债券和个人贷款的风险权重，加强对国内中小企业和消费者的金融支持。（5）科学分类，差异监管。根据资本充足率水平将商业银行分为四类，明确了对各类银行的相应监管措施，提升资本约束的有效性。（6）安排资本充足率达标过渡期。《办法》将于2013年1月1日开始实施，最后达标期限延长至2018年年底，与巴塞尔III保持一致；过渡期内允许商业银行分年度资本充足率达标，并针对不合格资本工具的退出、少数股东资本计入规则变化等规定了单独的过渡期政策。

《办法》强化了资本管理的有效性、全面性、准确性和均衡性，其实施必将对我国商业银行的业务经营产生深远影响和挑战。提高资本监管标准、严格资本定义和扩大资本风险覆盖范围，将使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商业银行的业务发展受到严格的资本约束；商业银行持有的资本应该能够全面覆盖风险所引致的损失；在资本日益稀缺、监管达标难度提高的情况下，推动商业银行加快从规模扩张型向资本节约型转变，努力降低资本占用水平，提高资本运用效率。所有这些，都是摆在我国金融理论界和实务界必须深入研究的紧迫任务，作本文对此加以论述和探讨。

二、国际领先银行的资本约束机制

在西方银行业，随着行业保护的放松和竞争的加剧，商业银行面临的经营风险加大，对资本进行有效管理、实现股东资本回报最大化，日渐成为银行的核心目标。与此同时，1988年巴塞尔资本协议的问世和推行，显示出银行资本监管理念和资本监管方法的进步，体现了国际银行业在资本与风险管理之间建立更紧密联系的努力。尤其是巴塞尔II对风险资本计量方法的革新，将银行的资本管理和资本约束推进到新的阶段。巴塞尔II暗含了数量和质量两个维度的资本约束：数量约束要求银行的业务扩张要与资本总量和结构保持协调，银行有多大的资本就承担多大的风险，风险资本不能超过银行实际持有的资本数，数量约束构成了银行风险资产扩张的边界；质量约束的目标是实现银行股东价值最大化，要求银行平衡风险与收益，以价值为基础追求经风险调整后的盈利，提高资本的营运效率和回报水平。

伴随着资本监管理念和风险计量技术的演进，西方商业银行逐步发展和应用了以经济资本管理为核心的资本管理和资本约束体系。围绕经济资本这个核心工具，通过经济资本的计量、有效的资本配置和基于经济资本的绩效考核三大基础功能来涵盖银行经营管理各个过程，平衡银行的风险与收益，体现资本的数量约束与质量约束，并最终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

（一）国际领先银行经济资本管理的行业实践

经济资本管理的主要内容包括经济资本计量、经济资本配置及经济资本应用三部分。其中，经济资本的计量是从数量约束方面对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提出要求，而资本配置和应用则是从质量约束方面对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提出要求。

1. 经济资本计量。经济资本为银行提供了一个通用的计量单位能够用来计量和监控不同风险类型以及不同业务条线的风险。领先银行经济资本模型所覆盖的风险类别主要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集中度风险作为信用风险的一个方面也比较普遍。其他可能被覆盖的风险包括银行账户利率风险、战略风险、交易对手信用风险和模型风险等。经济资本的计量既要在银行整体层面进行，以判断银行是否具有足够的资本以抵御风险造成的非预期损失，并作为进行下一步风险资本分配的限额；同时也要由下至上在各分支机构或业务单元展开，指导风险业务的合理开展，作为经济资本配置与绩效衡量的依据。

2. 经济资本配置。这是将银行经济资本需求按照预先设定的配置维度，向各配置维度的资产组合分配经济资本需求的过程。用于分配的经济资本需求总量是结合银行的业务计划和财务计划预算得出的，包括存量和增量业务的经济资本需求。同时，该经济

资本需求总量需控制在银行内部可用资本的范围内。经济资本配置的目的是将有限的资本合理的配置到各资产组合中去，提高资本的利用效率，并最终实现银行的价值最大化。领先银行的经济资本配置方法包括静态和动态两种方式。在静态的资本配置方法，主要包括比例分配法和增量资本配置方法；动态资本分配方法则是建立在经济资本回报（RAROC）指针基础上的资本配置方法。

——比例分配法。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经济资本分配方法。银行资产被划分为具备相似业务特征和风险特征的各资产组合，并分风险计算、加总各资产组合所需的整体经济资本。由于风险分散效应的存在，这种方式下计算所得的各资产组合的经济资本需求往往超出实际经济资本需求。

——增量资本（边际资本）配置法。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资本配置方法，在完成整体经济资本的计量和加总后，以边际资本为参数，建立资本配置规则，将总的经济资本分配至各资产组合。即按照所有业务计算的资本金减去对该银行减少一个业务后所需要的资本金作为增量资本。

——动态的经济资本配置方法。即在一系列约束条件下实现资本效率最优化的过程，其最终目标是在风险和收益框架下得到风险收益的最佳平衡，最终达到银行的最佳业绩。通常运用RAROC和EVA指标针对资本配置情况进行优化和调整，以实现最优的资本使用效率。

3. 经济资本应用。从历史经验来看，经济资本在领先银行管理上的应用经历了一个渐进的成熟过程。最先应用的是业务单元层面的组合评估和价格利润分析；其后扩大到整个银行层面的绩效考核并逐渐延伸至资本预算/计划和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等方面。业务单元层面的经济资本的有效应用取决于业务单元所分配或占用的经济资本与其决策流程的相关程度。通常，银行经济资本框架在业务单元层面应用的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各业务条线如何对待所面临的经济资本约束和它所提供的激励，具体应用领域包括信贷组合管理、风险定价和客户盈利分析等。而在企业范围或集团层面的应用主要是以RAROC和EVA为核心的绩效考核和资本预算，追求风险调整后的收益最大化。

（二）国际领先银行经济资本管理的主要流程

1. 用自上而下的方式计量银行总体经济资本，通过将其与银行账面资本的比较来评价银行总体的风险承受能力。

2. 用自下而上对各经营机构(分支行或部门或产品线)的风险水平进行量化，分别在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银行主要风险类型计量的基础上确定经济资本，这种方式与自上而下的经济资本计量方法形成一种补充与比较。

3. 以价值管理为基础，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目标，合理确定资本预期目标，通过

RAROC等技术指标,进行经济资本的配置,引导银行各经营机构自觉地向风险低、收益高的行业和产品去发展,这是银行主动运用经济资本进行指导战略和业务决策的体现。

4.以RAROC和经济增加值(EVA)等价值管理目标作为考核各行经营状况的主要指标,对各经营机构(分支行或部门)以及各项业务实施绩效考评。

5.根据经济资本管理指标考核结果,对上一阶段的经济资本管理效果进行总体评价,同时结合商业银行发展战略及目标对下一阶段经济资本管理中的计量、配置、考核等环节进行调整。

(三) 国际领先银行经济资本管理的启示

根据国际领先银行的经验,经济资本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管理理念、组织架构、管理制度、技术方法等要素的相互配合,产生合力,才能达到最佳效果。

1.要强调资本约束意识与风险管理文化。国际领先银行十分重视经济资本管理理念与风险管理文化的培育,强调把资本、风险、价值管理理念贯穿于银行的整个业务流程的每一个环节,形成每一个业务部门,甚至每个员工自觉遵守的意识和自觉进行的固定行为。

2.要有组织架构的支持。国际领先银行的资本管理架构大致可分为战略、执行、操作三个层次。董事会、总行高管层与风险管理委员会等属于战略层次,主要负责制定资本管理计划,设计修正银行资本与风险管理政策和程序,颁布风险管理准则,规划部门风险限额等;总行的职能部门、各业务主线主管等都属于执行层次,执行层保证经济资本与风险管理战略和政策的贯彻;各业务、各部门的一线员工属于资本与风险管理的操作层面,由于风险存在于业务的每个环节,所以在操作层面上,每个岗位都有明确的业务权限和制约机制,将资本与风险管理落实到人。

3.要有先进的技术手段。资本的管理某种程度上就是风险的管理,有效的资本管理要有强大的风险度量管理技术手段为支撑。在经济资本计量与风险管理上,国际领先银行主要采用内部评级法、内部风险模型、敏感性分析、风险限额、VaR模型系统、压力测试限额管理、多情景分析方法等高级度量技术,准确度量各种风险与经济资本配置标准,使风险限额、经济资本、产品定价、绩效考核等各种管理手段与风险更加匹配。

4.要有可靠的管理信息系统。信息是经济资本管理决策的依据。在经济资本管理过程中,风险的识别、分析、经济资本的计量和监测是一项复杂、技术性强、工作量大的工作,涉及多种计量方式和模型,加工和处理的业务数据量十分庞大,没有管理信息系统做支撑,计量、监测工作根本无法完成。国际领先银行大都对管理信息系统投入巨大,使得信息能够真实、准确、及时的反映到各管理决策、执行部门,为管理决策提供科学可靠的依据。

三、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约束机制建设现状

与资本监管的发展趋势相适应，我国商业银行内部的资本约束机制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地发展、完善的过程。在2004年《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颁布以前，严格来讲，我国商业银行实际上并没有建立真正意义上的资本约束机制。《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要求商业银行实现资本水平与风险水平的匹配，自此国内银行开始走上资本约束下追求资本回报的道路。

（一）商业银行在资本约束机制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为完善资本约束机制，使风险计量更加准确，国内商业银行参照国际领先银行做法，开始引入经济资本管理。迄今为止，国内绝大部分商业银行都已经实施了经济资本管理制度和以经济增加值为核心指标的综合绩效考核激励制度。以工行、农行、中行、建行等为代表的国有商业银行在经济资本管理体系建设方面均有很大进展，尤其是在各行股改上市后，资本约束理念不断增强，公司治理结构进一步改善，商业银行在资本约束机制建设方面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

1. 资本约束的理念传导日益深入。一是在股改以后，商业银行建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的公司治理架构，明确了各自的资本管理职能，初步构建了资本管理决策、执行、报告路线。二是制定出台了《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经济资本管理办法》、《经济资本计量方案》、《经济资本配置政策》等规章，构建了比较完备的资本约束制度体系。三是完善了经济资本预算管理，建立了以价值创造为核心、以资本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资本配置机制，进一步加大经济资本回报率、经济增加值等指标的考核力度以及与资源配置的挂钩力度。尤其是自2010年以来，在资本压力显著增大的背景下，各家银行加大了资本约束理念的传导灌输力度，经济资本激励与约束的要求日益显著的体现在各项管理与决策中。

2. 经济资本管理的基础能力显著提升。一是资本计量方法逐步完善。随着新资本协议试点实施工作的推进，工、农、中、建等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经济资本计量方式均已由监管系数法推进到内部评级公式法与监管系数法相结合。其中，在信用风险计量上，四行均已上线内部评级初级法；对市场风险的计量，工、中、建三行已完成内部模型法的开发。二是计量的覆盖范围更为全面。经济资本的计量口径已从境内分支机构扩展到境外，覆盖的风险从信用风险扩展到包括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三是经济资本配置的应用更加深入。经济资本的配置对象从仅限于一级分行到扩展到各一级分行与总行主要的风险承担部门。四是信息平台建设有了很大进展。目前四大行均已建成上线了一体化的资本管理信息系统，可实现逐月计算各级机构经济资本占用情况，满足了经济资本管理

时效性的要求，提升了经济资本管理精细化的水平。

3. 资本配置和考核突出价值导向。一是优化了配置机制。大部分上市银行均已实行全面的经济资本预算管理，加强经济资本总量约束和限额控制。在经济资本限额配置上，已逐步建立了以经济资本回报率为核心和导向的配置机制，由过去的资产粗放式增长向主动性、前瞻性的资产结构优化配置转变，在控制风险资产增长的同时，提高各项业务和全行整体的资本回报水平。二是构建了以经济增加值、经济资本回报率指标为核心，涵盖效益、风险、发展的综合绩效考核体系，经济资本类指标占有一定权重。考核结果与绩效工资、费用和固定资产分配等财务资源实现挂钩，并且挂钩力度不断加大，激励和引导各分支机构树立价值创造和资本约束的理念。

（二）国有商业银行在完善资本约束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

由于受风险管理、数据管理等能力的限制，现阶段国有商业银行在完善资本约束机制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相比完整成熟的经济资本管理体系，不足主要表现在：

1. 经济资本配置与信贷规模配置的衔接程度有待提高。作为商业银行的有效管理手段，经济资本配置与信贷规模配置应相辅相成，而且从风险和效益管理角度出发，经济资本配置管理应逐步发挥主导核心作用。但从目前情况看，信贷规模管理因简单直接，往往成为首要的管理手段，相对而言经济资本管理还更多地侧重在事后监测、通报和考核方面，资本约束和业务引导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各级分支行难以真正做到根据经济资本确定业务增长计划，资本限额管理无法事先约束和有效抑制风险资产的扩张。

2. 经济资本计量的精细化程度有待提高。经济资本管理的主要内容是通过计量、配置、监测、评价和考核各分支机构、部门、产品、客户等维度的经济资本、经济资本回报率和经济增加值等指标，统筹平衡风险与回报，统一协调业务的总量、结构、速度、风险和效益，优化全行资源配置，以实现银行价值最大化。可以说，银行价值最大化是经济资本管理的目标，经济资本管理是价值管理的工具，二者相互支撑。但是目前，商业银行在经济资本管理的精细化方面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在资本计量方面，对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经济资本计量还主要运用监管标准法，与内部风险管理实际的结合不够紧密，风险敏感性不够高。对信用风险经济资本的计量也仅在法人贷款部分应用了内部评级法初级法，尚未考虑资产违约损失率、风险暴露等风险要素，计量的科学性、准确性和精细化程度不够，难以满足经济资本精细化管理的需要，这也限制了经济资本管理作为价值管理工具的深度开发和应用。

3. 经济资本配置和考核还局限于机构层面，尚未推进到条线、产品、客户及客户经理。一是目前各家银行经济资本配置和考核基本都停留在一级分行和总行经营性部门层面。受收入归集、成本分摊等限制，分条线、产品、客户和客户经理价值创造水平的

计量结果尚无法取得或不够准确，无法通过考核评价不同条线、产品或客户的价值贡献度，也就无法发掘价值创造的驱动因素，实现经济资本的精细化配置，满足全面、动态、前瞻性的资产组合管理和客户结构调整的需要。二是由于条线、网点及客户经理经济资本考核维度的缺失，在衡量这部分经营主体绩效时，仍主要采用指标完成率的考核打分方式，使经济资本管理没有在日常的业务拓展和经营管理中真正发挥作用，前中后台部门对于经济资本管理的感受不一致，部门协同联动的效应难以充分发挥，不利于全行形成价值合力。

四、强化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约束机制建设的几点建议

（一）提升认识，加强资本约束理念的传导

目前，谈起资本约束，大家的认识较多的还停留在外部约束层面，认为是在外部强制监管要求下的受迫行为，或者仅仅是为了满足资本充足率等指标而简单的限制总体规模的举措。但前文已经介绍，现代商业银行资本约束机制的内涵已经远远的超出简单的约束和限制。通过对经济资本等管理工具的运用，资本约束的要求可以渗透到战略管理、风险管理、流程管理、考核评价等银行经营管理的每一个环节。可以说，资本约束的有力传导将促使商业银行全面提升管理水平和发展质量，真正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因此，要建立现代商业银行资本约束机制，首先要在理念上提升对资本管理的理解和认识，并加强倡导，使“资本管理无死角”的观念日渐深入人心，要让每个人都认识到，资本约束不仅是为监管达标而被动采取的数量约束，更是银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资本不仅仅是股东、高管层、资本管理或风险管理部门应该关注的事，而应该将银行所有的经营行为都置于资本的要求之下。

（二）发挥董事会在资本管理中的关键性主体作用

董事是资本的受托人和看护人，因此资本管理是董事会最重要的职责之一，董事应该高度重视相关工作。新近颁布的《办法》明确要求，董事会应承担银行资本管理的首要责任。在当前，要抓好资本管理和资本约束的落实，商业银行的董事可以重点通过以下三项工作来着手：一是抓中长期资本规划。中长期资本规划设定了银行在规划期内资本管理的具体目标，是落实资本约束的重要保障。目前，各国有商业银行均已制定或制定过资本规划，但总体比较粗放，可操作性不强，没有明显发挥对资本管理的引领作用，与经营计划等的衔接也不够充分，在规划期结束后，对于规划的执行情况缺乏评估。二是抓内部评级体系的评估工作。从外部监管要求上，《办法》要求董事会承担内部评级体系管理的最终责任；从内部经济资本管理体系建设来说，经济资本的计量、配

置、考核三大项，计量是基础，而内部评级体系的建设直接关系到资本计量的数据质量，考虑到各大国有商业银行在近期均在开展新资本协议实施试点工作，董事们应该将内部评级体系建设评估作为近期的重点工作。三是抓经济资本考核。通过对EVA、RAROC等经济资本相关指标的考核，优化资源配置，引导经营管理人员的行为与银行整体、最终的盈利目标高度统一，最终提高资本运用效率，实现银行价值最大化。

（三）制定合理有效的中长期资本规划

资本规划是银行在中长期开展资本管理工作的纲领性档，是规划期内经营活动、对外投资和资本补充的重要依据。资本规划应提出规划期内的资本充足率管理目标，一般来说应该包括以下要素：（1）资本充足率水平。围绕银自身行发展战略，兼顾监管达标、风险覆盖、价值创造和同业可比的平衡关系，分年度设定资本充足率目标，制定达标规划。（2）资本补充机制。建立多元化的资本动态补充机制，既要立足提高盈利水平，增强内部积累能力，也要把握市场机遇，补充外源性资本，完善资本结构。（3）资本结构。综合考虑监管要求、市场环境和银行市值，提出在规划期内的目标资本结构并保持相对稳定。（4）股权结构。保持股权结构的基本稳定，维护国有股权的控股地位，维护全体股东利益。（5）资本运营效率。运用资本杠杆，优化资产结构，控制加权风险资产增长，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和资本回报水平。基于资本规划还可以制定年度资本预算，明确年度资本规模、资产结构以及资本充足率要求，确保年度预算与资本规划相衔接，促进资本规划的实施。

（四）加强经济资本优化配置，增强资本约束的主动性

资本的配置要做到在总量约束前提下的优化配置，也就是以一定的经济资本支撑尽量大的业务规模。建议：一要进一步加强对经济资本配置与信贷规模配置的有效衔接，以资本为起点和核心，制定业务经营计划、结构调整计划和财务计划，突出经济资本的刚性约束作用；同时完善经济资本评价体系，利用考核评价加大经济杠杆，引导分支机构自觉强化资本约束，提升价值回报水平。二要继续在机构层面完善效益优先的配置机制，重点向价值创造能力强、贡献度高、金融资源丰富的分行或分支机构倾斜，进一步增强其贡献度，提高资本占用与资本回报的匹配性，推动业务发展方式向资本节约型转变。三要研究经济资本在业务（产品）、客户层面的优化配置，充分衔接管理会计、FTP和经济资本计量方案，在资本总量约束下对全行的各项业务、各类客户进行风险评价和价值评估，探索“最优经济资本回报+最大经济增加值”的实现路径，持续优化业务、客户组合，为资产组合管理提供科学工具和手段。

（五）强化经济资本考核，进一步发挥对各级经营主体的考核引导作用

为进一步发挥经济资本考核的指挥棒作用，引导各级经营主体建立健全资本约束和回报的经营理念，建议：一要进一步完善综合绩效考核办法，加大以经济资本回报率和经济增加值为核心的价值创造关键指标的考核权重，体现经济资本管理的重要性，从力度上保证经济资本管理到位。二要根据管理会计体系建设进展情况，对经济资本管理中涉及的部门、营销人员设置相应的考核要求，引导他们在日常工作中加以落实。如对前台部门应重点考核其经济增加值的贡献；对客户经理也应突出经济增加值的考核，对发放的每笔贷款考核其经济资本回报率，促进贷款效益达到回报要求。通过考核机制来突出经济资本的制约要求，调整各级行、各部门、各相关人员的关注点，促进全员更加注重经济资本管理，确保资本约束和回报理念在具体经营活动中真正生根落地。

参考文献：

1. 克里斯·马腾，2004，《银行资本管理》，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 中国银监会《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课题组，2012，《商业银行资本监管的新框架》，《中国金融》第13期。
3. 葛兆强，2006，《资本约束、风险管理与商业银行成长》，《金融论坛》第2期。
4. 陈小宪，2011，《资本约束下商业银行的发展之道》，《银行家》第10期。
5. 邓凯成，2008，《资本约束下的银行经济资本管理与经营转型》，中央财经大学博士论文。
6. 中国建设银行课题组，2006，《商业银行经济资本与经济增加值指标管理机制研究》，《银行与投资》第11期。
7. 武剑，2004，《论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的配置与管理》，《新金融》第12期。
8. 武剑，2008，《经济资本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现代金融》第6期。
9. 皮志云，2011，《商业银行建立经济资本管理体系的实践研究》，《金融会计》第9期。
10. 于君、高建华，2011，《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管理研究进展：国外文献综述及启示》，《生产力研究》第11期。

责任编辑：晨乔

（上接第96页）

需求，则只能坐以待毙，至少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坐以待毙；还有基础电信运营商、金融机构……等等。对于政府来说，推动目前IT产业变革背后的技术创新为改善其社会管理与服务能力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工具。虽然我们都清楚，技术永远不是此类问题的关键，此类问题的关键是改革的决心与勇气。

消费者将永远是IT产业变革的受益者。想想发生于1994年的互联网商业化，距今不过是短短19年的时间！我们有理由相信，再过19年我们回头看，会发现就像我们今天看待当初拨号上网时代一样，觉得今天是那样的原始和粗陋。互联网时代美好的未来在明天，永远的明天。

责任编辑：李蕊

· 产业发展 ·

浅论当前的IT产业变革

吴波

摘要：从当前IT产业正在发生的深刻变革可以看出，企业必须时刻保持危机意识，以洞察技术进步或服务模式转变可能对自身生存带来的挑战与威胁；必须时刻保持创新意识，以顺应产业变革可能带来的调整甚至转型的要求；必须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因为技术的进步或产业变革的触发可能来自世界任何一个角落。IT产业变革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其本身，对其他行业的发展，乃至公众的行为模式都将产生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IT产业 变革 影响

作者简介：吴波，首都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博士。

当前，IT产业正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社会化新媒体等新概念引领下发生着深刻的变革。这场变革不仅将使IT产业的生态和力量对比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而且也将对其他行业的发展以及公众行为模式产生深远的影响。

难以对IT产业所有角落正在发生的变化进行细述，本文谨就笔者观察，通过若干具体案例，说明IT产业正在或将要发生的重要变革，阐述行业内企业为了自身的健康生存与发展，必须时刻保持危机意识和创新意识的重要性。同时，就IT产业变革对社会生活和公众行为模式所带来的影响谈谈自己的理解。

一、令基础电信运营商胆寒的 OTT

OTT是英文“Over The Top”的缩写，是通信行业非常流行的一个词汇，这个词汇最初来源于篮球等体育运动，是“过顶传球”之意，指的是球类运动员在对手球员头之上来回传球而达到目的地。引申到互联网领域，意指互联网公司通过租用基础电信运营

商的网络，但独立于基础电信运营商所开展的基于开放互联网的各种数据及视频服务业务，强调服务与物理网络的无关性。例如国外的谷歌、苹果、Skype、Netflix，以及国内的腾讯（QQ、微信）和各种移动应用商店都提供OTT服务。OTT服务商或者通过转换的盈利模式，或者直接面向用户提供服务和计费进行营利活动。

从技术的涵义上来说，OTT服务是由底层的基础网络直到顶层的业务应用所组成的统一系统，缺一不可。但从价值链上来分析，顶层业务应用的价值远高于底层的基础网络服务。从瓜分OTT业务蛋糕的难易程度来说，基础电信运营商占尽资源优势，理论上可以比别人做得更好。问题转化为基础电信运营商“做还是不做”以及“如何做”。不做，则基础电信运营商将沦为单纯的“传输管道”，收取微薄的传输通道费，不仅根本无法触及管道中传输的巨大价值，而且随着OTT业务的不断发展，其传统的业务地盘，例如语音通讯、短信等，也将面临被蚕食而不断萎缩的局面，从而演变成生死攸关的生存问题。前段时间在我国引起巨大争议的微信收费话题，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基础电信运营商的危机感和焦灼心态。然而，基础电信运营商做好OTT业务也绝非易事。从目前世界范围来看，各国基础电信运营商在拓展互联网，包括移动互联网，以及其他以内容为基础的服务业务方面的成绩都不尽如人意。这一现象的成因非常复杂，需要做非常细致的研究与分析。可以确定的是，做，则基础电信运营商必须具有奋起直追的资源投入勇气与决心，以及革命性的改革与创新举措。

二、云计算与微软的“清零”

微软无疑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企业之一。比尔·盖茨连续多年蝉联世界首富证明了这一问题。然而，云计算时代的到来，使微软受到了强烈的冲击。这种冲击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开始有人质疑微软是否会就此沦为二流公司。

所谓云计算，按照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定义：“云计算是一种按使用量付费的模式，这种模式提供可用的、便捷的、按需的网络访问，进入可配置的云计算资源共享池（资源包括网络，服务器，存储，应用软件，服务），这些资源能够被快速提供，只需投入很少的管理工作，或服务供应商进行很少的交互。”^①云计算包括以下几个层次的服务：基础设施即服务（IaaS）、平台即服务（PaaS）和软件即服务（SaaS）。这里所谓的层次，是分层体系架构意义上的“层次”。IaaS，PaaS，SaaS分别在基础设施层，软件开放运行平台层，应用软件层实现。云计算是继1980年代大型计算机到客户端-服务器的大转变之后的又一种巨变。

^① .The NIST Definition of Cloud Computing <http://csrc.nist.gov/publications/nistpubs/800-145/SP800-145.pdf>.

其实，云计算是一种服务模式的新名词，就其技术内涵而言，既不是什么新概念，也谈不上技术创新。早在上世纪60年代，麦卡锡就提出了把计算能力作为一种像水和电一样的公用事业提供给用户的理念，这成为云计算思想的起源。随着互联网业务的不断深入，人们发现需要一种既能降低建设与运营成本，又具有高可用性，能够应对大并发访问的信息系统。以虚拟化技术为基础，按需分配，用完释放的资源管理模式在此背景下重回人们的视野，赋以新名词云计算。云计算兴起之初经历了一个相对混乱的炒作阶段。随着物联网、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新兴应用的不断兴起，人们发现拥有超大资源池的云计算对于支撑这些应用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设施作用，因此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进入迅速发展的阶段。

微软之所以受到如此强烈的冲击，关键在于产业游戏规则和产业格局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在游戏规则方面，微软过去是以优秀的按套销售的服务器和PC终端软件产品见长，云计算时代的游戏规则将迫使其由纯软件开发的产品模式转向云和终端互动的服务模式，传统优势产品销量下降的经济含义不言而喻；在产业格局方面，微软目前面临的是在新规则下群雄并起、此消彼长的局面，过去的传统优势已不复存在。如何在云计算和大数据驱动的移动互联时代，构建微软全新的产业生态系统也将面临严峻的挑战。

比尔·盖茨的一句名言是“微软离破产永远只有18个月”，阐明了企业保持危机感的重要性。目前，微软正在以壮士断腕般颠覆式创新的方式践行着这句话。2013年3月下旬，在微软每年一度的战略会议上，史蒂夫·鲍尔默(微软CEO)在会上多次提出要“清零”、回到“初始状态”。“这就是说，微软这个差不多10万人的公司，要“重新”来过，用创业者的心态，放下过去的成功“包袱”，看到我们真正需要什么。”^①微软的战略转型将是一场大战役，可能会持续很多年。这种精神值得钦佩与欣赏，结局如何，尚需拭目以待。

三、令人扼腕的诺基亚衰落

1997-2007年，诺基亚雄踞全球手机霸主地位长达10年。2007年，诺基亚市值达到其巅峰的1147亿美元，但是也就在这一年，苹果推出第一代iPhone。从此，诺基亚开始走上衰落之路，短短5年多的时间，诺基亚不仅被赶下了世界第一的宝座，而且市值也缩水到了2013年129亿美元，缩水近10倍，并在2012年4月被世界著名评级公司惠誉将信用评级降至垃圾级。

关于诺基亚衰落的原因，互联网上有多如牛毛的各种分析与评论，有说诺基亚收购塞班公司破坏了塞班操作系统已形成的强大生态系统平衡的，有说诺基亚不该把命运全

^① 张亚勤，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6ccc870101c712.html。

都交给了前途未卜的Windows Phone的，有说诺基亚骨子里就是制造公司的，有说诺基亚未认识到谷歌与苹果操作系统崛起的真正原因的，有说诺基亚忽视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把手机主要功能依旧定格在通话上的等等，不一而足，有兴趣的读者可自行查阅。其实，诺基亚并非没有危机意识的企业。诺基亚最初从事造纸行业，之后做橡胶轮胎，战后发展卫生纸与电视机产业，最后进入网络电信产业。上世纪90年代初，诺基亚曾遭受过几乎破产，CEO自杀的命运，最后通过大刀阔斧地卖掉与手机无关的事业才得以生存。相关信息表明，曾经濒临死亡的诺基亚，一直不敢掉以轻心。诺基亚也并非是没有技术创新意识的企业。诺基亚的财报显示，其每年投入的研发经费非常巨大。笔者参观过诺基亚位于北京亦庄的研发中心，对其巨大的投入，严谨的工作作风，杰出的研发成果印象深刻。1996年，诺基亚就推出了智能手机的概念机，比苹果的iPhone早了10年以上。2004年，诺基亚内部就开发出触摸屏技术，甚至是现在当红的3D技术。在服务创新方面，诺基亚在2007年就率先在全球推出OVI服务品牌，比苹果的App Store早了1年。2007年10月，诺基亚以81亿美元收购美国地图供应商Navteq，显示诺基亚清楚地了解未来的竞争在服务。即使如此，诺基亚还是如此迅速地衰落了，的确令人扼腕，其衰落的深层次原因值得深入探讨研究。从诺基亚衰落现象上我们可以隐约看到第一个发明了数码相机如今却破产的柯达的影子。以笔者基于对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当今最新发展现状及其可能趋势观察的后知后觉管窥之见，作为电信企业，对互联网的本质及其对消费者行为模式的影响，以及互联网平台与移动终端以应用为核心的互动关系缺乏深刻的理解与洞察，有可能是诺基亚衰落的最根本原因。在这一点上，又与基础电信运营商一直无法成功拓展OTT业务有许多相似之处。诺基亚能否像以前一样，通过认真的反思与改革，再次浴火重生、凤凰涅槃，有待持续的观察。

四、将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深刻影响的社会化新媒体

2010年应该称为中国社交网站真正兴起的一年。虽然之前已经有开心网、人人网、饭否、QQ空间、优酷、土豆等，但是新浪、腾讯等微博的快速成长，才真正引领中国人迈向一个新的媒体时代。

中国的社交网站虽然都称不上创新，都能在国外找到其模仿的对象，例如，开心、人人都是抄袭Facebook然后稍作微调的产品；优酷和土豆，都是YouTube的中国版；微博就是中国化的Twitter。然而，由于国情不同，社交网站对社会所带来的影响也非常不同，尤其是微博。

如果以“社交”的形式与内容的角度进行观察，可以注意到，Facebook是以“亲友”为主纽带所形成的圈子，Twitter是以“兴趣”为主纽带所形成的圈子，微信则是兼

具亲友、兴趣、空间距离等多纽带所形成的圈子。互联网社交圈子的形成以及其可能造成的舆论冲击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然而，目前新浪微博注册用户已经突破4亿，腾讯的微信注册用户数已经突破3亿，要想搞清楚所形成圈子的数量、纽带主题、潜在的社会、经济影响程度等绝非易事，需要依靠大数据技术，同时依赖社交网络平台的API开放程度。

社交网络平台以及丰富的交叉引用工具，使以个人为主体的自媒体成为可能，而且是多媒体化的。因此，社交网络往往也被称为社会化新媒体。如果以媒体的角度去看待社交网络，其典型特征是个体化、碎片化，以及自媒体化。这种看似个体化、碎片化的无组织行为，却可能由于某种“共同兴趣”或“共同关注”而瞬间凝聚成一种强大的社会舆论力量。如果这种社会舆论力量的目标指向某个机构或个人的负面因素，则足以摧毁一个人，一个企业，甚至一个政权。无数的案例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因此，社会化新媒体的冲击必将对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产生巨大和深远的影响。

社会化新媒体得以兴起的深层次动力在于公众信息获取方式习惯的改变，这从世界范围的电视收视率持续下降，纸媒阅读率持续走低可以看的非常清楚。社会化新媒体浪潮带来的是信息的泛在和传播规则与规律的改变。据笔者观察，社会化新媒体相对于传统媒体环境改变最大的是话语权的分配与传播规律的变化。从话语权分配的角度观察，我们会发现在社会化新媒体环境中欲争取话语权需遵循以下原则：其一，平等交流原则。社会化新媒体环境中主体之间的交谈奉行平等原则，如果用道德制高点式的说教和标准答案式的宣传与灌输，不仅起不到效果，还会激发一种逆反。其二，诚信原则。社会化新媒体环境中是讲究品牌的，被关注或话语权的积累是一个高度依赖自身诚信与坦诚形象的缓慢过程。其三，话题具有价值和共同兴趣原则。从传播规律改变的角度观察，我们会发现热门话题存在极短的时间窗口，在时间窗口之外任何人对传播的范围和效果均无能为力。例如某人或某机构如果出现热议的负面因素，新的传播规律会在极短的时间内掀起一股巨浪，并在人们心目中留下印象后滚滚而去。等你反应过来试图去解释的时候，已经没有多少人关注你在解释些什么。

不遵循话语权分配原则的人或机构将会发现，如果人们对他们所说的话不感兴趣，则无论他们如何声嘶力竭也无法获得话语权。这对于习惯于通过传统媒体传达自己声音的人或机构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许多人在这场大潮的冲击面前产生了迷茫、彷徨、不安的反应，感受到权威受到挑战的威胁，显示出高度的不适应。未来如何看待与对待社会化新媒体，例如如何适应、利用、管理等，考验着政府、企业，乃至每一个人的智慧、能力，以及自信。

五、拥抱大数据时代

“大数据”是时下最火热的IT行业词汇。所谓大数据，是以庞大的体量，即时的快速、多样的范围获取数据，并提取出其中所蕴含的规律与知识，用以指导我们的决策与行动的活动集合；它是一种通过收集、整理生活中方方面面的数据，并对其进行分析挖掘，进而从中获得有价值的信息，使我们更加具有智慧的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按照目前较为流行的定义，大数据应具备所谓4V的特征：体量（Volume）、多样性（Variety）、速度（Velocity）、价值密度（Value）。

从数据体量的角度看，据美国互联网数据中心的数据，互联网上的数据平均每年增长50%，每两年翻一番。而随着物联网和社会化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全世界的工业设备、汽车、电表上无数的数码传感器，随时测量和传递着有关位置、运动、震动、温度、湿度乃至空气中化学物质的变化，所产生的海量数据比互联网大若干个数量级；社会化新媒体每时每刻都在发布海量的文字、图片、视频数据。数据爆炸式增长是当前时代的一个特征，目前世界上90%以上的数据是最近几年才产生的；从数据多样性的角度看，以前的技术主要解决的是结构化数据问题，而现在存在着大量的非结构化和半结构化数据；从数据采集与处理速度的角度看，过去一般采取对准备好的数据进行批量处理的方式，而现在要求即时采集即时处理的方式；从价值密度角度看，即时采集的数据往往存在价值密度过低问题，例如24小时的视频监控过程可能只有几秒钟对当时我们所关心的问题具有价值，提取的过程堪称沙里淘金。

大数据对技术的挑战是显而易见的。云计算的出现使大数据的技术实现成为了可能。因此，云计算是大数据的基础设施，而大数据是云计算的杀手级应用，两者相辅相成。

最早提出“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的机构是全球知名咨询公司麦肯锡。麦肯锡在研究报告中指出，数据已经渗透到每一个行业和业务职能领域，逐渐成为重要的生产因素。大数据将对企业营销、社会管理等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产生深远的影响。因为大数据的核心内涵是“智慧”，所以可以预见，对大数据的掌握程度，将极大地改变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一个企业与其对手的竞争力对比。得大数据者得天下。

六、“阿里金融”的意义

在2012年9月初的网商大会上，马云宣布，阿里将从2013年1月1日起转型，重塑为平台、金融和数据三大业务，拉开了阿里金融的大幕。对此，有人惊呼：可怕的阿里金融^①，

^①可怕的阿里金融 <http://www.shangjie.biz/news/yw/2012/1118/314916.html>。

有人不以为然，认为离撼动银行很远^①。关于阿里金融的真正意义，需要从具备小金额、大客户数量特征的信贷业务信用风险控制工具与手段的角度进行观察。

中小企业贷款难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记得多年前笔者所参加的一次政府主办的，旨在促进缓解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的座谈会上，某国有大型银行北京分行副行长直言不讳地说：“如果是中石油、中石化贷款的话，我闭着眼睛都敢签，但中小企业贷款的话，哪怕只有100万我也哆哆嗦嗦不敢签。”这位行长说的是实话，所折射的是面对中小企业贷款信用风险控制的无能与无奈。

不仅限于中小企业贷款信用风险控制难问题，在诸如面向消费者个人的信用卡、消费信贷等同样具有小金额、大客户数量特征的信贷业务，如何在有限成本约束条件下实施有效的风险控制，是银行必须解决的问题，如果他们还想开展这些业务的话。

面对小金额、大客户数量特征的信贷业务，能够低成本有效控制风险的“智慧”其实隐藏在数据里。一般而言，欲对此类业务实施有效的风险控制，授信人必须通过对大量受信人群体的身份、还款意愿、还款能力这三个要素进行特征综合分析，建立起违约风险概率谱系。对新客户，通过对其进行特征分析后确定其在违约概率谱系中的位置，将其纳入与此风险概率对应的营销及风险控制政策框架内进行管理，以保障在大数定理下盈利大于违约损失，继而保障此类业务健康可持续地开展。

问题的关键是数据。中国人民银行在1997年开始建设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1999年开始建设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截至目前，企业信用数据库收录的企业及其他组织共计1000多万户，其中600多万户有信贷记录，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收录自然人数共计6亿多人，其中1亿多人有信贷记录。如果能够对其所储存的数据加以有效利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理论上可以帮助商业银行建立起有效的面向中小企业和个人消费者信贷风险控制系统。然而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中国人民银行目前只向金融机构开放针对个体的查询业务。个体的查询服务只能帮助金融机构建立违约抵制防御联盟，而无助于金融机构快速低成本地确定尚无违约记录授信人的风险概率，更无助于促进金融机构主动的信贷营销服务。大量宝贵的数据被束之高阁，帮助金融机构防范信贷风险的能力大打折扣，令人惋惜。

据目前可查询到的数据，截至2011年底，阿里巴巴的注册会员数已经超过5000万，远超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的600万户，截至2012年底阿里巴巴的电商的年销售额超过万亿。以每天大量的真实交易记录数据为依托，阿里巴巴建立起一整套信用评价体系与信用数据库，以及一系列应对贷款风险的控制机制。

依托数量远超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交易信用记录更接近企业真实信用状况的宝

^①详解阿里金融信用支付 <http://tech.163.com/13/0306/19/8PABQHUF000915BF.html>。

贵的海量数据，阿里金融具备在中国率先建立最逼近真实的客户风险概率谱系的能力，使得阿里金融快速低成本判定任何一个新客户的风险概率成为可能，使得阿里金融面向所选择特定风险概率群体开展主动信贷营销成为可能。这就是阿里金融意义的根本所在。几乎可以肯定，随着中国金融体系的开放，如果阿里金融获得正式进军金融业的机会，将成为具有巨大优势与发展潜力的生力军，因为他们具有国内商业银行目前根本不具备，而且即使现在开始也需要很多年积累才能形成的知识与能力。

马云曾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表示，“如果银行不改变，那我们改变银行”。阿里金融的出现使这句话已经成为现实。对中国的传统银行业来说，狼真的来了，并且已经兵临城下！目前能够保护他们的只有行政性的金融垄断。如果开放自由竞争，中国金融产业格局必将发生巨变。为有效应对未来的竞争，中国银行业的改革迫在眉睫。笔者观察的兴趣在于为什么这只狼没有来自于现有金融机构内部，而来自于互联网，以及互联网还会带来些什么。

从以上几个案例，我们应该已经能够感受到互联网的不断发展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与范围强烈冲击并影响着IT产业内外，乃至政治、经济、文化的许多方面，而且这种变革永远不会停止。在IT产业内部，诸多著名的软硬件生产厂商目前正在实施重大的战略调整，其原有的软、硬件，乃至信息系统与网络的特征与界限正在模糊与消失。例如，作为数据库起家的典型软件企业Oracle收购硬件厂商Sun Microsystems，其一体机系列产品正在对业界产生深刻影响；IBM出售其PC业务，正在与联想商谈进一步出售其低端服务器产业，并收购了普华永道咨询部，开始全面向高端咨询服务和其他重要科技领域转型；Google开始全面涉足智能眼镜、智能手表、智能电视，乃至无人驾驶汽车领域；2012年7月，虚拟化技术和云基础架构厂商VMware收购软件定义网络(SDN)先驱者、开源政策网络虚拟化企业Nicira，对当今网络设备生产商老大思科公司提出严峻挑战。还有许多例子，可以说是风起云涌，精彩纷呈，当然也少不了失意者的落寞与无奈。这种跨界大融合的趋势，使得目前即使IT业内权威专家都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名词来描述今后企业可能具备的特征。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这些企业都在奔向一个方向：那就是更加智能化的产品与服务！需要指出的是，IT产业内企业对变革的关注必须在国际化的视野下进行，因为技术进步而触发的产业变革可能来自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在IT产业外部，各类企业也必须学会拥抱这些变革，否则将难免被淘汰的命运。例如，对于消费类产品生产企业来说，如果没有以大数据技术为基础的智能分析系统支撑其营销，则其对消费者心理、偏好及其发展趋势的了解犹如瞎子摸象，将很快被具备这种能力的竞争者所取代；对于传统媒体来说，如果不及时采用新技术满足公众信息获取方式改变的

（下转第 87 页）

· 区域经济 ·

设立二连浩特商务特区 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沈家文 赵长茂

摘要：深化改革开放，加强国际经济合作，提高开放型经济的质量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抉择。二连浩特市与蒙古国扎门乌德市隔界相望，在中蒙俄三国经贸往来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在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亟待以设立二连浩特商务特区为契机，深化中国与蒙古、俄罗斯等国家的经济合作交流，构建沿海开放与沿边开放联动发展的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关键词：商务特区 二连浩特 跨境经济区 综合保税区

作者简介：沈家文，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后、研究员；
赵长茂，中共中央党校组织部部长、教授。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世界经济结构正发生重大调整与变革。深化改革开放，加强国际经济合作，提高开放型经济的质量水平，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抉择。根据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亟待以设立二连浩特商务特区为契机，发挥沟通欧亚、连通世界的国际通道优势，深化中国与蒙古、俄罗斯等国家的经济合作交流，构建沿海开放与沿边开放联动发展的全方位开放的完整布局，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设立二连浩特商务特区的背景意义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与世界经济的复苏，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面临重要机遇，必须进一步发挥沿边城市先导区的积极作用。在中国长达2.2万公里的陆地边界线上，从南方沿边的云南瑞丽、广西东兴，到西北沿边的新疆喀什、霍尔果斯，以至东北沿边的内蒙古满洲里，各类开发开放政策陆续出台。二连浩特市与蒙古国扎门乌德市隔界相望，

是中国向北开放的前沿城市，在中蒙俄三国经贸往来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在二连浩特设立商务特区，将有力地推动中蒙俄经济合作，对中国北方沿边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一）东北亚经济合作面临重要机遇

无论是经济规模，还是贸易规模，东北亚在世界经济格局中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近年来，全球经济持续低迷，但东北亚地区经济增长显著，2011年中俄日韩朝蒙六国GDP总值超越欧盟，超过16万亿美元。东北亚汇集了不同类型和层次的经济体，有利于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互利互惠合作，具有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中日俄韩经济规模分别位居世界第二、第三、第六和第十二位，蒙古和朝鲜的资源优势将支撑其未来发展。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为周边国家注入新活力，东北亚经济合作的内生动力不断增强。根据国家商务部统计数据，2011年中国与日、韩、朝、蒙四国的进出口总额为6005.92亿美元，同比增长17%；其中，中蒙进出口总额为64.31亿美元，同比增长60.7%。中俄经济合作加速发展，俄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中俄双边贸易额达835亿美元，同比增长40.84%，占俄全年对外贸易额（8016亿美元）的10.42%；其中，俄对华出口352.4亿美元，自华进口482.6亿美元，分别同比增长73.3%和23.9%。近年来中国周边发生多起领土纠纷，无可避免地将影响到东北亚国际经济合作。从战略上看，未来的国际竞争结局取决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是否能符合先进生产力和先进生产方式的发展要求。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全局而言，东北亚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并将成为新的全球经济中心，东北亚经济合作面临着重要发展机遇。

（二）中蒙经济合作面临转型升级

中蒙在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合作前景良好、发展空间广阔，面临进一步的深化发展和转型升级。一方面，两国经济贸易合作稳步发展，经贸合作的领域和规模日益扩大。中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蒙古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蒙海关统计显示：2011年中蒙进出口总额63.3亿美元，占蒙古外贸总额的56%，同比增长84.3%。蒙古出口中国主要商品中煤炭22.24亿美元、铜矿石和精粉9.64亿美元、铁矿石和精粉4.37亿美元、原油2.52亿美元；蒙古进口中国主要商品中钢材建材1.19亿美元、货车2.72亿美元。另一方面，中国已成为对蒙最大投资国，为蒙古经济的高速增长发挥着重要作用。中资企业在蒙古国的石油、矿山、建筑、畜产品加工以及服务业和服装业等领域有较大投资。中蒙两国2011年6月发布《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声明》，将中蒙睦邻互信伙伴关系提升为中蒙战略伙伴关系，加强在矿产资源、农牧业、能源、环保、高科技、基础设施、金融等领域合作。当前，中蒙两国经济合作的质量与水平面临全面提升：调整和优化经贸结构，把经济合作建立在环境友好、惠及民生、互利共赢的基础上，提升集约高效和

可持续发展能力，加强投资力度，扩大合作规模，拓宽合作领域。

（三）中俄经济合作面临新的突破

中俄经济合作水平近年持续上升，两国广阔的经贸合作前景和积极发展的态势逐渐显现，合作领域不断拓宽、质量逐步提高，中俄经贸合作将上升至更高水平。一方面，中俄经济合作的基础不断巩固。一是中俄两国元首2001年7月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确定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基础上，发展两国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与互利合作关系的宗旨和原则。二是中俄双方2008年11月批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实施纲要（2009-2012年）。三是中俄双方2012年6月发表《关于进一步深化平等信任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强调双方将致力于进一步加强平等信任、相互支持、共同繁荣、世代友好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四是中俄两国元首2013年3月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合作共赢、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俄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另一方面，中俄经济合作前景广阔。首先，俄罗斯2012年8月22日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第156个成员，中国作为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俄罗斯入世后的市场准入、贸易和投资环境的变化将为中俄两国经贸合作的深入发展带来新契机。其次，中俄两国是世界公认的“成长最快的经济体”，经济发展创造了两个充满活力的巨大市场，为两国的商品、资源、技术和资本进入对方市场提供了广阔前景，中俄经贸关系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从长远来看，中俄双方需要提升两国经贸合作水平和由此产生的相互经济利益的依存度，改善经贸结构，在加强高科技领域合作、加大能源产业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扩大双向投资等方面面临突破。

（四）国家相关战略决策面临深入贯彻落实

二连浩特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国家有关战略决策面临贯彻落实。首先，中央领导对二连浩特作出的重要指示有待落实：1984年9月，胡耀邦同志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周惠的陪同下考察二连浩特时，提出“南有深圳、北有二连”的战略构想。1994年8月，胡锦涛同志视察二连浩特，作出“在边字上做文章，在开放上下功夫，在内联上求发展”的重要指示。其次，国家多项重要决策有待贯彻：一是2011年3月通过的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加快沿边开放，加快重点口岸、边境城市、边境（跨境）合作区和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把黑吉辽蒙建成向东北亚开放的重要枢纽。二是2011年6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内蒙古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1]21号）明确提出“研究建立二连浩特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三是国务院2011年6月《关于印发兴边富民行动规划（2011-2015年）的通知》指出，选择一批重点口岸和城市，发展外向型产业，完善配套产业链，促进形成国际经济走廊和经济合作

带。四是2012年3月国务院批复《东北振兴“十二五”规划》，“支持满洲里、二连浩特、珲春、黑河、绥芬河、抚远、丹东等城市创新体制机制，完善政策措施，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层次和水平”。五是国务院2012年5月批复八部委《加快培育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指导意见》明确：支持开放开发试验区发展，加快建设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六是国务院2012年7月批复《关于中国东北地区面向东北亚区域开发规划纲要（2012-2020年）》强调：扩大和深化与东北亚国家合作，着力加强交通运输网络和口岸设施建设，着力提升区域的引领带动作用。总之，设立二连浩特商务特区，是实施中国开放型经济战略的必然要求，是深化中蒙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举措，是实施“兴边富民”、“富民安边”战略的重要实践，是促进内蒙古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举措。

（五）构建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完整布局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中国在坚持向东开放的同时，还要加大向南、向西、向北开放的力度。不仅要保持沿海地区良好发展态势的同时，还要加快内陆沿边地区发展，使二者相互有效链接，在中国沿边地域形成环状的沿边开发开放经济带。设立二连浩特商务特区，打造中国北方沿边区域的经济增长极，推动以点带线、以线带面，加速中国沿边开发开放经济带建设，有利于扩大中国的开放空间、增强国际竞争力，构筑沿海开放与沿边开放相结合、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相结合的互动发展的全方位开放的完整布局。

（六）加快中国北方沿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十八大报告提出“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中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出现，以及近期中国周边国际形势的变化，更加凸显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设立二连浩特商务特区，促进北方沿边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协调发展，促进内外联动、统筹兼顾的科学发展，对于建立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促进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和平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综合判断国际国内形势，转变中国沿边地区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关键是在“加快”上见实效。

二、二连浩特商务特区的战略定位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特区已实现了从一种形式到多种形式、从沿海到内陆的多样化发展，先后设立了15家保税区、65家出口加工区、10家保税物流园区、14家

国家级保税港区和15家综合保税区。当前，在二连浩特设立商务特区，构建跨境经济合作区、综合保税区、税收优惠区三区合一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以高度自由的经济体制和便利的通关服务机制，集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这是新形势下举办经济特区的又一重要新形式，将为中国北方沿边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其战略定位体现为三个方面：

（一）中国向北开放的一流口岸城市

不均衡发展理论揭示，经济进步并不同时出现在每一处，经济进步的巨大推动力将使经济增长围绕最初的出发点集中，增长极的出现必然意味着增长在区域间的不平等是经济增长不可避免的伴生物，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在二连浩特设立具有示范意义的商务特区，可以充分发挥口岸城市的区位优势 and 资源优势，形成中国北方沿边的经济增长极和区域经济中心，建设成为中国北方最具活力的一流口岸城市，对于二连浩特市及其周边区域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将发挥无可替代的巨大效用。在体制建设及配套改革方面先行先试，探索在新形势下区域发展新模式，以二连浩特商务特区为窗口，以改革开放为动力，吸引东部沿海和国外投资者参与调整产业结构和优化产业布局，适时推进跨境交通运输工程合作建设步伐，加强边境区域经济技术合作，推动建设跨境经济合作区，使二连浩特商务特区成为北方沿边地区优势互补、内外联动的有效合作载体，为构建更加开放的中俄蒙经贸合作区创造条件。设立二连浩特商务特区，将带动周边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首先，商务特区将加快城市发展，形成中蒙沿边区域的经济增长极和区域经济中心，拓展中国的国际合作空间。其次，带来巨大的社会效应，促进不同文化的融合，加速文化的交流，提高教育文化水平，进而带动城市发展。第三，商务特区所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将为沿边居民提供了更好的生活空间，是实现沿边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中国北方沿边国际贸易物流中心和进出口加工基地

推动中蒙经贸合作在更高层次上向纵深发展，建设成为中国北方沿边的国际贸易物流中心和进出口加工基地。加快建设以二连浩特商务特区为核心的二连浩特开发开放试验区，促进沿边地区与内陆腹地优势互补和联动发展，开拓陆海联运国际运输新通道，探索沿边地区跨境经济合作模式，通过集中投入、政策引导、产业集群，把二连浩特建设成为以进出口资源加工、国际商贸和口岸物流业为主导的重要沿边产业基地。充分发挥开发开放试验区的引擎作用，提升中蒙沿边地区的综合经济实力。设立二连浩特商务特区，可以发挥口岸城市的区位优势 and 资源优势，加快二连浩特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首先，更好地吸引东部地区的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促进资源集中和产业聚集，以扩大工业总量为核心，加速工业发展、加速企业转型，推动二连浩特的工业

化进程，实现口岸城市的经济起飞和跨越式发展。其次，商务特区对于中蒙沿边城市的发展具有很强的经济效应，使生产要素的跨界流通更加便利，物质、人员、信息在中蒙沿边城市之间能够通畅流通，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互补优势，扩大产业协作，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发挥区位独特、政策集成、环境容量大、资源承载力强的比较优势，做大做强特色优势产业，进一步优化区域产业分工协作，建设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新型工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加速城市化进程。第三，优化口岸城市的空间结构和地域部门结构。在地缘区域内部实现产业的前向和后向的关联，使主导产业与关联产业、基础性产业之间的数量、规模、时序和空间布局等方面协调发展，根据资源特点、基础条件建设特色产业集聚区。

（三）中蒙俄经济合作先导区

中蒙俄经贸合作要扩大规模和实现战略升级，最佳路径选择是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设立二连浩特商务特区，建设成为中蒙俄经济合作先导区，通过中蒙沿边城市互动来消弱国界壁垒的作用，促进区域内市场的统一，改变市场分割的局面，加强中蒙俄的经济合作关系。一方面，二连浩特市背靠京津塘环渤海经济圈和呼包鄂经济带，是距首都北京最近、对蒙开放的最大公路、铁路口岸，陆路连接欧亚最便捷的通道，不仅资源丰富、市场发展潜力巨大，而且具有对蒙开放的地缘优势和后发优势，具有承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加快中蒙沿边经济发展的巨大空间，具有成为区域经济中心的发展潜力。另一方面，二连浩特面临蒙古、俄罗斯及欧洲国际市场，口岸对面的扎门乌德自由经济区是蒙古国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享受欧盟赋予的“普惠制”政策，商品出口欧盟国家不受配额限制、免除关税。立足中蒙口岸优势，设立二连浩特商务特区，充分发挥二连浩特作为中蒙俄沿边经济合作先导区的作用，集成口岸、物流、加工、展示和旅游等功能，带动周边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加大中蒙、中俄之间的国际经济合作。首先，有利于发挥沿边城市互动作用，以沿边城市经济促进沿边城市向政治缓和与合作方向发展，促进和平发展与改善国际政治关系。其次，能够保障边疆稳定，通过制度安排和节点机制的运行更好的协调中外沿边城市政治和经济关系。再者，二连浩特作为中国对蒙古国开放的最大口岸，处于中蒙经贸合作和人文交往的最前沿，设立商务特区，是中国北方沿边地区新的经济增长极的战略选择，对于中蒙关系的友好发展有着非常直接的效用。

三、政策建议

中国经济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抓住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机遇，设立二连浩特商务特区，充分发挥内引外联的枢纽作用，构建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加快中国北方

沿边区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体建议如下：

（一）设立二连浩特商务特区，打造沿边经贸合作示范城市

建议在二连浩特市设立跨境经济贸易区、综合保税区、税收优惠区三区合一的商务特区，享受国家给予的特区政策待遇，包括对于土地、金融、财税、投资等领域赋予先行先试权，允许和支持试验一些重大的、更具突破性的改革措施，探索构建自由贸易试验区。第一，在财税方面，促进建立与口岸过货量、贸易额、进出境人数等口岸主要指标挂钩的财政支付增长机制，加大对口岸转移支付力度，在边贸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专项资金、中小企业专项资金、旅游专项发展资金、外贸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资金等方面给予倾斜。第二，在金融方面，鼓励银行、保险、证券、基金等金融机构在二连浩特商务特区设立区域总部、资金清算结算中心、投融资中心等；拓展国际金融服务业务，探索人民币结算试点，创新外汇监管方式；拓展政策性银行对口岸建设、边境贸易、对外投资、地方政府间合作项目的支持范围。第三，建立健全与开发开放相适应的土地管理制度，探索建立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评估修改制度，统筹城乡发展和生态建设，合理调整用地结构和布局。第四，以探索跨境经济合作为突破口优化整合和提升沿边特殊经济区域功能，以探索跨境合作为重点，突出区位、区域功能，建设特色鲜明、优势互补、各展所长的沿边特殊经济区域，成为经济发展、边疆稳定、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开发合作区和实验区，把二连浩特打造成为中国沿边经贸合作示范城市。第五，探索构建二连浩特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立专门机构负责自贸区的管理协调，赋予“境内关外”的法律地位，参照国际上自由贸易区“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区内自由”的原则，实行自由港政策，区内企业具有完全的自主权。

（二）以二连浩特商务特区为核心，加速建设二连浩特开发开放试验区

以二连浩特商务特区为核心，加速建设二连浩特国家级开发开放试验区，制定和完善财税、金融、投资和贸易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制订和完善支持政策体系。第一，财税政策。建议给予商务特区内的小微型企业在5年内减免企业所得税的特殊政策。扩大转移支付力度，增加政策性贷款规模，重点用于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路、铁路、机场与沿边重点口岸的对接，积极稳妥地推进重要国际通道和口岸的建设，出台相关政策吸纳社会资金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第二，产业扶持政策。设立扶持沿边地区产业的专项资金，研究制订沿边地区优势产业目录，对沿边地区国家鼓励类产业的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并制订配套的政策措施。第三，完善边贸政策。给予边境地区从邻国进口资源和原材料商品税收减免、放宽配额管理以及建立沿边开放贸易发展基金等。第四，在土地综合开发利用、出入境管理以及跨国结算与投资便利化等方面研究出台新的扶持政策，探索组织和制度创新。

（三）将二连浩特商务特区上升至国家战略，打造中国北方沿边的经济增长极

建议将二连浩特商务特区上升至国家战略，在国家发展战略规划中有所体现。（1）从国家层面上统筹资源，作为国家经济战略布局的重要支点，形成与深圳特区、上海浦东、天津滨海梯次连接、南北呼应的格局。（2）积极发展边境加工贸易和当地特色产业，通过吸引国内外资金和技术，延伸产业链，建设大物流，提升产业集聚发展能力，增强经济辐射力。（3）争取设立中蒙俄沿边开发建设基金，鼓励设立股权式的投资实体，建立以资本为纽带的互利双赢合作方式。（4）将产业转移和改善基础设施条件、输出开发管理模式相结合，建设具有口岸特色的新型产业园区，将二连浩特商务特区打造成为北方沿边区域的经济增长极。

（四）以二连浩特商务特区为示范，探索沿边特色产业集群的发展新方式

发挥二连浩特的沿边区位优势，发展口岸特色产业集群，加快中国北方沿边区域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探索沿边特色产业集群的发展新方式。（1）结合地区经济结构的调整任务，走产业升级之路，从区位优势、比较优势出发，采取“差别化战略”“错位经营”“分层竞争战略”等策略，围绕核心竞争力的发掘与培植，构建有竞争优势的地区特色产业园。（2）以资源要素结构、资源配置过程以及地缘文化等的差异和比较优势为前提，从区域的实际情况出发，围绕特色资源，开发特色技术，培育一批特色企业和产品，使特色经济发展规模化。（3）综合考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在产业转移、空间集聚的推动下，依托若干口岸特色产业集群，通过绝对优势、比较优势、要素禀赋、规模经济形成专业化的特色产业，发挥特色产业集群的示范和扩散效应，带动中蒙俄沿边广大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

（五）以二连浩特商务特区为契机，探索北方沿边与东部沿海联动发展新机制

（1）加快建设二连浩特商务特区，推动北方沿边口岸与东部沿海港口联动发展，引入新的生产机制和管理模式，形成与沿海企业的上下游或技术互补的产业联合。（2）通过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加强沿海与内陆沿边的产业联系，利用内陆沿边地区土地和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和廉价的优势，推动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初级加工业向西部转移，推动沿海地区的产业升级，带动沿边区域和产业的发展。（3）通过跨境贸易区和税收优惠区等配套政策，鼓励沿海企业来兼并沿边企业或组建企业集团，盘活沿边地区企业的存量资产。

（六）以二连浩特商务特区为试点，探索中蒙俄自贸区的政策框架和实践模式

将二连浩特商务特区设立为国家自由贸易综合试验区，探索建立中蒙俄国际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政策框架和实践模式。（1）充分考虑到中蒙俄各国产业和市场的实际发育状

况和各自关注的利益与担忧,采取分阶段、分领域、分地区逐步推进的方式,在二连浩特商务特区首先实行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使中蒙俄自由贸易区最大限度地成为加强东北亚经贸合作的平台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加速器,积极探索特区发展新模式。(2)先行试验一些重大的改革开放措施,以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和体制机制创新作为重要途径和突出抓手,加强产业集群能力建设。(3)把对外开放作为特区发展的强大动力,建立沿边国际商贸示范区、中蒙国际物流中心等核心功能区,使之成为带动中蒙沿边区域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支点。(4)借鉴国际自由贸易区的成功经验和管理模式,全面发展口岸通道、国际配送、国际采购、转口贸易、出口加工、离岸金融业务;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加快物流基地建设,打造商品集散地,逐步建成国际中转中心,打造出口加工型国际合作工业区和新型沿边产业基地。

责任编辑:晨乔

.....

(上接第 113 页)

9. Abbey, Augustus and John W. Dickson. 1983. "R&D Work Climate and Innovation in Semiconductor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Vol. 26(2), 362-368.
10. Carter, Craig R. 2002. "Assessing Logistics and Transportation Journals: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Transportation Journal*, Vol.42, No.2, 39-50.
11. Hochwarter, Wayne A., Pamela L. Perrewé, Gerald R. Ferris and Robert A. Brymer. 1999. "Job Satisfaction and Performance: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Value Attainment and Affective Disposition."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Vol.54, 296-313.
12. Braxton, John M. and Alan E. Bayer. 1986. "Assessing Faculty Scholarly Performance." *New Directions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 Vol.50, 25-42.
13. Olson, James M., and Mark P. Zanna. 1993. "Attitudes and Attitudes Change."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Vol.44, 117-154.
14. Organ, Dennis W. and Katherine Ryan. 1995.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Attitudinal and Dispositional Predictors of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Personal Psychology*, Vol.48, 775-802.
15. Theoharakis, Vasilis and Andrew Hirst. 2002. "Perceptual Differences of Marketing Journals: A Worldwide Perspective." *Marketing Letters*, Vol.13(4), 389-402.

责任编辑:晨乔

海外引进高端人才科研 绩效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基于科研环境的视角

张瑾

摘要： 高端人才是国家综合竞争力关键要素，为高端人才创造有利于创新的科研环境，能够更好地发挥人才作用。本文以182位海外人才工程入选者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实证检验各影响因素与科研绩效关系。结果表明，组织内部人际关系、单位重视、科研条件、工作感受与微观科研绩效显著正相关，成果转化机制和微观科研绩效显著负相关；与国内高端人才关系、成果转化机制与宏观科研绩效显著正相关。并从成立高端人才队伍建设领导协调机构；人才引进要坚持以用为本；建立引进人才与国内人才平衡发展机制；实施人才工程绩效评价制度；健全科研成果转化服务、考核和激励机制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 海外引进高端人才 科研环境 科研绩效

作者简介： 张瑾，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博士后，山东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

在经济全球化日趋深入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下，高端人才成为国家综合竞争力关键要素，世界各国纷纷采取强有力措施，争夺和抢占高端人才资源，海外高端人才引进成为热门话题。国家和地方政府、单位纷纷出台各种关于人才引进的优惠政策、实施方案，吸引大量海外高端人才回国工作。人事部门常将引进的人才数量作为部门工作的业绩，在人才引进后即认为已完成引进工作，仔细分析发现，现有政策方案多是针对人才引进过程而设计，普遍包括为引进人才落户开辟绿色通道、解决配偶工作问题和子女入学问题、提供优质住房、科研启动资金等。而对人才引进后的后续政策制订较为缺乏或不够细致，人才引进后科研工作的跟踪服务不足，对如何为人才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氛围，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认识还不够深入，或是完全忽视。

事业是吸引海外高端人才回国的关键，高端人才总是流入最能够使他们发挥才能、

做出成就的国家和地区，发挥才能不仅需要资金和硬件设备，也需要文化、制度等软环境，这就需要创造能使回国人才真正发挥作用的环境和机制。国家吸引海外高端人才的目的是通过人才作用的充分发挥，突破关键技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带动新兴学科发展。他们的创新成果的产生必须要有一个学术气氛浓厚、环境宽松、静心搞学问的氛围。从科研环境视角，以海外引进高端人才为研究对象，调查分析人才回国后科研绩效影响因素，针对关键因素提出政策建议，对改善高端人才工作环境，提升高端人才科研绩效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研究综述

科研活动是多参量投入和多参量产出的开放系统，影响因素错综复杂。国内外在科研绩效研究领域有大量研究，集中讨论影响科研绩效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客观因素构成科研环境，是科研过程中支撑和影响科研环节要素总和，分硬环境和软环境。科研场地、仪器设备、经费薪金等构成科研硬环境；学术素养、学术风气、人文环境构成科研软环境。硬环境和软环境互相渗透，共同影响科研各个环节。现有对科研环境的研究，主要是从科研团队合作、工作付出和感受、激励机制、科研条件、成果转化机制等方面分析。

第一，科研团队合作与科研绩效。人才需要与组织内部同事合作，同事配合程度会对科研绩效产生影响（Abbey and Dickson, 1983）。引进的高端人才工资待遇和国外接轨，组织提供科研启动经费，海外引进高端人才与国内培养高端人才间，因为待遇差别巨大，引进人才被组织内外部原有高端人才孤立，引进的高端人才面临尴尬局面。

第二，工作付出、工作感受与科研绩效。工作付出包含承担的工作量、付出获得收益与期望相当程度、行政琐事占用时间；工作感受包括成就感、工作吸引力和挑战性。有些人才反映，行政琐事占用较多科研时间。研究发现，绩效和工作满意度间具有较高相关系数（Organ, 1995），工作感受和工作绩效相关系数达到0.22，并呈显著性（Hochwarter, Perrewe, Ferris, 1999）。

第三，激励制度与科研绩效。组织对创造性行为奖励和认可有助于创造性行为产生（Braxton and Bayer, 1986），若高绩效能获得高报酬和晋升机会，则包含晋升和薪酬福利的激励制度对绩效产生正向影响（Olson, 1993）。行政职务晋升机会、专业职称晋升机会显著正向影响科研工作行为（黄桂，2005），晋升问题通过晋升机会公平性、可获得性、满意度衡量。科技人员在各种收入、福利、待遇的满意度，对其工作满意度高低有较大解释力（张廷君、张再生，2009）。

第四，科研条件、项目申报与科研绩效。科研条件包括经费支持、实验设备、科研

团队成员配备；科研项目申报感受反映在，科研项目审批、申报手续和申报项目难度。科研经费投入(张伶、张正堂，2008)、国际学术交流情况(孔巍、黄淇敏，2008)、科研运行机制(陈健、何国祥，2006；赖继年，2011)对科研绩效产生影响。海外引进高端人才主要集中在高校和科研院所，他们对科研条件、科研项目申报非常关心。

第五，成果转化与科研绩效。相对于攀升迅速的科技论文和专利申请数量，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只有15%(刘朝晖、常思亮、胡洁，2012)。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9%左右，其中高新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20%，远远低于发达国家60%的贡献率，一些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研究出的科技成果，甚至被鉴定“国内首创”、“国际领先”，却往往被束之高阁(罗文，2012)。科研成果转化机制不完善严重影响了高端人才作用的充分发挥。

二、实证研究

目前国内外科研绩效实证研究较多，但针对海外引进高端人才科研绩效影响因素实证研究较少。把海外引进高端人才群体细化出来，是对高端人才政策完善研究的深入。

(一) 样本选择、调查问卷设计与数据来源

在北京、上海、江苏、山东等地展开调研，选择有海外工作学习经历，千人计划、百人计划、万人计划、长江学者等人才工程入选者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方式。结合对高端人才深度访谈资料，参考中组部关于“千人计划”实施情况调查问卷、安徽高端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建设调查问卷、北京大学百人计划调查问卷、湖南省高端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研究调查问卷，通过德尔菲法由专家对问卷进行修改，形成初步问卷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合计发放问卷400份，回收有效问卷182份，回收率45.5%，数据搜集时间为2012年2—8月。

(二) 探索性因子分析

1. 自变量探索性因子分析。科研环境因素为自变量，由高端人才感受问卷衡量，各题项采用Likert五尺度计分，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赋予1至5分。采取主成分分析法，做最大变异转轴法处理，KMO值0.836，Bartlett's球形检验 χ^2 值3489，自由度362，达到显著水平，累计解释变异数82.146%，Cronbach α 值为0.963。提取10个因子(见表1)，分别是组织内部人际关系、与国内高端人才关系、单位重视、工作量和时间安排、晋升机制、科研条件、科研项目申报、工作感受、薪酬福利、成果转化机制。

2. 科研绩效因子分析。科研绩效为因变量，测度需考虑科研产出数量和质量(Theoharakis and Hirst, 2002, Carter, 2002)。高端人才重要的岗位职责是带领科研

团队进行创新，对科研绩效评价包括对团队科研绩效评价。政府希望高端人才能有科研文章发表、专利申请、科研成果产业化，带来生产力提升。科研绩效量表各题项采用Likert五尺度计分，从“下降较快”到“增长很快”，赋予1至5分。采取主成分分析法，做最大变异转轴法处理，KMO值0.706，Bartlett's球形检验近似卡方值172.13，自由度25，Sig.为0，达到显著水平，累计解释变异数78.427%，各因子Cronbach α 值0.863。因子1由“对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重大现实问题的作用”、“科研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率”、“带领团队的科研成果影响力”、“带领团队的科研成果数量”4个指标组成，定义为宏观科研绩效。因子2由“个人科研成果数量”、“个人科研成果影响力”2个指标组成，定义为微观科研绩效。

表1 变量解释表

| 变量性质 | 变量名称 | 变量符号 | 变量解释 |
|------|-----------|------|------------------|
| 自变量 | 组织内部人际关系 | NBGX | 领导、同事和高端人才的关系 |
| | 与国内高端人才关系 | RCGX | 与学术同行专家相互促进彼此合作 |
| | 晋升机制 | SQWT | 升迁机会公平性和满意度 |
| | 薪酬福利 | XCFL | 对薪酬福利的满意度 |
| | 工作量和时间安排 | GZLS | 工作付出和科研时间安排充足 |
| | 工作感受 | GZGS | 工作的挑战性和成就感 |
| | 科研条件 | KYTJ | 经费支持、实验设备、科研团队 |
| | 科研项目申报 | XMSB | 科研项目申报的公开、公平、公正性 |
| | 单位重视 | DWZS | 领导重视，创新支持，后勤保障 |
| | 成果转化机制 | CGZH | 成果转化机制有效性 |
| 因变量 | 微观科研绩效 | WGJX | 本人科研成果数量质量 |
| | 宏观科研绩效 | HGJX | 对产业发展和单位团队的贡献 |

(三) 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本次调查高端人才中，从性别分布看，男性居多，170位占93.4%，女性较少，占6.6%；从年龄分布看，平均年龄45.3岁，最小31岁，最大57岁，标准差7.032岁。40-49岁区间人数最多，占52.6%；其次为50岁以上，占26.4%。隶属高等学校111人，占61%，占比最高；隶属民营企业37人，占20.3%；隶属科研院所26人，占14.3%；大型国企最少，占4.4%，目前高等学校为引进海外高端人才的主要用人单位。

从出国时间看，1990-1999年出国最多，105位，占58%；其次为2000-2006年，47位，占26%；1981-1989年出国的有29位，占16%。从国籍分布看，中国籍80位，占43.9%，数量最多；其次美国籍64位，占35%；其他国籍38位，分别是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日本、丹麦、瑞典籍。从高端人才回国前所在国家分布看，在美国最多，102位，占56%；其次日本，36位，占19.8%；来自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典、英国、丹麦的44位，占

24%。从整体来看，引进的高端人才大都来自欧美、亚太和澳洲的发达国家。

从回国工作时间看，2008-2012年回国最多，占82%，说明在海外高端人才引进工程支持下，大量高端人才回国，人才引进效果明显；1994-2007年，占比18%。从研究领域看，从事自然科学领域研究105位，占57.7%；工程技术领域研究73位，占40%；从事社会科学领域研究4位，占2.2%。98%的高端人才都是从事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研究。

从研究工作性质分析，从事应用研究66位，占36.3%；从事基础研究62位，占34.1%；从事科技产品开发研究54位，占29.6%。从引进方式分析，全职引进110位，占比60.4%；兼职引进72位，占39.6%。

（四）研究假设和回归分析

1. 研究假设。根据海外引进高端人才感受问卷，提炼出10个科研环境要素，假设科研环境要素与科研绩效正相关，创建待检验回归方程模型：其中C代表科研环境要素，G代表高端人才科研绩效， ϕ 是需测算的参数， ε 代表随机干扰项。

$$G = \phi C + \varepsilon \quad (\text{模型1})$$

假设1：组织内部人际关系与科研绩效^①正相关

假设2：引进人才和国内原有人才关系与科研绩效正相关

假设3：工作量和时间安排与科研绩效正相关

假设4：工作感受与科研绩效正相关

假设5：晋升机制与科研绩效正相关

假设6：薪酬福利与科研绩效正相关

假设7：科研条件与科研绩效正相关

假设8：科研项目申报与科研绩效正相关

假设9：单位重视与科研绩效正相关

假设10：成果转化机制与科研绩效正相关

2. 回归模型建立

$$\begin{aligned} \text{HGJX} = & \alpha_1 + \beta_1 \text{NBGX} + \beta_2 \text{DWZS} + \beta_3 \text{RCGX} + \beta_4 \text{GZLS} + \beta_5 \text{SQWT} + \beta_6 \text{KYTJ} + \beta_7 \text{XMSB} + \beta_8 \text{GZGS} \\ & + \beta_9 \text{XCFL} + \beta_{10} \text{CGZH} + \varepsilon \end{aligned} \quad (\text{模型2})$$

$$\begin{aligned} \text{WGJX} = & \alpha_2 + \lambda_1 \text{NBGX} + \lambda_2 \text{DWZS} + \lambda_3 \text{RCGX} + \lambda_4 \text{GZLS} + \lambda_5 \text{SQWT} + \lambda_6 \text{KYTJ} + \lambda_7 \text{XMSB} + \lambda_8 \text{GZGS} \\ & + \lambda_9 \text{XCFL} + \lambda_{10} \text{CGZH} + \varepsilon \end{aligned} \quad (\text{模型3})$$

模型2和模型3是根据因变量对模型1的拓展。应用最小二乘法（OLS）进行检验，模型中自变量含义见表1， α 是常数项（待估截距项）， β 、 λ 为待估回归系数，代表其对应自变量对因变量边际贡献， ε 是随机干扰项。

① 是指引进高端人才的科研绩效，包含微观科研绩效和宏观科研绩效。

3. 回归模型检验和分析。用stepwise逐步多元回归分析方法, 检验组织内部人际关系(NBGX)、与国内高端人才关系(RCGX)、工作量和时间安排(GZLS)、工作感受(GZGS)、升迁机制(SQWT)、薪酬福利(XCFL)、科研条件(KYTJ)、科研项目申报(XMSB)、单位重视(DWZS)、成果转化机制(CGZH), 对高端人才科研绩效是否有显著影响作用。科研绩效包括微观科研绩效(WGJX)和宏观科研绩效(HGJX)两个因子, 分别对这两个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预测微观科研绩效时, 进入回归方程显著变量5个, 多元相关系数0.768, 多元决定系数0.589, 调整后多元决定系数0.540, 联合解释变异量54%, 经方差分析 $F = 4.295$, 在1%水平上显著, 回归方程有效, 拟合优度较好, 组织内部人际关系(NBGX)、单位重视(DWZS)、科研条件(KYTJ)、工作感受(GZGS)与观微科研绩效显著正相关, 成果转化(CGZH)与观微科研绩效显著负相关。标准化回归方程为:

$$WGJX = 0.197 + 0.231NBGX + 0.437DWZS + 0.267KYTJ + 0.397GZGS - 0.365CGZH$$

$$F = 4.195 \quad R^2 = 0.540 \quad DW = 2.132$$

预测宏观科研绩效时, 进入回归方程显著变量2个, 多元相关系数0.573, 多元决定系数0.328, 调整后多元决定系数为0.283, 联合解释变异量28.3%, 经方差分析 $F = 5.062$, 在1%水平上显著, 回归方程有效, 拟合优度较好, 与国内高端人才关系(RCGX)、成果转化(CGZH)和宏观科研绩效显著正相关。标准化回归方程为:

$$HGJX = 0.291 + 0.334RCGX + 0.330CGZH$$

$$F = 5.062 \quad R^2 = 0.283 \quad DW = 1.987$$

表2 模型2和3的回归结果

| | WGJX微观科研绩效 (模型2的回归结果) | HGJX宏观科研绩效 (模型3的回归结果) |
|--------------------|-----------------------|-----------------------|
| NBGX组织内部人际关系 | .231** (2.083) | |
| DWZS单位重视 | .437*** (3.910) | |
| RCGX国内高端人才关系 | | .334** (2.282) |
| GZLS工作量和时间安排 | | |
| SQWT升迁机制 | | |
| KYTJ科研条件 | .267** (2.445) | |
| XMSB科研项目申报 | | |
| GZGS工作感受 | .397*** (3.616) | |
| XCFL薪酬福利 | | |
| CGZH成果转化 | -.365*** (-3.322) | .330** (2.255) |
| F | 4.195*** | 5.062*** |
| R | .768 | .573 |
| R ² | .591 | .321 |
| 调整后的R ² | .540 | .283 |
| Durbin-Watson | 2.132 | 1.987 |
| 样本数 | 182 | 182 |

注: 括号内数字是估计参数的T统计值, 星号表示显著性程度; **、*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五）研究结论

组织内部人际关系、工作感受、科研条件、单位重视与引进高端人才微观科研绩效正相关，与宏观科研绩效无显著关系，假设1、假设4、假设7、假设9部分支持；和国内高端人才关系、成果转化机制，与宏观科研绩效显著正相关，成果转化机制与微观科研绩效有显著负相关关系，假设2、假设10部分支持。工作量和时间安排、升迁机制、薪酬福利、科研项目申报与科研绩效无显著相关关系，假设3、假设5、假设6、假设8不支持。组织内部人际关系、单位重视、科研条件、工作感受、成果转化机制、与国内高端人才关系六个因素，对微观科研绩效解释力为53%，对宏观科研绩效解释力为27.5%。由此可见，影响高端人才科研绩效因素非常多，许多因素在本研究中无法获知，只能作为残差来处理，但所分析科研环境因素是解释海外引进高端人才科研绩效差异性的重要变量。

三、政策建议

（一）成立高端人才队伍建设领导协调机构

到目前为止，为海外高端人才回国工作服务的有多个部门，且职能相对分散，缺乏一个统筹管理与服务的权威部门。高端人才队伍的建设工作涉及面广、系统性强，做好这项工作必须加强宏观引导，做好顶层设计。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外国专家局、中组部、教育部、公安部为依托，组建一个权威的高端人才队伍建设领导协调机构。这个机构在高端人才回国工作中占据着核心的地位，主导高端人才政策的制定，指导各部门实际工作，研究制定各领域高端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出台配套政策和措施，监督政策执行。确定重点引进高端人才的领域和急需解决的重大科技难题，以此作为吸引和评价高端人才的依据。全面负责构建有利于充分发挥高端人才作用的科研环境。

（二）人才引进要坚持以用为本

2012年3月，北京某大学教授自杀事件引起大家关注，用人单位不但要重视高端人才引进，更要切实解决高端人才作用发挥问题。工作感受对高端人才微观科研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大部分高端人才都是高成就需要者，希望通过努力付出，在工作中获得成就感，希望把大部分时间集中在科研工作中。所以用人单位，在引进人才时就应明确其要解决的关键问题，让高端人才工作目标明确并富有挑战性；单位领导重视并及时与高端人才交流科研进展状况；提供所需科研辅助支持，保证充足科研时间，不让高端人才把很多时间花在科研之外“公关”活动上，安排熟悉国内科研审批流程，善于处理关系的人，专门负责对外协调工作，让高端人才在工作过程中获得成就感。通过这些措施，来

改善工作感受，并通过工作感受来提升科研绩效。

（三）建立引进人才与国内人才平衡发展机制

引进高端人才与国内高端人才关系对宏观科研绩效有正向显著影响，这种关系包括，引进人才与单位内外专家互助合作、相互促进、互相帮助，经常学术交流，关系融洽，促使引进人才宏观科研绩效提高。高端人才实现良性互动，需要建立引进人才与国内人才的平衡发展机制。

1. 根据关键科学问题和领域需求引进高端人才。在最开始引进高端人才岗位确定时，根据区域经济和科技发展需要，找到理论界和实业界都认可、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解决的关键性科学问题和领域，然后以此为依据到世界各地去寻找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高端人才。使引进高端人才目标明确，较容易和国内专家达成一致，从而具有良好人际关系，通过相互促进交流，达到解决实际问题，提高宏观科研绩效目的。

2. 严格高端人才选拔流程。通过完善高端人才选拔机制，真正引进学术资历深厚、有影响力、学术地位高的高端人才。引进人才学术水平和地位高于原有人才，有利于形成较好关系，如果引进人才和原有人才学术水平和威望差不多，甚至低于原有人才，而引进人才又获得大量资源和经费支持，高端人才间不公平感较易产生。

3. 以实际贡献作为高端人才评价标准。在引进海外高端人才的同时，单位更要注意引进人才与原有人才的平衡发展。用人单位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高端人才引进只能在短期内实现单位跨越式发展，而实现可持续发展还是要依靠自己培养人才。因此，应以高端人才的实际贡献作为评价标准，对于取得和引进人才同样成就的原有人才，也应享有与引进人才同等的工作待遇。

（四）实施人才工程绩效评价制度

目前仅有对高端人才的考核机制，缺乏对人才工程绩效评价制度。实施人才工程绩效评价，要建立一套完善的制度，衡量、评价、考察人才工程的实际绩效，实现人才与组织的共同发展。人才工程绩效评价要素主要包括：考核高端人才或团队的经济效益指标、社会效益指标、科技效益指标；考核用人单位如企事业单位的推进成效指标，包括科研成果转化支持措施、承诺是否到位、对人才重视、科技创新服务支持、后勤保障体系健全程度、问责机制等；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的保障成效指标，包括科研制度、法律制度、自然生态环境等要素。通过人才工程绩效评价，促使政府职能部门和用人单位为高端人才提供良好的科研环境。

（五）健全科研成果转化服务、考核和激励机制

引进高端人才要以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实际问题、科研成果转化成生产力为目标。

科研成果转化机制与高端人才个人科研绩效负相关，与宏观科研绩效正相关。说明科研成果转化机制越完善，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重大现实问题，成果向生产力转化效果越明显。

1. 设立成果转化的专门服务机构。首先，用人单位建立专门从事科技成果转化机构，该机构主要由技术人才、法律专家和精通商业运作的人员组成，该机构主要负责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协调科研机构与公司之间的关系，主要工作职责是提供中介服务、进行专利营销以及建立支持转化的配套制度等。其次，引入市场运行机制，将收益与贡献挂钩，提高成果转化管理人员的积极性。第三，政府着手建立成果转化平台，培养一批素质高、能力强、知识面宽的技术经纪人，以加强科技成果的信息服务、咨询评估能力及科技成果中试基地的管理能力。

2. 完善高端人才考核制度。根据高端人才不同的研究领域，采取不同的考核模式。从事基础研究的人才，侧重于考察论文的数量和质量；从事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的人才，要重点考核其成果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及企业的评价。对高端人才考核应增加提高带领团队科研成果影响力、对青年科研人才培养工作等指标。

3. 建立明晰的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机制。首先，尽快完善高端人才科研成果转化的法律法规，制定合理的收益分配制度，完善智力要素参与分配机制，从法律层面上认可高端人才人力资本的地位，使高端人才利益受到法律保护。其次，深化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改革，完善科技成果转化评价和激励机制。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在扣除技术转化部门的办公费用后，要在科研人员、部门和单位之间进行合理分配，比如美国高校普遍采用“三三三制”分配模式，即学校、院系以及发明人各得 1/3。

参考文献：

1. 陈健、何国祥，2006，《中国科研环境调查报告》，《科学观察》第2期。
2. 黄桂，2005，《员工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管理世界》第11期。
3. 孔巍、黄淇敏，2008，《高等医学院校科研绩效影响因素分析》，《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医学版)》第9期。
4. 赖继年，2011，《留学回国人员对科研环境的认知调查及建议》，《中国科技论坛》第11期。
5. 刘朝晖、常思亮、胡洁，2012，《国外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成功经验及其启示》，《科技管理研究》第20期。
6. 罗文，2012，《制约国家科技成果转化的因素及对策》，《生产力研究》第7期。
7. 张廷君、张再生，2009，《天津滨海新区科技人员科研绩效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8. 张伶、张正堂，2008，《内在激励因素、工作态度与知识员工工作绩效》，《经济管理》第16期。

(下转第104页)

· 名人观察 ·

新中伙伴关系：稳固根基、开拓潜能

——专访新西兰前副总理、新中关系促进会主席麦金农爵士

本刊记者 牛铁航

记者：麦金农爵士，您亲手创立了新西兰中国关系促进会，并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共同发起举办新中伙伴关系论坛，您的初衷是？

麦金农：我的目标就是要把我们两国已经非常好的双边关系提升到更高的水平。

20年前，作为新西兰的外交部长，我曾倡议并且推动成立了新西兰的亚洲领先基金（现称为亚洲新西兰基金），这是一个公司合营的项目，旨在建立和推动新西兰对亚洲各国的了解。我们认为，新西兰与亚洲地区发展更加紧密的联系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种重要性也已经得到了证实。新西兰人非常了解新西兰在亚太地区所处的位置以及新西兰与亚洲国家之间的关系，这对于新西兰的经济繁荣和文化身份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这一点在与中国的关系上体现得更加明显。

去年，新西兰政府发布了《中国战略报告》，提出了政治、贸易、服务业、投资、高科技等领域五大对华关系的战略目标。根据这一战略，我们要建立一个新的新西兰中国关系促进委员会，以便能够更加充分地体现这些关系的重要性。这个委员会由诸多各届优秀的新西兰领导人组成，他们都非常愿意置身于发展新中关系，并且要明确地向新西兰和中国的朋友宣誓，进一步培育和深化发展这些关系是至关重要的。

之后，我们的总理任命我来继续负责新西兰和中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并组建新西兰中国关系促进委员会。我的目标就是，要把我们两国已经非常好的双边关系提升到更高的水平。当时外交部告诉我说，在新中关系四十年的历史上要创下五个第一，所以要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面对这样大的挑战，我有决心进一步推动双边关系发展。去年以及今年我所做的工作使我认识到，很关键的一点是要把双

方最重要的几个人物都聚集到一起。

去年8月份，我通过中国外交部有幸第一次会见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官员，通过跟他们的会晤，我感受到新中关系是我们要努力维护的关系，也使我们认识到跟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合作，可以使我们有能力共同应对挑战，使得这一关系获得更大的发展和进步。

这次论坛正是基于这样的努力，而且正值约翰·基总理访问中国，也正值中国完成了领导人的换届，正好今年也实施了我们的报告《中国战略报告》。我们此访所停留的时间虽然并不是很长，但是我从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以及我们的总理的热情中已经感受到了双边关系是充满着热情和活力的，今后一定会取得进一步的发展！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热情，所以在我们今天的论坛中才有幸请到了中国政府方面非常重要的部长、副部长，新西兰的代表中也有很多高级别的官员。我们希望从他们的讨论中所获得的是思想的碰撞，使得双边关系继往开来，迎接挑战，获得更大的发展。

记者：您认为中新关系中，哪些方面最为重要？哪些方面高度互补？今后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麦金农：首先是经贸关系，两国之间存在高度的互补，如在农产品、奶制品领域。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但中国的农产品特别是奶制品向我们敞开了大门，不像有些亚洲国家，如日本，在加入TPP的谈判中就是不愿意开放本国的农产品市场。新西兰的奶制品98%用于出口，其中大部分是销往中国的。我们计划今后向中国出口10亿公升的奶，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几乎等于每个中国人有将近一公升的来自新西兰的奶。自从五年前两国签订了自贸区协议后，双边贸易迅猛发展。这一趋势还将持续下去。

此外，两国在旅游方面也有巨大的发展潜力。至2012年年底，从中国到新西兰的旅游者全年达到20万人，预计到2018年这一数字将翻一番，达到40万人。这其中包括留学生、政府人员和民间与商业往来。我们从此次访华中也亲身感受到这种政府间和民间往来的巨大潜力。

两国之间的双向投资日益增长，这也是双边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还有文化交流项目和友好城市的互惠关系，这些方面都将随着经贸关系的发展而得到全面的发展。

记者：此次论坛的主题是“稳固根基，开拓潜能”，您认为论坛是否已经取得了成功？除了双边关系，对如地区性、国际性的关系和组织，譬如TPP，有何影响？新西兰作为TPP的发起国，是否欢迎中国的加入？

麦金农：此次论坛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论坛紧扣“稳固根基，开拓潜能”的主题，两国领导人在论坛上直接交流，充分肯定了以往的成绩，又全面积极地展望未来。今后，这样的活动还会进行下去。新西兰中国促进会下次做东，请你们到新西兰去继续

我们的成功。

我相信，新西兰中国促进会在各个领域，包括学界、科学界以及教育界演艺界、创业部门之间，都已经非常有多的联系，而且在企业与金融部门之间也联系密切，人与人之间的人文交流网络不断加强。我希望本次论坛将给我们提供一个基础，让我们能够加强业已存在的关系，发展新的关系，并且能够让我们开始一种新的对话，以便讨论如何能够充分地发掘两国之间关系存在的潜力。此次论坛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把承诺变成一种更加紧密的关系，而且要通过各方面采取行动来实现这一目标。

这次论坛可以让我们共同就两国面临的关键问题交流意见，不仅是那些影响到我们双边关系的问题，而且还包括整个地区，乃至全球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我们特别荣幸的是，新西兰总理约翰·基以及汪洋副总理也来到此次论坛，而且中国和新西兰的很多部长和领导人都参加到论坛当中，我们将从他们的见解当中受益。我们会讨论五年前签署的新西兰-中国自由贸易协定所取得的成果，这一点本身就值得我们庆贺。而且我们也要面向未来，要拓宽我们的视野，要更好地讨论如何能够进一步推动双边贸易和投资关系。通过交流我们也会听到各个部门所讲的挑战和观点，还有他们对不同领域的看法，包括科学、旅游、教育以及创意产业等领域。同时，我们也要好好地讨论一下如何能够通过创新和创造来更好地塑造我们的未来。

中国是亚洲各国的重要伙伴，新中关系当然会对亚洲甚至全球产生影响。虽然新西兰是否欢迎中国加入TPP的问题应当由我国政府来回答，我认为民间的交往更为重要。我十分欣赏贵国汪洋副总理的话：“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我的工作就是从事全球各地的国际关系，主要是关注国与国之间的交往，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还有人民的福祉。我一直坚信，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对于推动共同利益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对于全球经济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

记者：如您所说，您久居领导地位，却长期致力于人与人的交流与沟通。您的卓越的个人特质与您担任新中促进会主席有何关联与影响？

麦金农：我所有的人生经历都会帮助我在目前新中促进会主席的位置上发挥正面的积极作用。我开始工作之初，当过农民，因此懂得在土地上劳作的人最需要什么；一直到我当了国会议员，我更知道人民的心声；作为外交部长和英联邦国家的秘书长，我了解如何处理国与国之间发生的纠纷。可以说，我的人生经历都是与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相关的。作为新中促进会的主席，我的工作就是要了解不同人民的心愿，满足政府及商界的各种需求。

我也想借此机会，祝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成功地举办了这次论坛。你们是中国

（下转第 119 页）

推动新中合作关系迈上新台阶*

新西兰总理 约翰·基

近些年来，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新西兰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也迅速增长。1981年，几个先行的新西兰企业成立了新西兰中国贸易协会，当时中国占全球GDP的2%，现在则占15%。

新西兰是第一个完成关于中国入世谈判的国家，2008年两国签署了历史性的自由贸易协定。在此贸易协定基础上，新西兰对中国的货物出口，五年来增加了三倍，中国成为我们的第二大出口市场。我们对中国的出口主要是奶制品、木材、肉类还有羊毛，但是像酒类这样的产品现在表现不错，而且有90%以上的产品都是免税进入中国。同时中国的出口也在大幅度增加，已经超过了澳大利亚成为新西兰最大的进口货物来源地。

自从签署FTA以来，新西兰与中国在过去五年里的贸易超过了两国之间过去的贸易总额。我们有望能够实现我与习近平主席在博鳌所确认的目标，即到2015年使我们的双边贸易翻番。我们的双边投资也在迅速增长。我可以举几个例子：海尔在新西兰成立了一个设计与创新公司，未来两年将吸收奥克兰和达尼丁的员工；光明奶业在新西兰的奶制品公司能够提供非常高质量的奶制品，包括婴儿产品；其他中国企业，比如伊利和雅士利，都成功地获得了新西兰在海外的投资办公室的许可，他们要在新西兰建立加工厂，投资额都将超过2亿新西兰元。而且，越来越多的新西兰公司也在投资中国，方塔拉（音）在河北有三个大型的农场，而且现在正在建立两个新农场，以便能够组建巨型的农场集团，其长期目标是建立更多的这种农场集团，以便能够2018年在中国生产出10亿升的奶产品。此外，瑞康在成都也有一个合资企业，生产水晶以及水晶振荡器，以及其他导航设备和智能电话。新西兰政府一直认为投资和增长是至关重要的，这包括在新西兰的海外投资，因为它可以补充新西兰自己本身的投资。海外资本可以帮助我们增加企

* 本文为新西兰总理约翰·基2013年4月12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新西兰伙伴关系论坛”上的致辞，略有删节，题目为编者所加；该论坛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和新西兰-中国关系促进委员会共同主办。

业业务，创造更好的投资机会，提高我们的工资水平。我们欢迎这样的投资。

与此同时，关于在新西兰购买土地的敏感性问题，我们也有自己的原则，以保证新西兰能够从中受益，能够有新的就业机会、新的技术，还能帮我们提供更多出口市场的机会。新西兰政府一直支持这些原则，而且我们一直秉承透明的原则。这种透明，还有稳定的商业环境，可以说使新西兰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商业国家的原因之一。福布斯把我们列为世界上最好的商业国家，世界银行把我们列为第三，仅排在新加坡和香港之后。我们也有非常完善的法律和经济机构，我们的金融业也成功地度过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

我们保证提供更多的、更充足的资源来满足越来越多的对于高质量产品的需求。我们有非常好的食品安全标准，有先进的技术，消费者可以对我们产品有充分的信心，我们对于任何国家的国内生产商不构成任何威胁，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奶制品出口国，那是因为我们的国内市场比较小。我们生产了全世界奶制品供应的2%-3%，而全球的需求现在每年增长速度达2%-3%，所以说世界需要新西兰做出贡献，以便能够增加总的供应。

未来新西兰在所有的食品，不仅仅是奶制品方面，可以与区域内其他国家合作。我们可以在农业、园艺学、食品、科技方面提高我们的知识技能。我们的国家比较小，但是我们的专长特别突出，我们将与中国以及其他国家一起制造食品，以改善国内各个部门的生产效率。我们要进一步提升我们的品牌力量，让我们的品牌成为高质量、安全性的代名词。而且作为一个繁荣的伙伴，新西兰可以给这个地区带来很多的实惠。除了在食品生产方面之外，我们的工程技术都有自己的专长，可以帮助各个国家开发自然资源。我们还进一步开发高科技产业，我们具有高创造性的人民，而且我们的环境非常优美。

中国可以说是新西兰的国际留学生最大来源国家，达到了2400人。而且我们愿意看到更多的中国人来到这个国家学习，我们可以提供高质量的、学费非常优惠的教学，让所有的学生在英语环境中学习。而且我们也有非常高的标准，给所有的海外学生提供非常好的呵护。

新西兰是一个非常好的旅游目的地。作为新西兰的总理，我同时也兼任新西兰的旅游部长，所以非常欢迎近些年来中方游客的大幅增加，2012年中国游客达到了20万人次，中国成为增长最快的第二大旅游客源地。两国总理在两天之前一致同意，要让我们商务旅行更加便利，我们现在要提供三年多次进出的商业签证。新西兰是对商业开放的，我们愿意与中国做生意。我们的经济成功地避免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们是做得非常好的。去年新西兰经济增长了3%。我们在经济发展方面，在所有的经合组织国家当中可以说是增长率最高之一，比加拿大、英国、美国、日本

都要高，而且利率处在50年最低点，我们的贸易条件一直保持很高的水平。

此外，新西兰历史上最大的一个经济项目，是在经过一系列的破坏性地震之后重建的项目，未来几年的开支有望达到300亿新西兰元，占新西兰GDP的15%。我们一定会进一步减少债务。现在我们政府正在努力实现债务盈余，然后让我们的净公共债务能够保持在GDP的30%以下。我们正在进一步实施多种措施，来建立一个更加高效的有竞争力的经济体。新西兰在过去的40年里发生了很多变化，我们现在对中国的出口要比对英国多四倍，而英国在历史上一直是我们最重要的市场。新西兰的企业也非常愿意更多地了解中国。

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新西兰人当中有3/4都认为亚洲地区对于新西兰的未来是非常重要的，而亚洲可以说比欧洲、北美还有其他任何一个地区都更加重要，当然除了我们的近邻澳大利亚之外。新西兰可以说是与亚洲紧密相连的，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很多。我们在去年推出了新西兰中国发展战略。该战略特别强调贸易和经济关系。我们与工业界、商业界还有各种组织一起来推动这一战略，目标包括要进一步保持我们强大的富有灵活性的政治关系；到2015年使我们的货物贸易翻番；要加强我们的服务贸易，包括教育和旅游；要增加我们的投资，同时要增强我们高质量的科技合作。

责任编辑：刘英奎

（上接第 116 页）

新成立的智库，我们也是新西兰新成立的专门负责开拓新中关系的智库。我们携手共同努力维护并发展新中关系，更加满怀热情地去开拓未来，使得这个关系获得更大的发展和进步。回到新西兰后，我们会向国内传递我们的访问信息，激发出很多新思想。在新西兰方面，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到两国强有力的关系以及两国将进一步发展的经贸以及人民之间的往来。我们双方都更加认识到，两国关系是一种全面的、长期的、非常好的关系。

责任编辑：刘英奎

ABSTRACTS

(1)Strengthen Infrastructure Cooperation to Promote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Asia

Zeng Peiyan

Facing with a dilemma of promoting growth and restructuring, it's necessary for emerging Asia to raise the Asia Infrastructure Cooperation Initiative (AICI) for their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of infrastructure planning, and establish a multilateral financial institution or fund as the financing platform of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2)On Population Issu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Jiang Zhenghu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and with a view to coordinating developments between population and economy, between population and society, between population and resources & environment,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that population interacts with such factors as economy, society,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and expounds the objective to achieve balanced population growth of China based on comprehensive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mong population, economy, society,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with suggestions on policies put forward.

(3)The Core of Economic System Reform Is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Gao Shangquan

The core issue of economic system reform is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In order to transform government functions and break the administrative monopoly, it's necessary to weaken th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micro-economical activities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basic role of market forces in allocating resources. It should be recognized that market is the main power promo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government the main power creating a favorable environment. Therefore, we should advance government turn from an all-round and regulation-orientated one to a limited, service-oriented and law-based one, and build up a social justness and security system with the main content of

fair right, fair opportunity and fair rule.

(4)Change and Challenge of China’s Employment Situation

Cai Fang

The absolute shrinkage of working age population indicates the disappearance of demographic dividend and the resultant slowdown of potential GDP growth rate in China. As long as actual growth rate remains at or above potential growth rate, cyclical unemployment will not occur. According to the change in development stages, policy focus should shift from creating jobs through economic growth to tackling with structural unemployment via upgrading of skill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isks of natural unemployment in urban labor market based on human capital characteristics of migrant workers and urban local workers and draws policy implications.

(5)To Establish China’s Domestic Demand-led Opening-up Mode

Yang Shengming and Zhao Jin

A country’s choosing of opening-up mode depends on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targets. It’s necessary for China to establish a domestic demand-led opening-up mode, for the purpose of establishing domestic demand-led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next decade. That is to say, on the basis of persisting the opening up principle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 socialism”, focusing on opening up of service industry, China should make efforts to realize opening up goal of “promoting transformation with opening up” by establishing new mode of interactive development between “domestic regional economic coordin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6)Theoretical Thinking of Appropriate Growth of China’s Money Supply

Xu Hongcai

The view of excessive money supply in China is the lack of scientific ground.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show that global money supply to GDP ratio has maintained a rising trend. Currently, China’s Central Bank should remain its broad money (M2) growth rate at 13% to 14% to implement a neutral monetary policy. The policies of interest rate and deposit reserve ratio should be used with caution. The open market operation continues to play a key role. Meanwhile, it is necessary to speed up financial reform to promote policy transformation from “quantity control” to “price adjustment”.

(7)Some Solutions on the Undertaking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e of Processing Trade

i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of China: Based on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Chongqing

Research Group

There exist some certain advantages whe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of China are undertaking the processing trade of eastern coastal areas, but how to achiev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e of processing trade still needs to be promoted. Based on a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Chongqing,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processing trade field need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diversification of corporate body and rationalization of the structure of labor force, guide the processing trade enterprises to develop their own brands and transform the single foreign trade to the common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trade. At the same time, some relevant policies are also important.

(8)The Way to China's Speeding-up Implementation of "Going out" Strategy in the New Period and Policy Advices

Li Luosha

This paper analyzed deeply the present situation, trend, and problems of China's implementation of "going out" strategy. It pointed out the way to China's speeding-up implementation of "going out" strategy in the new period, and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corresponding policy advices.

(9)Understanding of Several Problems of the Third Industry Revolution

Wang Changlin

Currently, the Third Industry Revolution led by a group technology breakthrough is being more influential all over the world. For China, the situations are both once-in-a-century opportunities and severe challenges.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China has to reform an innovative institution which is benefit for new technology commercialization and new business growth.

(10) Research on Construction of Capital Restraint Mechanism of China's Commercial Banks

Cheng Fengchao, Hu Dan and Wang Zhangwei

"Commercial bank capital management measures" has been implemented in the year 2013. The new accord strengthens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for capital and promotes the growth pattern of capital saving. To adapt to the new accord, domestic banks should enhance the transmission of capital discipline, magnify the key role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lay down and implement capital planning of medium and

long terms and enhance the economic capital allocation and appraisal to a further extent.

(11) A Primary Study on Current Change of IT Industry

Wu Bo

It could be seen from current profound change of IT industry that enterprises need to cultivate a strong sense of crisis, in order to give insight into the challenges and threats caused by any technology progress or changes of service mode to their survival; need to cultivate a strong sense of innovation, in order to comply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possible industrial adjustment and transformation; must have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since industry changes triggered by technology progress may happen from anywhere in the world. Impacts of IT industrial change are not limited to IT industry itself, other industries, as well as public behavior will also be highly influenced.

(12) To Establish the Erenhot Special Business Zone for China's New Pattern of All-round Opening

Shen Jiawen and Zhao Changmao

To deepen reform and opening up, it's a significant strategic choice for China to strengthe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open economy. As Erenhot City occupie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position in the Sino-Mongolian-Russia economic and trade exchanges, it'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Erenhot's special business zone, which is an opportunity to deepen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s with Mongolia, Russia and other countries, and set up a new pattern of all-round opening of the linkage development of open coastal and border open.

(13) International Talent Recruitment and Determinant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erform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Environment

Zhang Jin

High-level talents remain a key determinant of a nation's overall competitiveness, and creating an environment conducive to innovation will give their role into full play. By sending questionnaires to 182 talents of various projects attracting foreign talents and analyzing their responses, this paper identified ten major factors and teste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scientific research findings. Furthermore, this paper offere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in several areas.

Editor: Xie Yunliang

国经中心将举办 “第三届全球智库峰会”

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第三届全球智库峰会”，将于2013年6月28-29日在北京举行。本届峰会以“新格局、新合作、新发展”为主题，旨在加强全球智库机构合作，集中全球民间智慧和力量，推进全球经济平稳复苏，探寻世界经济发展新方向。

国务院有关领导、国家相关宏观经济管理部门领导、外国前政要、国内外知名智库负责人将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国内外专家学者、商业领袖和媒体代表将共同参与，就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等重大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和探讨。

第三届全球智库峰会框架日程

2013年6月28-29日北京

6月28日（星期五）

15:30 - 18:00 注册

6月29日（星期六）

07:00 - 08:00 注册

08:30 - 10:00 开幕式

10:00 - 13:00 主论坛：新格局、新合作、新发展

第一时段 国际经济格局变化及其影响

第二时段 国际政治格局变化与国际关系调整

14:30 - 17:30 平行分论坛

分论坛一 如何实现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稳定增长

分论坛二 世界经济的新引擎是什么

分论坛三 全球资本市场与世界经济平衡发展

分论坛四 国际关系调整中的智库角色

(信息来源：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打造一流智库刊物

——《全球化》编委会召开第一次会议

2013年4月18日召开了《全球化》第一次编委会，19位资深专家、编委以及编辑部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国经中心常务副理事长、主编郑新立主持，国经中心执行副理事长、编委会主任魏礼群做了重要讲话。他代表曾培炎理事长向各位专家、编委表达了诚挚谢意，并介绍了《全球化》创刊以来的基本情况、改版后的初步设想，并对专家、编委们提出了希望。

会议着重针对《全球化》的办刊宗旨和定位、风格和内容、发行和经营问题，以及如何提高刊物质量，如何建设一支好的作者队伍和编辑队伍等问题进行探讨。与会专家、编委结合自身长期以来丰富的管理和办刊经验踊跃发言，积极为《全球化》的发展建言献策。

本刊编辑部

更 正

本刊2013年第1期《谈管理科学的创新与发展》一文作者简介“李京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有误，应改为“李京文，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北京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特此更正。

本刊编辑部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论文征集暨优秀论文评选通知

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加快走出去步伐，增强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培育一批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为了总结和探索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理论基础、政策依据、成功经验，推动中国企业加快国际化进程，提升国际竞争力，本刊编辑部将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为主题，举办论文征集及优秀论文评选活动。

一、时间安排

1. 征文时间：2013年5月-2014年5月；
2. 优秀论文评选时间：2014年6月；
3. 优秀论文评选结果揭晓及颁奖时间：2014年7月。

二、论文评选与奖项设置

1. 组织由知名专家学者及专业人士组成论文评选专家委员会，对征集稿件进行评选；
2. 奖项的设置。针对参与征文活动的作者设置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秀奖各若干名；
3. 评选结果将在《全球化》杂志及相关网站予以公布，获奖文章将推荐到《全球化》发表并结集出版。

三、投稿要求

1. 内容范围。来稿须围绕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理论基础、现状与困难、特点与趋势、政策建议、国际经验、企业案例等相关内容展开。
2. 题材、字数与格式要求。来稿既可以是学术论文，也可以是调研报告、案例分析；篇幅一般为6000-12000字；创新性强、论点鲜明、论据充分、文字精炼、数据可靠。来稿请注明作者工作单位、职称职务，联系电话、电子邮箱等详细联系方式。

四、联系方式

投稿邮箱：qqhtgx@126.com；qqh@cciee.org.cn

联系电话：010-66169330

联系人：李蕊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全球化》编辑部

2013年5月

欢迎订阅2013年《全球化》杂志

《全球化》杂志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管/主办，是集研究性、学术性、政策性、应用性于一体，以国际经济、宏观经济、企业国际化经营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类理论月刊（国内统一刊号：CN11-6008/F；国际标准刊号：ISSN2095-0675）。刊物按照曾培炎理事长的办刊宗旨，依托“中国智库”平台优势，秉承“同享人类智慧，共谋全球发展”的核心理念，本着兼容并蓄、百花齐放的原则，着力打造“全球经济思想库”，构建一个智库交流的平台，成为广大读者观察国际问题的重要窗口和共享思想盛宴的便捷之门。刊物致力于探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积极反映国际社会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诉求，研究如何改善全球经济治理，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理论研究，关注宏观经济运行、产业发展、区域发展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提高经济形势分析预测的科学性、及时性和权威性；积极推动中国经济对外开放进程，尤其关注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与发展中的趋势与问题，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政策和资讯服务，同时为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提供引领和支持。刊物力争具有全球视野，服务宏观决策，推动企业发展，集聚各类人才，成为政府、科研院所、企业从事国际经济研究、把握中国经济动向的重要平台。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国内邮发代号：82-572；也可填好“征订单回执”，直接汇款向我部订阅。联系人：李蕊；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什库大街31号1号楼506室《全球化》编辑部；邮编：100034；电话（传真）：010-66169330。

本刊定价：每期人民币35元，美元20元，港币50元，每月20日出版（国内免费邮寄）。

2013年《全球化》杂志（月刊）征订单回执

| | | | |
|----------|--|-------------|------|
| 订阅单位 | | 订阅人姓名、电话 | |
| 详细地址（邮编） | | | |
| 征订份数 | | 420元/年（12期） | 总计金额 |

注：为便于我们尽快给您邮寄，请务必将征订单回执与汇款底单一并传真至我部。

《全球化》杂志征稿启事

《全球化》杂志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管/主办，是集研究性、学术性、政策性、应用性于一体，以国际经济、宏观经济、企业国际化经营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类理论期刊。刊物按照曾培炎理事长的办刊宗旨，依托“中国智库”平台优势，秉承“同享人类智慧，共谋全球发展”的核心理念，本着兼容并蓄、百花齐放的原则，着力打造“全球经济思想库”，构建一个智库交流的平台，成为广大读者观察国际问题的重要窗口和共享思想盛宴的便捷之门。刊物致力于探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积极反映国际社会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诉求，研究如何改善全球经济治理，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理论研究，关注宏观经济运行、产业发展、区域发展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提高经济形势分析预测的科学性、及时性和权威性；积极推动中国经济对外开放进程，尤其关注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与发展中的趋势与问题，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政策和咨询服务，同时为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提供引领和支持。刊物力争具有全球视野，服务宏观决策，推动企业发展，集聚各类人才，成为政府、科研院所、企业从事国际经济研究、把握中国经济动向的重要平台。

本刊设有：高层论坛、理论前沿、宏观经济、国际经济、产业发展、企业发展、区域经济、调研报告、案例研究、名人观察等栏目。论文要求创新性强、论点鲜明、论据充分、文字精炼、数据可靠，篇幅一般不超过1万字，切勿一稿多投。请作者按照论文的写作规范投稿，并同时提供中英标题、内容摘要、关键词。请注明作者工作单位、职称职务，联系电话、电子邮箱等详细联系方式。本刊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录用稿件，稿件寄出三个月，如未见录用通知可自行处理。

本刊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安门大街22号2号楼503室

北京市西城区西什库大街31号1号楼506室

投稿邮箱：qqhtgx@126.com; qqh@cciee.org.cn

联系电话：010-66169330

联系人：李蕊

本刊编辑部